

PHOENIX WEEKLY

MAR 2018 | 第7期 | 总第644期

鳳凰週刊

國企大混改

人大附中的教育「扶貧」路
肯尼亞的中國電商時間
虛擬貨幣全球監管風暴

《鳳凰周刊》授權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卷首语

如何找到一个特色小镇的灵魂？

现在时讯

瞬间MOMENT

封面

台港澳

中国观察

环境&科技

阅读

军事

封面故事

国企大混改

人事任免折射国企改革提速

消除“僵尸国企”之患

时事

“邪恶动画”入侵中国

比尔·盖茨答中国记者问：同中国合作，我感到非常自豪

“问题地图”背后：

在华外企不可触及的“红线”

台港澳

台湾英语教育“装逼风”疯魔25

年

人物

人大附中的教育“扶贫”路

国际

肯尼亚的中国电商时间

平昌冬奥会背后的南北关系

法国“问题奶粉”背后的企业

军情

“白嘴鸦”坠落：叙利亚危局下的

惨案

城市观察

简州新城的梦想和未来

从制造到智造：让每个城市都有“龙泉造”

记者 / 闵云霄

打造世界级“城市绿心”

龙泉驿：建设天府绿道 重现

《蜀川胜概图》

财经线

虚拟货币全球监管风暴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障碍与破题

财经资讯

历史档案

《西游记》前的“西游记”

微史记

文化

从《摔跤吧！爸爸》到《神秘巨星》的中国成功

一个三轮车夫的文化启蒙运动

三地书

一次跨越三千年的历史遨游

版权信息

凤凰周刊总第644期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8©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8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12031-20171215

最后修订：2018年 03月 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4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卷首语

如何找到一个特色小镇的灵魂？

周兼明

特色小镇近年成了热词，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住建委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针对的就是特色小镇一哄而上所带来的问题。

《意见》指出，特色小镇的建设出现了概念不清、定位不准、急于求成、盲目发展及市场化不足等问题，有些地区甚至存在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和房地产化的苗头。要求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把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体育基地、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建制镇等啥都往里装；避免脱离实际的照搬照抄，以防止同质化竞争；以及防范“假小镇真地产”项目、严防破坏生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些板子基本都打在了要害处。

自2016年7月，住建部等三部委颁布了

《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1000个特色小镇后，就在各地引发了“小镇热”。但从一年多的实施效果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如云南丽江，是时间最久、名声最大的特色小镇，但最近有报道显示，大量旅游地产败走丽江。有统计显示，丽江商品房的去化周期最长——全部消化需50.6个月，而昆明只需10.4个月。丽江周边的小镇尚且如此，其他无名地域的情形可想而知。

目前中国特色小镇，成功的屈指可数，较著名的如安徽宏村、云南丽江、湖南凤凰、浙江乌镇及莫干山镇、江苏周庄等。这些小镇，原本就有丰厚的文物遗存与特色民俗，古镇原来的生活形态保存得较好。这几个小镇在成为热点前，开发者资金投入并不多，更多的是软性投入。丽江在大规模投入开发后，反而失去原先的风采，对游客的吸引力减弱。

而“霸王硬上弓”的那些“特色小镇”，多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因为这些仓促上马的“特色小镇”并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产业支撑，更无区位优势，只有房地产。这样的小镇，建筑再漂

亮，也留不住人，最终只会沦为空镇、鬼镇。2016年，住建部公布了127个特色小镇的名单，许多连本地人都没听说过。

有调查显示，到2016年底，已有5000多家企业涉足旅游地产的开发和投资，通过不断并购，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大鳄，但八成的开发企业都是房地产企业。他们名义上是建设特色小镇，但目的还是为了卖房。

一些小镇，提供的不过是人造景观或伪古迹，并无多少游览价值。加上既无自然资源的优势，又无民俗和人文景观的传承，怎可能凭空创造出文化精品？由于无法打通旅游和文化之间的壁垒、形成产业链，这些企业运作的项目往往缺少发展后力，投资方与运营方也多是单点合作。所谓的生活度假或旅居生活，最终只停留在策划方案或宣传中。

客观分析中国的假日制度，只有一个大黄金周、一个春节黄金周和五个小长假，孩子寒暑假时，大多数父母并无假期。这种假日模式，根本无法支撑任何旅游项目的全年兴旺。加上近年来，各地对文旅产业的过度开发，导致游客大量分流，使得原是热点的旅游项目，

都开始走下坡路了，何谈新建的特色小镇？

应当说，这次《意见》开出的药方是很专业的。要求各地准确理解特色小镇内涵特质，立足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要求各地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如浙江特色小镇，确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凡是能热起来的小镇，都有相应的要素和产业基础，有些经验是不可复制的；要求打造小镇的鲜明特色，在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积淀和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凸显特色、放大特色；要求有效推进“三生融合”，科学规划特色小镇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防止将原住居民整体迁出等。

应当说，如果各地在上马特色小镇项目时，真能严格按照此药方行事，会少走不少弯路。

浙江莫干山的民宿，2015年做到了年营业收入3.5亿元，但从小规模民宿发展到这一步，却历经了十多年时间。这还离不开它的区位优势——距离上海、杭州、湖州都不远。它的最终成型，和前些年乡建热有关，也和上海等地中高端消费群兴起的“逆城市化”生活方式有

关。先是一些有情怀的人回到乡村，带动市场，然后资本才发现投资方向，于是民宿从小宅走向大盘。莫干山的成功，恰恰证明建设特色小镇，需抛弃过去先规划、统一投资建设的模式，而是要像培育小树苗一样，让它慢慢由小变大。只有无数个个体，对一个地方进行长时间的打磨、斟酌与试错，才可能找到一个小镇真正的特色。

陕西省安康市的龙头村，是由政府主导快速推进，用近两年时间，规划建设生态茶园、水上乐园、农耕文化园、乡村客栈等一系列旅游项目。这里碧水蓝天，翠竹绿树之间，一栋栋清新的徽派民居错落有致，恬静优美。但只在 2012 年风光过一阵子后，2013 年便冷清下来。旅游产业没做起来，也没形成其他规模产业，农户们在土地流转后，极难找到其他致富门路，只能外出打工。早先修建的特色作坊，多成为摆设。这说明特色小镇的特色，不是靠人为规划出来的，而需慢慢生长与摸索。

大多数特色小镇没灵魂，不是规划者水平不够，而是根本没有给灵魂以生长与呈现的时间。为何人们到日本任何一个乡村旅游，都能

感到心理满足？因为在其中看到了时间的积淀感。这是任何设计替代不了的。只有无数工匠长时间打磨出的产品，才能真正让人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心理满足。这是靠大投资和编故事永远无法实现的。因为一个小镇生活的呈现，其实内在关系错综复杂，最重要的是，它也需要消费者有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时间因素在小镇的成长中，是任何方式的投入都取代不了的。这才是《意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产业建镇、以人为本、市场主导”等几大原则的主因。

只有以市场为主导，一个小镇的成长才不会被拔苗助长。多一点慢工出细活的工匠心态，让小镇多一点生长发育的时间，我们也才有可能发现一个小镇的灵魂所在。

现在时讯

瞬间MOMENT



巴西 2018 / 02 / 01

里约热内卢的警察在一处名为“上帝之城”的贫民窟执行任务。里约热内卢仅在1月发生了近500起枪击事件，其中41起发生在这个贫民窟。

2018年中国消费者信心迎来强劲开局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2018年2月1日

英国《金融时报》研究服务部门《投资参考》的中国消费指数，在2018年伊始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收入持续上升，家庭对经济改善的看法也达到自2011年7月调查以来的最快增长。其中消费指数较去年12月份上涨了1.6点，比上一波高峰——2017年11月份指数，高出了0.8点。前瞻家庭收入、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皆在今年年初有所增长。

消费者信心增长，很大程度是源于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资产价格上扬，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提高。但是，随着政府收紧金融市场监管、降低信贷作为清整金融体系的行动，以上对消费者信心增长的正面因素将会在2018年褪色。尽管领导层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关注经济增长率，但若没有宽松的信贷和冒泡的房地产市场作为基础，中国家庭的乐观情绪不可能保持在目前的水平。

FTCR中国消费指数

(指数50=没有变化)

注：消费指数的同比变化

指数超过50为增长，低于50为减弱

来源：FT《投资参考》



中国“百名红通人员”归案过半

美联社/2018.02.05

1月24日，山西省太原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兼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胡玉兴回国投案自首，结束了为期16年的外逃生涯。至此，中国“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2人归案。2015年3月，“天网”行动拉开帷幕，同年4月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去年4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曝光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归案已过半，其中2015年归案18人，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归案14人，2018年至今有1人归案。

今年人民币将持续坚挺

《日本经济新闻》/2018.02.03

近日人民币涨势如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25个月来首度升破1美元兑6.4元人民币，与此同时，美元指数三年来首次跌破90关口，探底88。美元走弱助力人民币企稳回升，当下，市场对人民币的态度一派乐观。此轮人民币走强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同期美元大幅贬值。展望2018年，考虑到支撑2017年货币走势的大部分逻辑至今仍然清晰，预计2018年美元也难有起色，而人民币将持续坚挺。此外，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也为近期人民币升值提供了支撑。

冬奥会引发中国滑雪场投资热

路透社/2018.02.06

在十年前的巅峰时期，北京西郊的木城涧煤矿曾产出堆成山的煤炭。如今，北京门头沟区的这座矿山把未来寄托在白色的坡道上：它计划将自己变成一个冬季运动胜地，把以前矿工挖煤用的地下竖井变成一条带空调的1.25公里长越野滑雪隧道。

中国北部涌现了许多滑雪场，各地方政府谋求将经济重点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利用消费者收入上升和口味变化带来的滑雪热潮大赚一笔。根据北京卡宾滑雪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2017年全年滑雪人次达到1750万人次，同比增加15.9%。这种繁荣景象得益于中国政府承诺让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然而有专家称，草率建设滑雪场的做法让人担心投资错位，可能会阻碍滑雪产业的长期发展。卡宾滑雪的总裁伍斌说，很多人想加入这个行业，但没有清晰想法的投资对市场是不利的。中国目前有700多个滑雪场，伍斌告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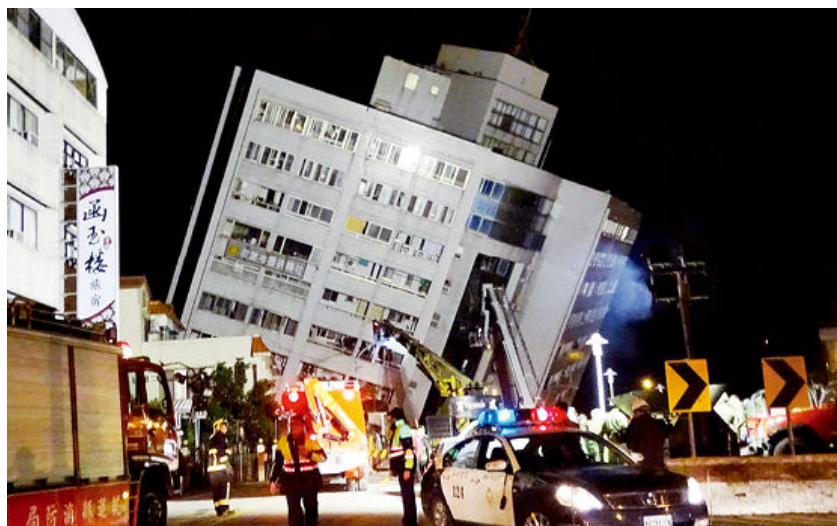
说，冬奥会之后有些滑雪场可能会难以维持。

室外滑雪场还受到另一项约束，那就是政府加强了环境要求，包括干旱北方的造雪用水规定。距离北京约4个小时车程的崇礼将承办冬奥会滑雪项目，它在2014年花了5.5亿元改造附近的一个水库，以便每年为当地滑雪场提供500万立方米的造雪用水。崇礼把该地区的大型滑雪场数量限定在9个，同时北京停止批准新的大型户外滑雪场所。滑雪场运营商表示，其他挑战还包括：教练等有资质员工的数量不足，与员工、能源、环境法规和水相关的成本上涨对利润形成挤压。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木城涧仍在按计划施工，笃定中国的冬季运动爱好者会越来越多——以及北京冬奥会将带来推动力。其他一些中国企业也希望从这股滑雪热潮中赚一笔。“我认为就需求而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产阶级现在已经足够庞大。”伍斌说。

台港澳

花莲6.5级强震 台湾史上罕见

综合外媒报道/2018.02.09



台湾花莲县2月6日晚11时50分发生里氏6.5级地震，花莲市区有4栋建筑物倒塌或倾斜，截至8日20时，花莲地震已造成10人死亡、273人受伤、7人失联。

根据当地消防部门的最新统计，4栋倒塌或倾斜的大楼分别是：统帅饭店、国盛六街2号、国盛六街41号以及商校街2号阿官火锅所在的云门翠堤大楼。台湾省土木技师公会花莲办事处

长陈水生说，经土木技师初步勘查，倒塌的四栋大楼的共通点是一楼的柱子多、墙体少，且又位于米仑断层带附近，一遇到强震，脆弱的一楼支撑不住上方楼层的重量，当然就“下跪”。

土木技师专家已对灾情最严重且倾斜成33度的云门翠堤大楼施以混凝土、消坡块堆叠11枝钢梁支撑，唯强震发生迄今已有200多次余震，且大楼内部挤压空间狭小，形成搜救障碍。

地震发生后，中国内地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台办、海协会紧急启动涉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了解灾情和救灾情况。2月7日上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花莲县长傅崐萁紧急通电话，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致电花莲县有关方面，向在地震中遇难的台湾同胞表达沉痛哀悼，向受伤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包括派遣救援队在内的救灾协助。

发生强烈地震后，台湾消防部门连夜调派全省17县市消防单位支援花莲，出动搜救人员391人、搜救犬20只，截至7日凌晨5时，已有150人、搜救犬9只抵达震灾现场展开搜救任

务。台铁表示，因花莲港支线轨道挫曲断轨，该支线货物列车停驶，其余全线列车正常行驶，另因应花莲地震，将视情形加开台北至花莲间列车。

台当局气象部门认为，花莲2月6日与4日晚间发生的群震属同一序列地震，对此台地震测报中心代理主任陈国昌面色凝重表示“不排除有更大地震发生的可能”。陈国昌表示，4日晚间大大小小共94个地震都是6日晚间规模6.5的前震，这个情况确实相当罕见，显而易见能量还未释放完毕。台气象部门说原本2月4日以后，余震的频率、规模逐渐减缓，但到了6日4级以上的地震却不断出现。陈国昌说，这个序列的地震似乎还在发展，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针对受地震影响的旅游行业，台湾消基会表示，地震是天灾，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消费者若退订，业者必须退还全数订金，即使非属灾区，消费者也可能因心理因素而退订，呼吁业者从宽认定。消基会董事长游开雄也呼吁，强震过后，花莲地区涌入大批救灾人员与车辆，消费者应尽量避免再前往当地进行观光旅

游。如有发生消费纠纷，可向消基会或当地消保官申诉。

流感疫情严重 香港学校提早放年假

星岛日报网/2018.02.07

香港处于冬季流感高峰期，今年来有11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两人死亡，同样出现流感并发脑病变。香港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小学及幼稚园2月8日起提早放年假。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加庆指出，据监测数据，流感活跃程度一直上升，公立医院入院人数维持高的水平，当中5岁以下儿童占的比例最多，每一万人口有8.44宗，其次是6至11岁儿童，至于65岁或以上的长者中，每一万人口有2.87宗。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指，儿童情况严重，12宗严重个案中有两位死亡，12人全部没有注射香港疫苗，只有一人注射了内地疫苗。他又表示，现时公立医院儿科病房爆满，达142%，成人则在115%至120%之间，疫情“未到顶”，仍会维持一段时间。疫症爆发中心主要是幼儿园及小学，根据以往事例及美国例子，停课能有效阻止疫情传染。香港上一次因流感而停课，是2009年爆发猪流感，当局

决定提早放暑假。

港金管局总裁：香港楼市仍然过热

路透社/2018.02.05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表示，目前香港楼市过热情况仍然存在，没有条件放松逆周期措施；对于有建议金管局旗下的按揭证券公司扩大九成按揭的覆盖范围以助市民置业，他则指要小心评估。为防范楼市过热而对银行体系构成风险，金管局自2009年10月至去年5月，已先后推出了八轮逆周期措施，住宅物业按揭成数一再收紧，加上楼价持续上升，造成现时市民有能力供楼，但无力储到足够首期的“上车”困难情况。陈德霖表示，楼价上升，按揭成数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是否没有辣招，楼市就不会升呢？现在的逆周期措施使银行的抗震能力比没有做大大加强，当周期逆转时，银行体系仍会稳健。”

陈德霖重申，现时看不到有放松周期措施的条件，但亦留意到有市场意见指现时市民置业困难，难以储到足够首期“上车”，希望按证公司将按揭保险覆盖范围扩大，例如，将现时可提供最多九成按揭的400万港元物业价格上限

上调。

中国观察

春运成最具中国特色年度“大戏”

香港《明报》，节选/2018.02.04



今年是内地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春运开始40周年。1978年初，回家的人潮已把广州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两年后，“春运”这个词才首次被官方使用。40年来，春运大军从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今年的近30亿人次，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年度“大戏”，也成为观察内地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据悉最高峰一天的客运量将超过1亿人次，等于全日本的人口；铁路预计

客流为3.9亿人次，超过美国人口；民航预计客流6500万人次，相当于全英国人口在这40天内都搭了一程飞机。

回家路艰辛曾经是亿万中国人在春运经历的真实写照。不仅一票难求，还有旅途中的各种艰难困苦。2017年的大数据报告显示，旅客人均在火车上要花费15.36小时，40年前，旅途中的煎熬更可想而知。犹记得10年前那场特大雪灾，令连接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多趟列车取消；京珠高速公路也因结冰而封闭，数万车辆滞留；10万多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令那年的春运成了很多民众难忘的记忆。

但当年的全国春运旅客总量也才不过22亿人次，与今年的近30亿人次不可相提并论。近年春运发生的变化也反映出内地社会形态的变迁，一是人数有所回落，自2014年达到36亿人次后，今年春运客流已与2017年持平。近年中西部地区经济逐步发展，就业岗位增加，令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成为新潮流，不少人近年返乡后不再出外打工。今年春运，道路交通的客流量下降1.6%，是首次负增长。

二是春运的客流模式发生变化，由以往几个大城市与中西部省份几条线路集中爆发流动模式，变得较为均衡，在时间和地点上相对没有那么集中。一来是内地春节黄金周的设立，拉长了假期，城市工厂和高等院校亦错开了放假时间，农民工和学生也学会错开高峰期回乡；二来是过年习俗的改变，很多家庭不再是子女返乡过年，而是家人入城团聚或出外旅游度岁。

三是内地的交通特别是铁路基建大大增加了负荷能力。到2017年年底，内地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铁路电气化率、复线率分别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高铁已成为春运主力军。今年春运高铁、城际等快速列车占铁路运输总比重高达60%，铁路整体运输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今年春运铁路的网购车票及手机购票的比重已达到80%，较2017年再增加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春运的这种变化，也配合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这些“80后”、“90后”青年，已成为外出打工的主力军。他们的成

长伴随着内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早已习惯手机、计算机“连接一切”的生活，更习惯于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助力下，以更舒适的方式回家，“舒适回家”已成为他们对春运的基本要求。

中国森林城市计划推动环保新理念

泰国《民族报》网站/2018.02.05

把泰国的主要中心变成真正的“宜居城市”（人们可以在其中随意行走、骑行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将减少当地居民对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减轻污染并增加城市居民的福祉。任何曾在泰国的大城市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炎热天气、尾气排放和不适宜步行都对泰国的“绿化”构成巨大障碍。令某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泰国可以向它的邻居中国——该国目前正在开发整座的绿色城市，借鉴在更大的规模上取得成功的秘诀。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被空气质量这一顽疾所困扰，它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之前已有文章探讨过该国复杂的共享单车市场以及它用农业无人机降低污染水平的做法。这些进步很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行为。中国还计划建设高科技“花园”城市和“森林”城市，这一举动正在把环保理念推上一个新层次。

一个重要例证就是“南京垂直森林”项目，

该项目把两座相邻的塔楼从头到脚包裹在生机盎然的植物中。大楼的外立面将装饰2500株层叠的植物和灌木以及23种树木，室内则有办公场所、一座绿色建筑学校、一家豪华酒店和一个博物馆。这一垂直森林项目将不仅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且每年还能从南京的空气中吸收25吨二氧化碳，并每天释放60公斤氧气。

而雄安新区可以说是一座森林城市：坐落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省份之一的这个高科技经济特区，最终将有70%的面积被绿地和水域覆盖。这座城市的核心基础设施（包括公用设施和交通）将建在地下，以便把绿地和行人放在第一位。在那里，世界级的技术和当地生态将和谐共存。虽然泰国可以继续改善并扩大泰国各地的公共交通网络，并重点提高泰国城市的便利性，但中国雄心勃勃的森林城市计划有可能会永远改变中国（及其邻国）的面貌。

外国品牌在华遭遇文化差异 产品有成功也有失败

《纽约时报》网站/2018.02.02

10年前，联合利华将舒耐除臭剂推向中国，梦想进入一个拥有26亿个腋窝的市场。

当时，中国的薪酬在上涨，消费者的支出在增加，即将开幕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中国人感到更加国际化。按理说，他们应该愿意接受西方的卫生产品。联合利华（中国）公司前负责人弗兰克·布雷肯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在许多国家都是从零开始为舒耐除臭剂打造了成熟的市场，我们想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国这样做。”

但文化差异和单纯的生理原因——科学研究表明，许多亚洲人并没有西方人的体味问题——令这些计划破灭。据估计，今天不足10%的中国人使用除臭剂，而且他们几乎都在大城市。中国消费阶层的壮大不仅推动了全球增长，也大大增加了星巴克和肯德基等一系列西方品牌的营收。现在，许多中国人选择喝咖啡而不是茶；即使可能引起肠胃不适也要吃奶酪

和冰激凌；在这个经常被老人告诫不能喝凉水的国家，许多人都喝冰镇汽水。

但一些西方企业争取中国消费者的努力显然失败了。以卫生棉条为例，大多数中国女性选择使用卫生巾是因为，她们认为卫生棉条具有侵入性。根据英敏特信息咨询公司的数据，2016年中国市场的卫生棉条销售额为1.36亿美元，仅占卫生巾销售额的一小部分。美国宝洁公司在2000年放弃了在中国市场继续销售丹碧丝卫生棉条的计划。不过，该产品去年重返中国市场。丹碧丝在中国的品牌负责人李凤婷（音）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中国市场再度推出该产品，是为了吸引年轻一代女性。

苹果和星巴克等品牌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的产品能让中国消费者向世界证明自己实现了某种抱负。而那些不为外人所见的产品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当全球除臭剂制造商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所强调的是，在社交场合，流汗可能造成尴尬。这是一个已在西方被证实的观点，即流汗会让人远离社交，从而失去获得浪漫邂逅的机会。

联合利华护肤产品副经理露西娅·刘说，中

国人对这个信息充耳不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流汗是好事，因为它能帮助人排毒。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营销障碍。”根据欧睿国际咨询公司的数据，2016年除臭剂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45亿美元，而中国为1.1亿美元。此外，除臭剂在其他东亚市场的销售也不理想：2016年日本的销售额约为美国的1/10。

中国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医保领域

《洛杉矶时报》网站/2018.02.01



浙江省人民医院放射科的一间CT检查室。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投资的一家公司正在与该医院合作，使用人工智能识别肺癌。

亚马逊和另外两家美国巨头正在试图通过试验自己员工的医保范围来改变医保现状。按照中国的标准，它们落后了。中国的科技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医保放在优先地位。在试验了在线医疗咨询和药物追踪系统后，它们现在专注于一个更先进的工具：人工智能（AI）。

这些公司的技术推进得到了政府的鼓励。

北京表示，它想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并誓言要与美国在这一领域展开较量。尽管官员们强调在国防和无人驾驶汽车等领域使用人工智能，他们也积极推动它在医保领域的应用。

中国的科技巨头已经站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它们的目标包括：创造能够提高医生效率的诊断工具。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亚太医保分析师劳拉·尼尔森·卡尼表示：“公平地说，中国的科技公司都积极参与医疗保健领域，不像美国，有些公司积极，有些不积极，”卡尼说：“它们中很少有谁采取中国公司这么大的动作。”

对于中国的医生来说，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变革性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于伟泓博士表示，过去她常常要花两天时间分析病人的眼睛，仔细查看模糊的图像，与同事讨论她的发现，然后写报告。该医院目前正在试用的人工智能软件能极大加快她完成这些工作的速度。她说：“现在，一分钟应该都不用。”

据设在北京的行业咨询机构亿欧智库称，目前共有130多家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提高中国

医疗保健系统的效率。其中既有科技巨头，也有大量小创业公司。中国一家科技公司正在与东部省份浙江最好的医疗机构浙江省人民医院合作，开发自动识别早期肺癌的软件。创立该公司的林晨曦说，他希望利用这项技术确保中国各地实现平等的医疗服务。“在中国，医疗资源非常稀缺，而且分布不均，最好的资源集中在省会城市。有了这个系统，如果能在乡镇医院使用，会大大改善就医体验。”

努力发现癌结节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浙江省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龚向阳把这个过程比作工厂，过度劳累可能会造成体力不支和出错。“我们每天要看大量影像。所以我们欢迎技术，如果它能减轻压力，同时提高效率的话。”

互联网助力中国精准脱贫攻坚

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2018.02.04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了。当时，一家五星级酒店在上海金茂大厦开业，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五星级酒店之一。但在西南1500公里远的贵州佰你村，农民还是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就像他们一样，当时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口还生活在农村。在佰你村甚至连山坡水田里产出的大米都很紧缺，只能被做成稀粥。如果村民想到下面的山谷里，他们必须沿着羊肠小道往下走30公里，因为当时没有公路。

今年1月，一辆汽车轰隆着驶上山坡，后备箱的纸箱里装着5台崭新的联想电脑和激光打印机，这条柏油道路已经建成好几年了。现在互联网也正在快速上山，中国领导人已经制定了把远离沿海的崎岖内陆地区改造成高技术基地的目标。未来，美国硅谷的比较对象将是充满数据大山的巨大中国的创新力。

在电视中看到上海和北京摩天大楼的人，会惊讶于自上次到过中国后又有那么多高楼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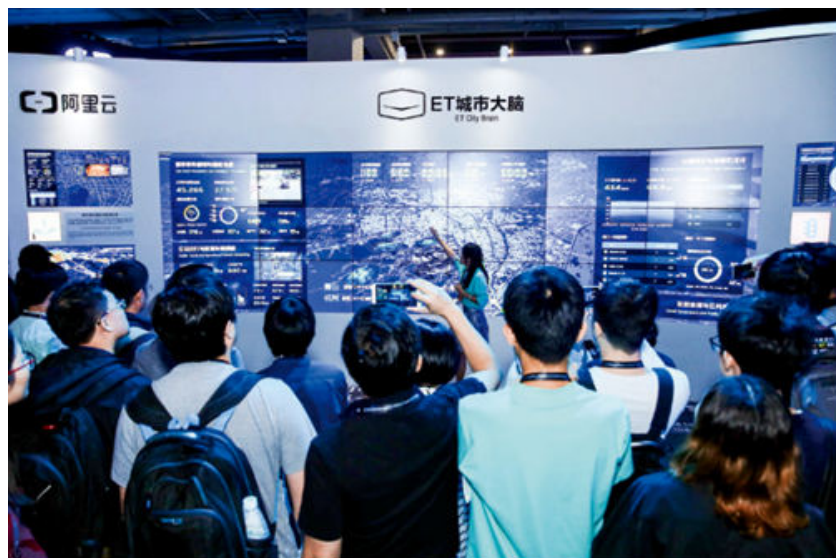
地而起。但他可能忽视了一点：中国大都市之外的一些地方看上去就像贫民窟。但那也改变不了中国领导人一往无前地推进计划。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有7亿多人口脱贫。现在脱贫速度几乎没有减慢：5年前中国还有1亿贫困人口，今天还剩不到4000万。互联网这个神奇的武器将消除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那样的话，到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时将有一个出色的成绩单。

就像在全国各地一样，政府也为佰你村稻农建设了一个电子商务站点，把村民纳入中国数据云平台，并教他们把收获的大米和茶叶装进自己设计的包装袋中，到网络平台上销售。监督佰你村数字建设和培训的一名党员干部毫不掩饰地说，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很困难，“当农民蹲坐在电脑前面时，对他们来说难度不亚于学英语。但他们会成功的”。到年底时，这位干部将让156名村民参与网上交易，他已经培训好了98人。

中国大云崛起

《经济学人·商论》,节选// 2月刊



杭州使用基于阿里云人工智能的“城市大脑”系统，大大改善了交通状况。

全球哪家科技巨头的“计算云”扩大最快？很多人可能会猜是亚马逊或谷歌，毕竟它们运营着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网络。但正确答案是阿里巴巴。2016年这家中国电子商务巨头的云计算业务增长了126%，达到6.75亿美元。这一增长势头一时不大可能放缓。阿里云总裁胡晓明希望在2019年前公司这项业务能“赶上或超越”亚马逊网络服务（AWS）。

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2017年AWS的收入估计在170亿美元左右。但是阿里巴巴的云业务（即“阿里云”）身处于一个繁荣的群体之中——中国云计算行业整体发展迅猛。而比这种快速扩张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云服务企业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西方同行有所不同。中国的云计算提供商使用的技术倒没有多大不同。其实西方的科技公司已经以开源软件的形式发布了许多必要的代码，中国的同行因而很容易就上手了。

不同之处在于对技术的使用方式，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中西方云计算的起源不同。在西方，云计算技术的第一批用户是创业公司，直到后来才有大企业光顾。在中国，云计算产生于消费者服务，包括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市场淘宝，以及第二大网络公司腾讯提供的在线游戏等。研究公司Gartner的曾劭清认为，中国的许多云服务还不能胜任复杂和主流的企业应用。然而随着这些服务的发展，它们将展现出巨大的潜力。长期以来，西方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使用复杂的内部IT系统，而且很多公司都难以割舍这些系统。而在中国，大部分公司的IT系统都不完善。

另一个不同之处源于监管。在西方，像政府机构和金融公司这样的组织往往与其他客户共享数据中心，而中国却有相互独立的“产业云”。例如，中国鼓励各大银行使用兴业数金这样的机构提供的服务，因为它符合最新的监管精神，而且用老板陈舸的话说，它让监管变得“更加方便”。

西方市场上AWS、微软和谷歌已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中国市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目前阿里巴巴、中国电信和腾讯领先，但曾劭清认为形势也可能起变化。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体量较小的玩家如UCloud也有可能迎头赶上。

表面看来，西方云应该能够保持领先。它们的规模仍旧大得多，并且有技术优势，例如在为人工智能服务处理大量数据的专用芯片方面。但中国云服务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外国竞争对手在这里难有发展。法律规定外国的云公司要想经营中国本地的数据中心，必须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位于其他国家的很多子公司很可能会选择本国的云提供商。

还有地缘政治因素。阿里巴巴会特别努力，因为它把云业务看做“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胡晓明最近表示，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给了他超越AWS的信心。或许有一天，这项计划会更名为“一带一路一云”。

缺乏本土化创新是中国“山寨综艺”主因

《联合早报》，节选//2018.02.05

韩国国会最近通过《文化内容产业振兴法》和《音乐产业振兴法》修正法案，为韩国外交部等政府部门提供法律依据，应对韩国文化产品被非法抄袭的问题。法案今年7月30日开始实施，未来韩国综艺节目遇到抄袭侵权问题，可提升到韩国政府层面处理。

提出修正法案的韩国议员在提案中，特别点名未购买版权就“拿来”的中国综艺节目，仅在去年就有七档。其中包括：《中国有嘻哈》被质疑抄袭韩国节目“Show Me The Money”；《向往的生活》被指与韩国的《三时三餐》雷同，连宣传海报设计都如出一辙；以及邀明星开餐厅的真人秀节目《中餐厅》，涉嫌抄袭韩国节目《尹食堂》。

中国综艺节目吹“韩风”并非这一两年的事。湖南卫视在2012年购买韩国版权引入《我是歌手》，在中国一炮而红；之后浙江卫视和湖南卫视又分别购买《奔跑吧，兄弟》和《爸爸去哪儿》等节目的版权，屡创收视佳绩。有

分析认为，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急剧下滑，导致一些地方卫视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购买版权，侵权抄袭之风愈演愈烈。但受访的学者指出，中国缺乏本土化创新，才是抄袭风盛行的主因。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指出，中国大量综艺节目，包括大红大紫的现象级节目，几乎都是对海外综艺节目模式的照搬；节目模式相互借鉴思维并非不妥，但缺乏本土化的创新却让中国综艺节目受严重诟病。他举例，韩国一些节目也借鉴日本和欧美模式，例如“Produce101”制作人就是从日本女团AKB48的选拔赛中找到灵感，但成功结合了韩国本土的练习生制度。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存在大量的模仿甚至抄袭行为，当中原因包括流行文化的本质因素、商业化运作的结果，以及中国在此领域创新能力不足。她指出，原创是文化个性的应有之义，自信的文化必须有自己的原创，而这需要一定的根基和土壤，包括开放的思考环境、稳定的经济投入、社会的认同、文化的传承

等。

韩国国会这次表态整治中国“山寨综艺”，得到中国网民和舆论力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朱康博士认为，这再次反映出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中国人都存在文化焦虑感，因为“经济上带来的骄傲感，并没有在文化上得到验证，看不到自我表达和自我确证”。

（杨丹旭）

环境&科技

如果地球真是平的会怎样？

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 2018.02.01

地球是球形的，但人们对于一个平坦地球的想象却从未停止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的一个博客解释了如果地球是平坦的，将会发生什么。

首先，一个平坦的星球可能没有重力。该地球观测站地球物理学家詹姆斯·戴维斯说，无法想象在这样的世界中重力将怎样产生，又将如何运作。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引力解释了地球和宇宙中诸多观测现象。能让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的力量可以使月球绕着地球轨道运转，还可以使太阳系所有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

认为地球是平坦的人想象着重力可以直接表现出来，但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个观点。人们对引力的认识表明，重力将会把物体向形成这个平坦地球圆盘的中心吸引。随着离圆盘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重力吸引物体的方向也会

变得越来越水平。这将导致某些奇怪的现象发生，比如，所有的水都将汇聚至世界的中心，树木和植物也会倾斜生长，因为植物只会朝着引力的相反方向生长。

然后是太阳。在科学支撑的太阳系模型中，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因为太阳体积更大并且引力更强。然而，地球由于在轨道上运行，所以不会撞向太阳。换句话说，太阳的引力并不是单方面起作用。行星也会在恒星引力的垂直方向运转；如果有可能消除引力的话，地球将沿着直线快速远离，并最终脱离太阳系。

平坦地球模型将地球置于宇宙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太阳会围绕着地球运转。相反，太阳会像旋转木马一样在地球上方旋转，如同书房的台灯，朝着地面发光放热。戴维斯说，如果地球是平坦的，无法想象什么样的力量能避免太阳和月球向地球靠近。同样，在一个平坦世界中，或许也不存在人造卫星。关于如何围绕着一个平面运转，戴维斯说，“一系列卫星任务都无法进行”。正因如此，戴维斯认为，无法想象“GPS定位系统将如何在一个平坦的地球上

工作”。

最强现役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香港商报网// 2018.02.07



被誉为世界最强大现役运载火箭的“重型猎鹰”发射成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它的创办人埃隆·马斯克再次来到聚光灯下。他刚刚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了“重型猎鹰”火箭。

“重型猎鹰”火箭是自“土星5号”以来，运力最强的火箭。在它首飞前，SpaceX首席执行官、硅谷“钢铁侠”马斯克非常忐忑。在其推特账号上，这位科技“狂人”一改往日的自信，说这只是一次试飞，只要它别在发射台上炸毁，

那就算试飞成功。如果发射失败，希望能暴露更多问题，这样才能吸取教训，不断进取。最终“重型猎鹰”火箭的首飞结果没有让马斯克失望。

公开资料显示，“重型猎鹰”火箭向国际空间站、神舟飞船等飞行器所在的近地轨道的发射能力飙升到了63.8吨，约是“猎鹰9号”火箭全推力版的3倍、航天飞机的2倍。同时，其向通信卫星使用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载荷的能力提高到26.7吨，向火星发射载荷的能力为16.8吨，向太阳系边缘的冥王星发射载荷的能力也有3.5吨。

而这次太空计划，除了要把自己家的特斯拉电动跑车送上天，马斯克还打算让车上全程播放1969年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大卫·鲍威的名曲《太空怪人》，主题正是讲述宇航员与太空飞船的故事。马斯克说，这辆跑车的目的地将是火星轨道，如果飞行的所有阶段都是成功的，特斯拉和它的乘客将围绕着太阳的椭圆轨道，直到火星。

据美国CNN报道，约300万人收看了SpaceX的现场直播，为之欢呼。马斯克说：“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会看到这场伟大的火箭发射，同时也会是他们见过的最棒的烟火表演。”SpaceX的“重型猎鹰”火箭不仅将特斯拉跑车送入太空，而且成功地回收了两枚一级助推火箭。SpaceX在去年年初表示，有两位“太空游客”为乘坐“重型猎鹰”火箭进行环月旅行而付了一大笔定金。SpaceX当时表示，环月之旅2018年可能会实现，不过后来没再给出新动向。

早在2017年9月，马斯克表示要在2020年在火星降落两艘货船，并计划建造“巨型猎鹰火箭”，如果火箭回收的部分可以“重复利用”，“人类探索火星的成本可以大大减少”。从科幻到现实并不是一蹴而就。从2008年9月28日“猎鹰1号”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到如今的“重型猎鹰”火箭的成功发射背后，有着SpaceX付出的巨大努力。“重型猎鹰”火箭的成功发射，标志着SpaceX用其开创性技术撼动火箭行业的设想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如今人类移民火星的梦想也前进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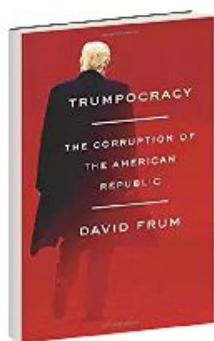
“重型猎鹰”火箭是目前成功发射的最强大火箭，超越了不久前发射成功的中国“长征五号”火箭。但中国正在规划发展更为巨型、媲

美“土星5号”登月火箭的“长征九号”火箭，势必夺回最大型现役火箭的桂冠。

阅读

特朗普是如何维系统治的？

《金融时报》/2018.01.19



迈克尔·沃尔夫所著关于特朗普的《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一书引发轩然大波，已经让特朗普与其盟友兼知己、另类右翼的史蒂夫·班农决裂，后者也是沃尔夫最大的信息来源。最近，班农辞去Breitbart News执行主席一职，因为他的金主对其失去了信心。他现在肯

定很后悔对沃尔夫如此坦言。我不认识沃尔夫，但我自己与班农等人进行过“不得引用发表”的交谈，觉得他的书基本上是可信的。

真相是，特朗普政府没有“教父”。尽管缺乏受人尊敬的权威人物，表演很可能仍会继续。要想弄清原因，应该去看看戴维·弗拉姆的《特朗普统治：美国共和国的腐败》。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发言稿作者的弗拉姆是最旗帜鲜明地表达“永远不要特朗普”的人之一。

弗拉姆发问，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到底是如何当上总统的？一个答案是，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比如，特朗普可以像魔鬼一样感知他人的愤怒——可能因为他本人也充满这种情绪。特朗普经常在集会上试用不同的“金句”来博得掌声，然后一直使用那些能够奏效的语句。特朗普还擅长与那些觉得自己被轻视的人群建立联系。

根据弗拉姆提供的数字，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非裔美国人相比，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白人在五十多岁死亡的风险要低30%；到了2015年，他们的风险要高30%。男性白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比例略低

于三分之一，却占美国自杀人口的逾三分之二。然而美国白人工薪阶级颓丧的精神状态却被主流社会轻描淡写地带过。

《特朗普统治》比《火与怒》更值得一读。特朗普政府的影响要远比沃尔夫所说的“白痴与小丑”深刻。特朗普的命运也将决定自由民主制度的未来。这正是可怕的地方。就像弗拉姆指出的那样：“民主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民主的失败也是如此。”要使民主失败，只需要好人的不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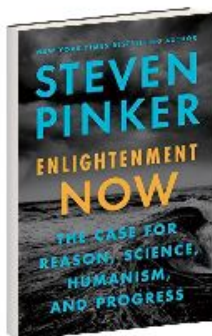
2016年10月，《走进好莱坞》节目的一段录音曝出后，仅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呼吁特朗普退出竞选。特朗普无视了他们。同比“抓私处”那段录音的文字稿曝光后32分钟，维基解密对希拉里的邮件进行了到那时为止的最大一次披露，包括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约翰·波德斯塔的邮件。之前呼吁特朗普退选的共和党参议员中，大部分人坚定站在了特朗普的身后。大选期间，曾在“永远不要特朗普”公开信上签名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约一半人加入了支持特朗普的行列。

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从之前回避特朗普的

金融家手中筹集了1.07亿美元的捐款，这是之前纪录的两倍。曾支持“永远不要特朗普”运动的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保罗·辛格捐了100万美元。2017年前四个月，位于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的收入比预期高410万美元，而同期其他酒店入住率持平或下降。与此同时，像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这样的共和党资深人物也开始例行公事地对特朗普大唱赞歌。党内的看门人也决定把质疑咽回肚子里。“尽管他们私下里有顾虑，但正是他们的公开行动，维系了特朗普统治。”弗拉姆写道。（爱德华·卢斯）

比尔·盖茨“平生最喜爱的书籍”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2018.01.31



在短暂地涉猎小说和诙谐的回忆录后，比尔·盖茨的阅读又回归到宏大的理念。这位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慈善家读完了他最新“平生最喜爱的书籍”——史蒂文·平克的《当下的启蒙：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由》。

盖茨坚信资金和科研能够解决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因此他选择这本在文明层面上论述乐观主义的书籍不无道理。盖茨与认知心理学

家、系列畅销书作者平克互相欣赏。平克称盖茨是抗击致命传染病的世界领导者之一。平克回忆说，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995年，从此因他们对人性共同的乐观态度而建立了联系。“当时我们对语言和心理计算有共同的兴趣。我们随后平行前进，以对人类进步的兴趣为终点。我们都被表明人性进步的数据所震惊。”在平克的新书中，他论述道，世界各地的民众都比之前更加快乐、自由，原因是启蒙时代关于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想。他说，贫富差距、践踏民权、种族歧视和特朗普所代表的灰暗和倒退不应当妨碍人类所取得的总体进步。盖茨以事实举例说现在美国人被闪电击中死亡的概率比1900年少37倍，并不是因为闪电变少了，而是因为天气预报和安全教育有了进步。

盖茨在博客中写道：“全世界的民众都更加长寿、健康、快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事情正在变糟呢？我们为什么要掩盖积极的新闻故事而揪着那些消极的新闻不放呢？平克很好地揭示了我们为什么被悲观主义所吸引，这个本能如何影响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

军事

中国无人舰艇成功首航：维护海洋权益重要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8.02.03



作为逐步建立一支可以支持其海洋安全的蓝水海军的最新动作，中国进行了无人驾驶水面舰艇的首次航行。军方《解放军报》2月2日报道说，HUSTER-68无人艇于1月在广东东莞成功进行了首航。

由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全长6.8米的全自主无人艇在松木山水库执行

了巡逻航行，多艘无人艇形成编队对目标进行圆形围捕。该报道说：“该项目创新团队克服了颠簸大、通信弱、易掉队等问题，最终实现了多无人艇的协同编队。”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其官网发表的一则声明中称，全自主无人艇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管控国家水域资源的重要工具，体现了国家蓝海战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海洋安全项目研究员高瑞连说，无人驾驶的水面舰艇在和平时期和战争中都有用。在海事执法中，它们可以用来对海上的潜在危险状况展开近距离调查，并且能够在不使人员处于险境的情况下与目标进行接触并作出反应。高瑞连说：“在南中国海，这些无人艇甚至有可能成为侵扰外国船只的工具。”他补充说，它们还可以用来执行饱和攻击，并构成庞大的群体。

海军专家李杰认为，该无人艇的主要功能是搜寻、调查和阻止海上目标，但他补充说，在不知道其最大航速的情况下，难以评估这种无人艇执行这些任务时会有怎样的效率。他还表示，《解放军报》的报道特别提到了无人艇的编队控制，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构成不同的队

形对目标实施包围。不过，李杰指出，尽管中国处在无人驾驶水面舰艇技术领域的前沿，但仍然落后于美国和以色列。他说：“进一步推进无人艇的开发可以大大降低中国海上军事巡逻的成本及潜在伤亡。”

特朗普令人不安的核计划

美国《外交》杂志、CNN网站/2018.02.05

美国的核政策没有致力于减少核危险，反而体现了美国对手的逻辑，并且愿意追随它们进入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五角大楼新发布的核政策报告如同特朗普总统一样，看到的是一个黑暗而充满威胁的世界。《核态势评估》报告没有给出阻止世界变得更危险、降低对核武器依赖性的计划，而是采纳了美国对手的逻辑，积极接受了核竞争。

《核态势评估》的核心观点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盟友，美国必须加强对核武器的依赖性，而这彻底逆转了奥巴马政府为降低依赖性而付出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核态势评估》不仅建议替换老化的核武器，而且要添加两种新型导弹作为“补充措施”。它扩大美国可以考虑动用核武器的范围，包括了对基础设施发动“非核战略打击”的含糊情况。

评估报告还包含了一系列其他措施，而这些措施可能会制造一个核竞争随处可见的世界：提升制造钚核的能力以备美国大幅度扩充

核武器库之需；训练常规部队与核部队并肩作战；出于象征性的原因，提高安放在欧洲的大约150枚核武器的战备状态；新产生的对军控措施的不信任态度，等等。评估报告一反常态地包含了一些愚蠢、矛盾和具有误导性的说法。它把非常尖端的系统与无限期推迟的系统相提并论，甚至包含了朝鲜未经证实的导弹。

除了承诺将实施奥巴马政府“维系和替换”核武器库中几乎所有系统的计划外，评估报告还呼吁采取两种“添加措施”：一种是新型低当量海基弹道导弹，一种是新型海基巡航导弹，用于替换海军在20世纪90年代淘汰的导弹。但评估报告未能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拟议添加系统的必要性。

《核态势评估》体现了对威慑的过时和简单化看法。它认为核武器具有无可匹敌的威慑效果，所以更多选择就意味着更强的威慑。然而，当今的军事规划者对威慑有着更加复杂和微妙的理解。他们打算在不同领域使用一系列能力，以期对具体威胁产生适当的战略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必须发出核威胁才能吓阻袭击行动。

不过，另一些情况下，更可信的办法是，在网络领域和太空用制裁或常规武器让对方付出惨重代价。该报告最严重问题是对世界的扭曲看法、有关威慑的过时理论及其倡导的作战方式，而这一切已经完全不适用于当今的威胁。如今，美国的核政策没有致力于减少核危险，反而体现了美国对手的逻辑，并且愿意追随它们进入一个更危险的世界。

另据美国CNN网站2月5日披露，这份报告最初因内容冒犯日韩，还被迫“回炉”。早些时候，该报告草稿中的一张图表将朝鲜国旗插在了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区域上。在报告对外发布前，这一错误被发现并得到纠正。此外，该报告在一个描述俄罗斯的图表中将日俄有争议的岛屿包括在内。在《日本时报》指出有关“错误”后，美国国防部网站暂时撤下了该报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防御态势项目资深研究员亚当·芒特说：“虽然是无心之过，但这会加剧与亚洲盟友之间的摩擦。”

封面故事

国企大混改

记者 / 张弛



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掀起高潮。

2月7日，国资委召开的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通气会上，多家央企负责人明确表态持开放态度，下一步将加快混改步伐，通过上市公司、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实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融合发展。

在1月中旬至今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几乎所有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涉及“混改”的内容。

如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将推动省属重点企业引资重组，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比提升，支持优势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一级企业整体上市或主业上市。

新一轮改革始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该议题再度火热，源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

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变革中的重点，因为国家控制的企业必须在追逐利润和支持政府政策之间找到平衡。近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增长停滞，愈发显示出“中国式”国企难以企及的优势，但这无法掩盖中国国企面临的三大压力：亏损面扩大、债务高企和信用危机。某种意义上，国企改革结果如何，直接影

响此次经济改革的成效。

然而，无论是国企整体股份制改造、核心业务资产上市还是引进外部投资者，要对已经深植入中国经济体系中的国企“动刀”，远比人们想象中困难。这些巨无霸企业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有时甚至能够抵御来自政治上的压力，而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也是让政府考虑再三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政府也迫切希望解决一部分大型国企垄断市场的局面，但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国企毫无疑问仍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国企私有化是大部分西方国家解决国企难题的最终路径，不过在中国，这条路显然行不通。此轮国企改革的路径，采取的是国有资产处置方式的分类监管，也叫混合所有制，即在国家不失去控制权的前提下让民企持股。这种新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都放在分类的前提下——将国企分为公益类、商业一类、商业二类。

但问题在于，资本总是逐利的，混合所有制对于国企减负能有多大帮助，还得取决于民企的投资意愿。国企的债务体量已经过于庞

大，如果民间资本参与的预期回报率不高，风险与收益不能对称，则无论是债转股还是混合所有制，都难以撼动这一庞然大物。

种种争议声中，伴随中国联通等多家央企混改试点大幕的拉开，以混改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探索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方面，央企公司制改制圆满收官；另一方面，陆续召开的央企年度工作会议亦对混改等改革措施落地做出部署。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公司制改革收官意味着央企全面进入公司制时代，这为混改、资产证券化、授权经营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创造了前置条件。2018年将是国企改革“施工年”，混改进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铁路、电信、军工等垄断领域将是混改主线。

大混改时代开启

不同时期 中央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不同提法

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央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法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明显变化。



2018年伊始，多家央企相继宣布完成公司制改制，尤其是军工和科研院所类央企加速收尾。1月3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已完成公司制改制，并于2017年12月27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企业名称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变更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此之前，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国家电网、中国中车、中国移动、中国石化等多家央企均已完成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

本次央企公司制改制，最主要的变化即是央企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两者区别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存在股东，由上级主管机构主管，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后，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落地，明确了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党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企业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改为由股东委派董事，董事会选择聘任经理层。

集中改制，只是央企的一个规定动作。根据国资委的安排，69家集团公司及2600多户下属企业2017年要完成改制工作，涉及8万亿元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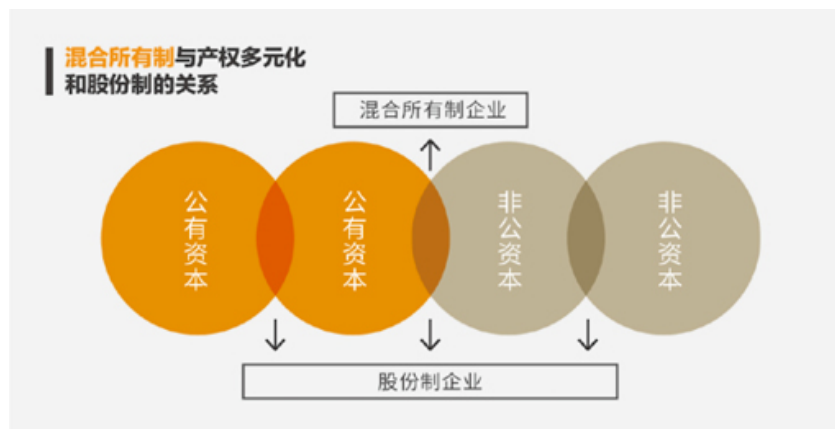
部资产。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1月15日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召开前，各省级国资委所监管一级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近97%，辽宁、福建等地国资委所监管一级企业全面完成改制。

“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央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认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改革。“保证同股同权、有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严格的内外监督等条件，为授权经营体制、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改革创造前置条件”。

公司制改制的完成，为2018年混改提速攻坚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共31家已经确定，其中中央企业子企业是10家，地方国有企业21家。与前两批混改试点入围企业有所区别的是，第三批试点范围扩展至地方层面，入围的中央企业子企业中超半数为上市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1月15日的会议上表示，今年将选择具备条件的央企推进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公司

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他还表示，将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改，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混改试点。健全混改企业治理机制，探索优先股、特殊管理股制度。



在近年出台的众多国企改革措施中，混改是最受市场关注的措施之一。一种观点认为，混改是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措施，从产权上破除部分产业垄断的问题，也为社会资本找到有战略价值的投资方向。

2017年，国企混改已初步形成“突破”之势。几乎所有省市下发的关于国资改革的指导意见，都把混改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向。前两批19家中央企业试点的重点任务正在逐步落地，超过1/3的试点企业已基本完成引入投资

者、设立新公司、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内部激励机制等工作。国资委披露的数据显示，通过混改，前两批试点企业将引入各类资本约3000亿元，涵盖国企利润最高的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七大垄断领域。

华泰证券研究员陈亚龙认为，2018年国企改革有望大规模铺开，混改仍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主线，通过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上下联动全面深入推进国企混改，混改进度有望超预期。大混改时代开启，首推资产证券化率低、市场空间大的军工混改。

在混合所有制之前，中国曾一度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国企，以最大限度提高收益。控股公司的使用，是基于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控股公司的一种模式，它曾被视为国企私有化与现行制度之间的中间途径。在现行制度下，国企高管任命要经过中共组织部门的批准，而且政治考量往往先于商业考虑。但这种模式会加强中国经济的“虚假”投资：通过在现有资产间转移资金而产生利润，不过并没生成新的经济活力。

因此，缩减规模也是此次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国资改革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2017年中国国电与神华集团等3组7家央企实施重组，使得国资委监管企业精简至98家。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对国资改革作出部署：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分析认为，明确做强做优做大的对象是“国有资本”，而非“国有企业”。这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推动国企结构调整与重组、“僵尸企业”处置等实现更大进展。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资改革的新部署，将助推国企更充分地走向市场。

就在央企改革轰轰烈烈推进之时，以山西、上海、广东等地为代表的地方国企，也频频试水改革。例如山西，通过成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将持股的国企股份悉数划归其账下，从而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同时在混改领域，山西又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发行可转债等方式，逐步调整国有

股权比例，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

肖亚庆称，2018年将聚焦国家战略领域，坚持市场化导向，加快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专业化重组力度。例如，稳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战略性重组。同时，以拥有优势主业的企业为主导，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专业平台作用，持续推动煤炭、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资源整合。



2017年11月28日，由中国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合并重组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是中国能源领域又一家“航母级”央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火力发电公司、可再生能源发电公司和煤制油煤化工公司。

国企混改的联通样本

作为首家整体改制的混改央企，联通混改备受市场关注。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认为，中国联通的混改是真正意义上的混改，是国有资本 + 国有资本 + 民营资本 + 员工持股的混合，引入的资本既有国有资本如中国人寿保险，也有非国有资本，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都进入了，还有员工持股。

“为什么选择联通进行混改呢？因为联通是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选择带有垄断性的大型国企混改，有利于从微观基础上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主体，也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进而在宏观经济上推动竞争性市场的形成。这点也是深化国企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季晓南称。

在已经敲定2018年1月前基本完成员工持股名单外，中国联通的人员分流重组亦有明显进展，即便是集团管理层，也有多人“退出”。“中国联通混改模式可视为未来国企改革的新方向之一，IPO上市或资产注入（包括借壳）也是一大亮点。”谈及国企混改下一步的动

作，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

对于人员分流问题，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并不避讳。他在日前北京举办的一个讨论国企混改的论坛上表示，中国联通先后已有14名正副职管理人员“退出”，党组管理人员的退出率超过6%。而高层管理人员“退出”，不再是一朝一夕的行为，“今后每年会有1.5%的常态化退出比例。”王晓初表示，从管理层面上，“破除到龄转任非领导职务制度，改变过去‘退居二线’人员长期处于半休养状态。”

“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好事，作为中国联通混改的直接操刀手，我感到改革充满压力、痛苦和挑战。”王晓初称，国有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头”越来越大，“四肢”越来越小：内部管理人员越来越多，接触客户的人员越来越少。特别是中国联通经过多次融合重组，机构不断重叠，矛盾日积月累。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国企改革重大任务的逻辑关系



据王晓初介绍，在推进混改的过程中，他们首先从改革臃肿的机构入手，总部带头由27个部门压缩至18个部门，减少了33%。“但是庙拆掉了，和尚不好安排，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在这个论坛上，一位国资委的官员就当面向王晓初表示，“我们家的亲属在联通担任领导职务，她一直害怕自己被裁员，大家都很担忧自己的岗位。”对此，王晓初笑而不语。

王晓初还透露，有3%的员工将被纳入股权激励计划。根据2017年8月公布的《中国联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首期授予方案（草案）摘要公告》，联通将向核心员工首期授予不超过约8.48亿股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

不超过约32.13亿元。

“核心员工”的目标人群是“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人员名单将公示5日。“正式发文公布入选名单后，将兑现待遇。”有内地媒体披露，联通已于2017年底展开了“人才遴选”工作，并将人才评定为ABCD四个级别：领军人才、专家人才、骨干人才和新锐人才。其中C级骨干人才占比为3%，D级新锐人才占比为6%，而B级专家人才占比为0.6%。

“让核心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人数约占全体员工的3%。主要是为了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同时让企业的经营者与国家利益、党的利益、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王晓初称，“但是员工要得到期权，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据了解，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以及由公司控股股东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

与此同时，中国联通下属分公司也在进行薪酬体制改革，“今年不会有太多变化，但明年收入要看业绩。”王晓初明确表态。但据联通下属子公司一位人士透露，2017年下半年他们的

收入下降非常多，大约15%。此外，一些福利也相应减少，“包括一些通讯补助也被取消了”。

王晓初介绍，这次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如BATJ等互联网公司、垂直行业公司、金融集团、产业基金等，最近联通与这些战略投资者在九大领域里开展了合作。“很多人担心，互联网公司之间都是竞争关系，董事会如何处理。我们把不同领域分开，利用各个互联网公司的特长，分别开展多个领域的合作。通过这种共同合作、要素互补，在董事会成立之前，公司与各个股东关系变得非常和谐，产生了新的火花，不但没有出现外界的担忧，还有效提高了公司的创新能力。”

王晓初称，混改最大的落脚点在“改”，这也是公司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混”的核心就是股权变革，目前中国联通关于“混”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这次中国联通持有A公司股份由62.7%降为36.7%，而战略投资者持有股份达到35.2%。虽然国有资本合计持有53%，但最大的变化是国有股权实现了多样化，公司治理结构不再是“一股独大”，避免出现内部人控制或内

部人说了算，切实保护了小股东利益，使得公司更加市场化。

这些看似变化很小，但对央企来说，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作为对照，从2015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已首次突破具有相对控股能力的临界点33.3%。而联通混改股权结构的上述安排，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电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和控制有关。

尽管如此，联通混改能如此大比例地“让渡”股份给民企，仍然收获了市场的意外和惊奇。有海外观察人士称，本轮混改完成后，中国资本市场分散股权结构的基本态势将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模式下，控股股东对从董事会组织运行到管理层日常决策大包大揽的时代行将结束。在股权分散时代，面对外部接管威胁，甚至“野蛮人”入侵，公司治理更多依靠利益各方的协商和妥协。如何顺应上述转变，成为包括联通在内的很多国企改制公司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

联通方案中让外界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因素，是推出了跟盈利目标挂钩的“核心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在此之前，中国国企从未获准实

施股票期权奖励。“我们认为，为员工股票期权行权设定的经营指标，显示出管理层拥有雄心勃勃的目标。”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的中国电信业分析师李裕生(Edison Lee)表示，“目前这些指标高于我们的预期，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央企代表热议报告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企。

改革内生动力不足

对于国企改革而言，混合所有制不是一个新概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到今年已经25年了，正式使用这个概念是1997年的十五大，到今年也

已经20多年了。即便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后，改革的推进也并不顺利。

“有媒体提出，中央关于混改的提法是不是后退了。我说，不是后退，是更加符合混改的实际。但要承认，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确实会影响到各方面对混改的积极性问题。”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表示。

季晓南在论坛上说，如果双方特别是民企对混改没有积极性，混改如何深入推进？为什么联通混改BATJ愿意进来呢？能拿出多少像联通这样的资本来混改呢？是不是所有国企混改民营资本都愿意进来呢？这些问题都涉及混改动能问题，也是深化混改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他认为，推进混改的动能，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获取：从内部看，国企混改是国企高管、业务骨干和员工的普遍期望；从外部看，混改被委以国企改革“突破口”的重任，是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也是社会各界的普遍期待。

针对当前混改存在的“国企不愿混、民企不

敢混、职工不想混”的现象，季晓南坦言，实施混改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较小规模的民资如何在体量庞大的国企中获取话语权，国企、民企如何应对管理上的差异，国资监管与国企党建如何开展，如何防止国资流失，内部员工能否持股、是否会失业，垄断行业如何开放、资本市场如何承载，等等。

“当下混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只有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混改才能真正落地。”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瑞龙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本轮混改一定要触及央企总部，使央企总部按照国有资本授权体系进行改革，成为一个纯粹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主体。“本轮混改的重心在自然垄断行业，这类混改国有资本仍将占控制地位，而在竞争性行业，尤其是主业之外的副业，应当让渡部分控制权给参与混改的企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则强调，一定要保护非国有股东的法定权利。“面对国企混改，很多民间资本很纠结，他们忧心参与混改时即使获得一定的股份也没有

相应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如果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但能激发其积极性，也有利于国企转换机制，两者优势互补，中国是很有可能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企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完善产权制度，也直接涉及动能问题。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以前的股份制改革受到热捧呢？因为无论是股份制改革还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季晓南称，但如果仅仅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不调整产权结构，还是不够的。十五大强调国企的股份制改革，目前大量国企资产已经改制上市，但股份制并没有真正转变国企的体制机制。

以联通为例，张文魁表示，联通混改前已经在A股和H股上市，引入了境内外投资者，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之所以还要做混改试点，正是因为其“一大众散”的股权结构不足以带来治理体系上的改善。“此前联通国有股‘一股独大’占比60%多，其他股东全是没有话语权的散户，影响不了决策，也很难与大股东制衡，因而无法发挥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等作用。”

再比如东北，上一轮振兴的“黄金十年”，

不少国企热衷于“靠大联强”，但规模的做大、级别的提升，并未带来体制机制的根本优化。“以辽宁为例，上轮跨省重组的东北特钢，由央企中铝集团并购的抚顺铝厂，近期生产经营都步履维艰。”长期关注国企的当地高校经济学者表示，一些企业缺乏长远眼光和忧患意识，在经济困难时期“脓包”自然会破掉。

此外，国企改革急需解决在财政、税收、人事等方面的体制障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改革推进机制和协调平台，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民企参与混改的积极性。杨瑞龙表示，当前民资由于无法突破“进入壁垒”而对混改缺乏热情，这需要向民资开放更多垄断性行业，部分领域要让渡更大的控制权。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还隐藏着一些“雷区”。出于对国资流失、利益输送等的担心，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在混改中“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国企担心被扣上决策失误、资产损失的帽子；民资则害怕“秋后算账”挨板子，改革合作难以建立稳定预期。

有国企负责人表示，改革有风险导致一些国企负责人有顾虑，其中“国资流失”是悬在改

革者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改，即便是一堆“破铜烂铁”，但账面资产还是不变的；如果改革，账面资产就会缩减，确实存在风险。

“这些风险如影相随，让部分国企领导产生了‘牧羊人心态’。”西北省份一家化学工业企业的董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就像“羊养得肥瘦不管，但不能死掉”一样，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干得越少反而越安全。

干得好的同样担心。一家通过混改转换机制继而扭亏为盈的大型冶炼企业，职工收入和上缴税收均大幅增加，但主持该企业经营的民营老板却更加迷茫：“现在公司搞好了，会不会有人说当初的股价贱卖了？”“这家央企会不会按原定计划，逐步将大股东位置让出来？”“现在公司效益好了，央企会不会将我们的股份收购回去？”

目前中国已在10家央企子公司中正式启动首批员工持股试点，季晓南介绍，持股对象主要是关键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业务骨干人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组织任命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不允许持股，国企领

导人就缺乏混改的动力。”杨瑞龙则认为，当前要鼓励国企领导人的改革勇气与胆识；另一方面一定要建立容错的制度安排，对改革者要有恰当的保护机制。



2017年8月16日，中国联通在香港公布了上市公司（红筹公司）2017年中期业绩。根据业绩报告显示，在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形势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效果初步显现。

改革究竟能走多远

国企改革要取得大的进展还很难，但不改革的后果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目前再度大力推进国企改革的逻辑。但国企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如此之艰难，尽管有中央的强力推动、企业自身的困境倒逼，又有联通模式的快速推

进，外界对此轮改革的最终成效仍不乐观。

“混合所有制对改变联通的行为起不了什么作用。”研究公司TS Lombard的分析师们在评价这家中国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时说，“相反，这是中共将影响扩展到私营部门的最新迹象。国企改革从私营部门吸走了资源。”

“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任何行政命令皆出自政府，包括改革的规划实施和监督也是由政府一手操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不可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对于此轮国企改革，独立学者邓聿文并不乐观。他认为，改革到下半程，必然指向政府自己。此处的政府，指的是包括党在内的行使公共管理和统治职能的权力机构。

“在所有改革中，最难的也最具关键性意义的是国企改革。但如今，国企改革却夹在两个趋势的中间动弹不得：一个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一个是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认为，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推动国企市场化；既要央企领导限薪，又要推动“国有企业家”和“产权激励有效”。这些复杂的信息，令地方政府和国企无所适

从、进退维谷。

在去年9月的一次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犀利指出：近十多年来，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在不断加强，每个企业头上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央企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各类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做体制内、体制外，政府和银行对其有亲有疏，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行使职能的工具，推进经济增长的抓手，承担社会职能的基本单元。而党政部门则分兵把守在企业之外，管理着本该由股东会、董事会管理的人和事。

刘胜军认为，客观地讲，十九大之前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股权结构层面取得重大突破，但依然面临从“形式改革”到“实质改革”的挑战。不解决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混合所有制改革、管资本等目标便难以取得大的进展，即使“混改”了，依然停留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老状态。

他表示，破解这一困局，唯有靠思想解放。关键是要避免机械、教条主义地对待党的领导这一问题。《指导意见》有这样一句表述：“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问题

是，如何才算改进？

思想解放就是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例如：《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而十九大报告则改为“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国有资本”不一定以“国有企业”的形态存在。例如中投2012年入股阿里巴巴，到2014年短短两年就实现400%的收益，这算不算“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当然算。如果能落实“管资本”的理念，下决心走向“淡马锡模式”，国企改革将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7年6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举办“2017年第二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专题培训班”。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离不开思想解放”，刘胜军说。他在新近给媒体撰写的文章中写道：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这一问题有穿越历史的阐释，“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⑤

人事任免折射国企改革提速

记者 / 张弛

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最近喜事连连。刚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又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紧接着他进入中国联通董事会。

2月8日，央企巨头中国联通举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会上选举了王晓初、陆益民、李福申、尹兆君、卢山、李彦宏、廖建文、胡晓明8人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冯士栋、吴晓根、吕廷杰、陈建新、熊晓鸽5人选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彦宏入局联通，只是中国推进国企混改的其中一个环节——通过更多引入非公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并试水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2016年9月底，中国联通被列入首批国企混改试点单位。2017年8月，联通发布公告，拟引入约780亿巨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京东、中国人寿等多家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混改。

根据联通的混改方案，以上公司通过投资持有了联通的股份，就会在董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此次当选的13名董事中，有8位是非独立董事，其中3人来自中国联通，分别是：董事长王晓初、总经理陆益民、副总经理李福申。其余5人均为此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代表：中国人寿副总裁尹兆君、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卢山、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廖建文、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胡晓明。

改选完成后，在联通的非独立董事中，国内互联网四大巨头BATJ已占据“半壁江山”。当然，这并不代表BATJ基本掌握了联通的“话事权”，混改后联通的股权结构为联通集团公司占36.7%、战略投资者占35.2%、员工股权激励占2.7%、公众股东占25.4%。在互联网公司中，腾讯占5.18%；百度占3.30%；阿里巴巴占2.04%；京东占2.36%；苏宁占1.88%。

不过，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对于未来联通的业绩，他们会有相应要求，对集团的发展战略也会提出规划与意见。外部投资者入主董事会，除了对联通治理机制的改善，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也将更加深入开展。有业内专家表

示，虽然具体的经营管理不太会涉及，但此次更多董事的加入，有望改变中国联通以往的风格，通过压力倒逼中国联通更加市场化，有利于参股企业双向的合作。

此前，外界对国企混改最大的担心是“出钱也进不了董事会”，现在这个结果大大超出预期。方正证券发布研报认为，非国有股东的引入，有利于公司优化调整董事会、监事会结构，建立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公司长期治理机制有望得到改善。

除了混改标杆中国联通，国企权力体制层面的其他重大变革也正在发生。



总经理由任命改为提名

岁末年初，各大央企曾迎来一轮密集的调整变动，其中既有董事长、总经理的人事任免，也有关于股权、所有制及治理结构的变更。经过改制，国企经理层的角色由负责人变为执行者，由上级任命变为董事会聘任。

1月22日，国资委发布一则“11家央企80位领导人员职务变动”的消息，其中数名央企总经理职位由过去的“任命”改为了“提名”，他们最终能否获任命，还要通过各自公司的董事会票决，这是中国国企推进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探索。这意味着，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不再

对中央国有企业的经营进行直接管理，授予公司董事会层面更多自主权，而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则主要往资本管理的方向转变。

例如，国资任字〔2017〕118号文件显示：经研究，任命刘化龙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提名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提名贾世瑞、魏岩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

“总理由国资委任命改为提名人选，其任命权交给董事会，是改革授权经营体制迈出的重要一步，这触及到了国企改革的核心。”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撰文称。李锦认为，国企实行公司制的关键是董事会的地位与权力，而经营体制改革的焦点是经营高管的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如今这一条开始落实。

“开始以为都是副总经理”，有国企研究专家表示，结果国资委的提名包括多位总经理。“这说明此次改革力度令人惊喜，不是先提名副总经理过渡一段时间后再提名总经理，而

是直接就提名总经理，可见有关方面改革决心很大”。

当好国企的出资人，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这次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去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明确了精简的国资监管事项共43项，其中8项授权事项就包括“经理层成员选聘、经理层业绩考核和经理层薪酬管理”。

就大背景而言，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环境正日益改善。2018年1月15日，北京举行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披露，2017年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企业市场化基础进一步筑牢，中央企业及子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基本完成。诚如李锦所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不是追求形式上有变化，从政府管理的企业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是要在运行机制上做出实际改变。这有利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党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

一位来自国企的高管认为，这种形式的权力让渡，说白了就是内行人做生意，外行人管

好内行人，整体大局就是体现了国企改革
的“革”字。“‘改’只是除去巨大弊端，规避重大陷阱，完善内外体系，保护国有资产，而‘革’字就深刻多了，它体现在自我突破，具体讲就是‘放权’”。他具体分析称：过去国资委选人、任命，现在国资委选人，企业董事会包括各方股东、党组织共同任命。国资委让出了部分权利，同时也卸掉了部分责任。企业党组织在任命上获得更多发言权，实际上增强了国有资产的安全性。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有财经评论人士在媒体撰文，呼吁给予央企总经理提名多一些选项。因为从这次发布的信息来看，国资委针对多家央企所提名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人选都只有一位，央企董事会显然没有选择，要么接受并任命，要么建议重新提名。“考虑到总经理人选是国资主管部门提名，恐怕央企董事会不会拒绝。这给人的印象，任命制改为提名制只是形式变化”。

文章称，无论是国外很多企业，还是国内部分民企，企业董事会或老板在任命总经理之前都有多个候选人或者提名人，有了选择空间

自然能选出更好的人才。如果候选人或者提名人只有一个，董事会没有选择机会，除非这个人选非常优秀、非常适合企业，否则，企业就不是一次成功的“选帅”。

党建与改革：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1月15日的会议上表示，2018年将推动央企集团层面全面建立规范董事会，并探索建立“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方式。

其中，肖亚庆提到的“企业党组织内嵌公司治理结构”，正是中共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一种观点认为，“国企”，就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数字经济学即简单的“公司”概念。

这种特殊性，从很多国企董事长的新名片上就能发现。自2017年开始，很多大型国企董事长都更换了名片，新名片的头衔普遍加注了“党委书记”。在中共高层的讲话中，党委在国企内普及符合“全覆盖”这一更大战略。

这一度令外界感到惊讶。“我当时想，哦，

真新鲜。他以前从来没有提过党委。”一家美国跨国公司中国业务的负责人在同中国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坐下来谈话时，他的这位老朋友递给他了一张新名片。多年来两个人经常会面，一起研究探讨双方的合作事项，但这一次，这位中国高管不再仅仅代表他的国有企业。

事实上，中共在国有企业内部设立代表委员会已有数十年之久，但这些组织的地位曾一度被淡化。在香港，中国大型国企的国际上市子公司已习惯淡化与党的联系，但自2016年开始，它们已重新起草章程，正式建立以前只在集团层面存在的党委，并承诺所有“重大公司事项”，要先经党委讨论，然后才呈交董事会。

国资委去年曾表示，近百家中国大型国企已正式修改了公司章程，强调“党建”活动的重要性。纳入规范董事会建设范围的74家国资委下属企业的董事长，现在也成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党委负责人，进一步反映了党在国企内的更高地位。

在被冠以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光鲜称谓的同时，国企掌门人又是中央管理干部序列的省部

级或司局级高官。亦政亦商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能够在政企两界担当重要角色，这种任职方式的正面意义是使部分行政领导懂企业懂市场，但也被舆论诟病为政企不分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指其给掌门人们预留后路，难以让其以一个完全的市场主体身份运作企业，享有特权。

正因如此，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落马的央企高管中裙带关系的现象异常突出，央企高层频现变动，展开了跨领域、跨系统的调整。有内地媒体评论认为，这对解决央企内部不适宜的寻租关系是有利的，也阻断了原有既得利益群体的链条，对于央企目前推进的改革来说是有利的。

作为企业的国企，到底有没有行政级别？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许保利曾对媒体介绍称，原本企业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只是“一把手”多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因此才被惯称为“副部级”；还因为这些企业最初成立时的“一把手”曾是副部级干部，于是便由此顺延下来。

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曾提

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时至今日，央企领导的行政级别事实上依然存在。而因为央企高管具备与政府官员同样的晋升级别，政企之间跨界调动，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干部培养途径。

从以往央企中委和候补中委的流动情况看，转至政府任职的占了大多数。这表明政企交叉任职已成为中央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大抓手，越来越多的央企掌门人正补充到党政干部队伍中，而军工企业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以7名出身央企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为例，掌管2000亿美元的中国主权基金掌舵人楼继伟，从中投公司董事长、中投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董事长转任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被任命为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出身军工企业的张国清、马兴瑞、许达哲转岗政界后仕途一路攀升，相继走上省级党政“一把手”高位。如今，拥有航空航天系统履历的部级官员已不鲜见。而“航天系”只是军工系统官员“走俏”的一个缩影。这背后的逻辑，是技术型官员越来越被认可的趋势。

有内地媒体评论认为，从中国军工行业走

出来的这些官员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如执行能力强、善于在高压下突破创新、具有强烈的忠诚度和荣誉感等，而且基本没有官场现实利益的牵扯，这些都是组织部门十分看重的珍贵品质。

十八届7名央企中委中，唯一留任央企的是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他曾荣获2013年第十四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6年4月，内地第一财经网站报道称，林左鸣因为身体原因提出病休，由中航工业集团总经理谭瑞松暂代其主持工作。

和十八届相比，十九届“两委”中国企委员数量减少。国务院国资委系统中，除了党委书记郝鹏和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肖亚庆当选为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央企和中央金融企业高管中无人当选中央委员，此外，有20位央企高管、5位非高管国企职工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位央企高管当选中纪委委员。而十八届中委选举时曾有7人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则有18人。

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突围

一方面在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一方面又强调要探索建立“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这显示出中国国企改革中的“政治考量”。“看似左右摇摆的国企改革，其实涉及了经济和政治两大考量，在左右之间尝试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因此给外界的感觉总是模棱两可。其实这就是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两种思路在国企领域的表现而已”，有海外媒体这样评论。

中共十九大后，国企深化改革成为未来几年的重点改革领域，而其方向就是更为市场化的改革。其中，深化公司制改革是最初的一步，如何确定董事会的地位和权力，以及管理层以市场化的机制方式产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都属于公司制改革的内容。

截至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但诚如肖亚庆所强调的，这只是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其实，国企改革深入下去必然涉及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就是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国企“私有化”问题。是否进行国企私有化，涉及到经济问题，又涉及政治问题。

中国之前采取的一种折中的方案，就是进行“混合所有制”，即在坚持国有资本控股的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的私有化。方式比如整体上市、民营企业参股、员工持股等。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国企改革进程中实际在运作和推行的。

但这种稍显保守的改革受到不少市场派人士的质疑，因为混改中私有资本投资人很难享有实际决策权，从而仍不能解决国企的效益问题。

目前，官方还有另一项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从国有资产管理的角度作为突破口，即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中国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实际管理者，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而是以出资人的方式，对国有资本进行管理，比如可以通过投资人的方式作为企业的董事对企业进行监管，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被视为国资改革的突破口，但近些年进展却比较缓慢。此次，国资委通过授予董事会经营权，让企业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与市场化

经营，可以看作是向“管资本”转变的迹象。

而探索建立“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的。

有海外评论认为，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思路，在企业层面建立党组织的治理结构，显然不是之前计划经济时代党组织对公司经营的直接干预，而更像是一种作为董事职权的资本监督和管理，而国企改革的主导思路还是推行其市场化改革，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推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化。

以此来看，探索建立“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不管其成效如何，从其政策初衷来说，更多是作为对更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兜底设计，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治考量。这与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有人提出更大胆推测，认为它是国企中更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的先兆，即党、政作为直接的管理力量从经济领域（包括国企）的更大力度的推出，而保留下来的党政因素，更多的是在资本的监督者这个角色定位上担当政治监督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这意味着更进一

步的政企分开、权力和市场的分开。只是如何处理好党组织、董事层和经理层的关系，既发挥“党组织”的监督角色和政治角色，又防止其蜕化到干预具体的市场经营活动，兼顾政治和经济，则显得十分棘手。这种情况，全世界没有先例可循，其结果如何，还当进一步观察。●

十九届“两委”中的国企人

央企和中央金融企业高管中无人当选中央委员，有20位央企高管、5位非高管国企职工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另外，有2位央企高管当选中央纪委委员。

男，1963年出生，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正武

男，1963年11月出生，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马国强

男，1964年出生，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兼任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官庆

男，1966年出生，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费东风

男，生于1963年出生，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曹建国

男，1961年出生，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国家电网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
寇伟

男，1965年出生，中国航空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国航董事长
蔡剑江

男，1964年出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戴厚良

男，1967年出生，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吕军

男，1963年出生，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7年12月转任山西省经信委党组书记，2018年1月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李晓波

男，1960年出生，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西清

男，1964年出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易会满

男，1963年出生，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赵欢

男，1960年出生，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钱智民

男，1963年出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雷凡培

男，1959年出生，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
由国立

男，1963年出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刘石泉

男，1965年出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缪建民

男，1963年出生，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任洪斌

男，1963年出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杨金成

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的

男，1963年出生，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
杨伟

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技术部总经理、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院云

男，1966年出生，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工程院院士
王恩东

男，1958年出生，鞍钢集团员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郭明文

男，中船重工701研究所所长
吴晓光

男，1962年出生，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化龙

男，1964年出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
章建华

消除“僵尸国企”之患

记者 / 张弛



2017年10月20日，天津市国资委组织召开“僵尸企业”清算注销工作座谈会。

新年伊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深化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焦点之一。

据统计，已有10家左右的国企上市公司密集收到处置“僵尸企业”政府补助，主要用于职工安置，补助金额在千万元至上亿元规模不等。

这拨始于2017年上半年的“僵尸企业”处置

补助，自去年12月开始加速发放。截至2018年1月初，收到处置“僵尸企业”补助的上市公司包括经纬纺机、中钨高新、深康佳A、五矿发展、洛阳玻璃、际华集团、一拖股份、凯马B、*ST嘉陵等。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三方面下功夫。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对此，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国有经济工作主线，传统行业将加速出清。

加速出清“僵尸企业”

作为行业地位颇高的军需品研产企业，际华集团近年来效益不甚理想。百亿级营收之下，际华集团扣非净资产收益率连续两年为负，大额的营业外收入支撑了近年的净利润，而中央财政这笔高达1.06亿元的“僵尸企业补助”，同样将推高其今年净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际华集团此前收到的政府补助名目繁多，但“僵尸企业补助”却是首次出

现。际华集团有关人士称，“僵尸企业补助”针对的是上市公司旗下部分“历史包袱比较重”的企业主体。“我们最早的一家企业主体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其背后的离退休人员远远超过在职职工，所以历史包袱特别重，这个成本负担下来造成经营结果不太好”。

此外，经纬纺机于2017年3月10日和2018年1月5日两次公告，称收到职工分流安置补助，金额分别为1.17亿元、3705万元。五矿集团则从中央财政获得了4108万元的“僵尸企业补助”。根据公司公告，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补助公司所属子公司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贵州）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人员安置费用。

除了处置“僵尸企业”补助金的发放外，近期国企还纷纷加快了对旗下“僵尸企业”的资产剥离工作。例如，中国长城在去年年底公告，为更好地清理退出“僵尸企业”，充分提升公司资产的整体利用效率，公司决定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湘计长岛电脑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作为解决央企结构性矛盾的路径，“处僵治

困”也是国资委2018年的工作焦点之一。据1月初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披露，下一步，国资委将开展中央企业亏损子企业全面排查摸底，做好重点企业改革脱困工作。2018年，国资委、中央企业将集中展开全年几百户“僵尸企业”、特困企业的处置治理工作，努力实现年底前“僵尸企业”基本出清和特困企业整体盈利。

对2018年“处僵治困”的具体思路，1月17日，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在国新办就2017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始终坚持三大原则：一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资委将通过优胜劣汰出清扭亏无望、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二是一企一策。企业长期经营困难，成为“僵尸特困”企业的原因有很多，因此要一企一策，因企施策。三是多措并举。治理“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靠一种办法往往难以奏效，必须多种措施综合施策。

从具体处置方式来看，国资委将采取兼并重组改造一批、强化管理提升一批、清理淘汰退出一批的办法。沈莹认为：“这些企业中有些企业虽然很困难，但是有的业务还有一定的发

展前途，有些资源还可以利用，所以要通过兼并重组来改造一批，实现扭亏增盈。有些企业运行效率低，不是没有产品没有技术，但是企业自身管理不行，存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效率低下、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管理，特别是对标、精细化管理，通过变流程、变机制实现提升”。

至于清理淘汰的操作重点，则放在扭亏无望的企业身上，要加快市场出清，退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国资委将遵循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减少对社会冲击的原则，在处置工作中坚持多兼并、少破产。

目前，从工作组织上来看，考虑到“处僵治困”工作过程中，涉及人员、债务、资产处置的复杂性，以及企业长期亏损带来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国资委牵头建立了15个部门参与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处僵治困”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并对相关企业施行清单式管理。“2018年，国资委还将继续对相关企业展开台账式监测，例如已经对2041户“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建立台账，并按季度对处置进展情况跟踪。”沈莹透露。

具体到省级层面，今年各地处置“僵尸企业”的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各省市国资委陆续召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底前要把“僵尸企业”处置完毕。

按照部署，山东省在2017年完成124家“僵尸企业”处置的基础上，今年全面出清第三批72家“僵尸企业”，完成3年处置321家“僵尸企业”的目标。江苏省将加大对低效无效存量资产清理整合力度，确保在今年底前将计划内的“僵尸企业”全部出清。湖南省湘煤集团、湖南兵器集团下属7家特困企业已处置退出；湖南交水建集团、华菱集团下属2家“僵尸企业”已启动处置，预计2018年初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其他“僵尸企业”2019年底全面完成处置工作。

处置“僵尸企业”的同时，江苏、湖南、广西等地还进一步明确企业功能定位，聚焦主业发展。例如，江苏省规定，省属企业主业控制在3家以内，有条件的企业最好专注一个领域。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表示，主业一旦明确，必须加大内部重组整合力度，严格管控增量投资，坚决刹住非主业盲目投资。主业的增量投资也要防止投向中低端业务，把优质资源更多

集聚到核心业务高端发展、高质量发展上来。

笨重的巨无霸

中国经济受到成千上万负债累累所谓“僵尸企业”的拖累，这些企业靠着担心下岗潮和坏账的地方政府苟延残喘。虽然呼唤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过，但政府牵头进行救助仍是常态。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让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末的情形，当时中国重组了国有部门，并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数千万人被迫下岗，所谓的“铁饭碗”被打破。

“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他要求，金融部门必须“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2017年4月，他还曾以“金融安全”为主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集体学习，要求针对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保持警惕，表示要“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中国宏观杠杆率有多高？2017年11月初，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称，2016年

末，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文章还指出，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

而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60%左右，而且还在攀升。非金融公司占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国有工业集团的问题特别严重。

僵而不死的企业只能靠信贷资金“续命”，占用的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社会资源被长期闲置，危及实体经济发展。而“僵尸企业”存续又需要通过银行和财政不断输血，造成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叠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极易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形成“灰犀牛”事件。

正如周小川所言，清理“僵尸企业”的进展并不顺利。自2015年以来，中央政府就要求对“僵尸企业”摸底并进行及时清理。当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中央企业增效升级。会议指出，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

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在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等任务主要也是针对国有企业。这一工作进展缓慢有自身的原因，“僵尸企业”涉及到债权处理、人员安排等复杂问题，这导致地方政府、国企以及银行三方都不愿意积极清理“僵尸企业”。

从行业分布来看，国内“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水泥等重资产行业，连年亏损而且面临去库存的重压，维持其正常运行需要很大的现金流和资源投入。根据人社部最新估算，国内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去库存可能导致180万工人失业，这表明重点行业清理“僵尸企业”将会引发的连带问题。“2016年全国两会官方重点讨论了失业问题，意味着中国准备应对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称。

根据他的研究，国有企业中有中国最大的“僵尸企业”群体。为什么大量的“僵尸企业”都是国企？贺军分析认为，道理很简单：身处产能过剩行业的民营企业，亏损几年后就无法继续经营，没有机构为民企长期输血，企业所有者会把企业关掉或卖掉。但国有企业可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或政府支持，因此能较长时间维持苟延残喘、“死而不僵”。此外，国有企业还享有非现金福利，例如银行低息贷款、以及土地和水电价格折扣。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让中国经济摆脱对重工业和建筑业的过度依赖，转变增长模式，但所有这些行业都与旧的增长模式联系在一起。“在旧的增长模式下，国有企业集中分布在一些污染严重的行业，例如钢铁、煤炭、造船和重型机械等，这些国企巨头没有动力也很难面向新兴产业进行转型，当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其结局就是走向僵尸化”。

除了那些已经无可救药的“僵尸企业”以外，在非僵尸国有企业中，还存在程度不一的“僵尸化”现象。所谓“僵尸化”，是指国有企业

的一部分业务或分支机构的经营出现持续性亏损，虽然整体企业还能生存，但局部业务已经“坏死”，或者整体经营趋向持续恶化。“如果考虑到僵尸化现象，国企‘僵尸企业’的名单还会继续扩大。”贺军表示。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则称，约30%的“僵尸企业”5年后仍将处于“僵而不死”的状态。此外，2008年至2013年形成的“僵尸企业”更加顽固，与21世纪初形成的“僵尸企业”相比，更有可能陷入“僵而不死”的状态。

国企破产重组要经历的种种阵痛，在中国首部企业改革案例纪录片《绝境求生》中有着细致体现。这部片子记录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的全过程。该企业的前身是一家位于中国西北甘肃省沙漠地区的秘密核工厂。到2009年，该厂转型生产钛白粉，但难以与数十家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竞争。职工士气低落，工厂设备被盗卖，拿不到工资的工人不断闹事。

在两次尝试由民营企业收购中核钛白都失败后，国资委选择将该公司作为破产改革试点。在这第三次尝试中，监管机构说服了民营

企业家李剑锋来重振中核钛白，并聘请该片制片人周放生实事求是地记录这一过程。

影片的结尾，破产改革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工厂的管理层不信任李剑锋，当地官员处心积虑破坏他的努力，在一次特别激烈的对峙中，李剑锋病倒了。尽管如此，李剑锋遭遇的情况还不算最糟，因为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中国东北，试图重组通化钢铁的一家民营钢铁集团的代表，被一群愤怒的工人围殴致死。

警惕加大财政补贴为其续命



山东省国企改革在过去一年里加速推进，处置完成124家僵尸企业。在改革的推动下，一系列转型新成果不断涌现：潍柴集团WP9H / WP10H高端发动机达到180万公里 / 3万小时的寿命标准，创出高端发动机研制新纪录。

图为2017年10月，工人正在组装发动机。

2016年末，国资委已全面梳理出央企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共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处置“僵尸企业”遇到债务重组、人员安置和资产瓶颈等三个最大的困难。如何将这批下拨的“僵尸企业补贴”花在刀刃上，是外界关心的问题。

对于目前拿到补贴的“僵尸企业”，经济学家刘胜军认为，这大多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下属子公司。问题是这些“小僵尸”并不是重点，真正需要淘汰的“僵尸企业”是规模比较大，占用的银行资产比较多，甚至有上百亿的债务。这一类“僵尸企业”，只要政府和银行不再输血就可以了，这也是唯一的出路。

据内地媒体此前报道，制造过剩产能、占用信贷资源、累积金融风险，“僵尸企业”已经成为了阻碍行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病毒”。在A股市场，为数不少的“僵尸企业”则通过政府补贴、保壳等种种手段“赖在”A股市场不走，持续享受融资便利。

2017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关于“僵尸企业”的研究报告称，“僵尸企业”和

国有企业的债务不仅占企业债务的大部分份额，还是企业债务大幅增加的源头。若能处理好这些落后企业的问题，将令长期增长率每年显著提高0.7-1.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刘俊海认为，给国有“僵尸企业”发放补贴有合理性，国企历史上也为国家做贡献，对促进国有“僵尸企业”改革有好处。“问题在于处理‘僵尸企业’的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这些资金？这很重要。”刘俊海说。

对此，刘胜军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这种做法的效果不会好。“什么是‘僵尸企业’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一个企业如果银行不愿意继续给它提供贷款，那么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没法生存就应该倒闭，市场的优胜劣汰才是有效率的。由政府来判断哪些是‘僵尸企业’，然后再给予补贴的做法，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如果真正的‘僵尸企业’没有被淘汰，反而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

过去两年，中国通过去产能，让市场大为改观。1月17日国资委新闻发布会透露的信息称，去年以来，国企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利润

增速创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这将使国企杠杆率得到一定控制。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真正的风险并未化解。相反，利润大增的局面下，更要提高对风险的警惕性。目前，一些国企风险有二：一是利润的大幅回升，经营面向好的表象，会掩盖此前暴露的种种风险和弊病。二是借化解风险之名，埋下新风险。

该人士认为，市场的回暖将会给大部分“僵尸企业”提供喘息之机，因此应高度警惕部分国企利用利润大涨给“僵尸企业”披上庇护外衣。同时，也应高度警惕部分国企和地方政府，借发力去杠杆化解债务风险，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加大金融输血，为“僵尸企业”续命。这其实是在借化解风险之名，累积新风险。

而市场层面的积极改观，也不应被作为校验供给侧改革的全部标准。“如果仅仅是各级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用政府补贴、优惠政策等方式，通过兼并重组等方法，暂时缓解结构失衡的矛盾和困难，在过剩产业产销之间取得了暂时相对平衡，这样的结果治标不治本，从长远来看，可能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留下极大的隐

患，未来若干年也许还需要再来一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表示。

还有人建议从混改入手，推动“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目前国企集团层面的混改仍然是比较谨慎的。我认为也可以考虑另一种思路，即从‘僵尸企业’入手来实施混改，给予更灵活的政策支持，例如说不一定追求控股权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建议。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即便混改进展不顺利，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低。而一旦取得实质性成果，就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聂辉华表示，从他的团队研究结果看，国企混改对优化“僵尸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提升它们的运营效率有较明显作用，这一比例可以占到20%。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僵尸企业”让渡控股权方面，政府处理往往会更加灵活，民企可以充分利用壳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改进管理使得“僵尸企业”的现状得以改观。●

时事

“邪恶动画”入侵中国

保护未成年人，仅靠网站过滤删除还远远不够

文 / 单艺

王丽瞥了一眼女儿看的儿童视频，突然发现不太对劲。

视频的标题叫做《艾莎公主和蜘蛛侠喝马桶水》。粗糙的画面中，两个成年人分别扮演艾莎公主和蜘蛛侠，手中举着马桶形状的玩具。蜘蛛侠向“马桶”里丢了一只蟑螂，并按了按马桶里的橡皮泥，假装将蟑螂埋好，然后对着房间喊了一声，艾莎公主捂嘴偷笑。

这时，小丑走过来，三个人互相热情地打了招呼。蜘蛛侠将手中的马桶递给小丑，小丑很是开心，打开盖子仰头喝尽。喝完马桶水后小丑闹起了肚子，看着小丑痛苦的捂着肚子跑向厕所，轻松欢快的背景音乐下，艾莎公主和蜘蛛侠捧腹大笑。

视频中将喝马桶水视为正常，将投毒戏弄朋友视为有趣。这些王丽看起来很是反胃的内容，她4岁的女儿却看得津津有味，并随着“偶像”艾莎公主的笑容，对小丑的狼狈相发出咯咯笑声。

王丽赶紧拿回孩子手中的iPad，却发现，相关推荐里全是类似的可怕内容。满嘴烂牙的小猪佩奇，被挖掉眼睛的艾莎公主，被斧头、啤酒瓶砸得浑身是血的小黄人，面对这一个个被打上了“亲子游戏”、“母婴频道”、“色彩教学”的标签，内容却扭曲恶心的视频，王丽感到不寒而栗。

“一群变态正在密谋伤害我们的孩子！”

事情的全貌远比王丽看到的更令人不安。

一篇题为《一群变态锁定观看YouTube的孩子，我以前为他们工作》的帖子经过汉语翻译后，近日在中国网络上广为传播。作者系外国人，在帖子中揭露，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影视公司，制作并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传播邪恶的动画短片。

据作者描述，这些动画短片往往以孩子们

熟知并很喜欢的动画角色为主角，色彩鲜艳，看似与平常的动画片无异，实际上内容却充斥着暴力、血腥甚至色情。

作者将视频主题总结为以下7类：动画角色喝酒然后互相伤害，包括砍头、烧伤以及被扶梯吞噬等；令人恐惧的昆虫钻进动画角色的身体或者覆盖身体；喝马桶水、喝尿、吃排泄物，以及把这些秽物涂在别人身上；极度的医疗暴力，例如用剃刀割掉对方的手指、挖掉眼睛等；怀孕是一种可被治疗的病，怀孕的女人被医生暴力扎针，动画中的孕妇往往会生下昆虫、小丑，甚至粪便；孩子无法保护自己，尤其是在真人版影片里，幼小的孩子往往会被成人扮演的动画角色暴打侮辱；把孩子性感化和描述孩子怀孕是好事情。

这篇文章的英文原帖最早于2017年 11 月发布在国外论坛网站Reddit上。该帖所在的Nosleep版块，内容大多是追求真实感的恐怖小说。因此，文章中的一些内容有可能是虚构的，但其故事背景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 YouTube 上，确实曾大量存在着以儿童尤其是幼童为目标的、明显儿童不宜的邪恶视

频。这些视频的主角多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卡通人物或超级英雄，但剧情却非常荒诞，毫无人伦常理可言，充斥着各种暴力、折磨、虐待和软色情。

血腥、露骨的画面，却被有意搭配以轻快的配乐，通常有着儿歌的旋律和令人放松的节奏。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就在这样舒缓、轻松的气氛中，看着他们的卡通偶像，一遍遍上演疯狂、荒谬的行为。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以可怕、危险的认知——危险的恶作剧是有趣的；暴力和性很好玩，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流血不过是正常的现象……

除了动画外，这些邪恶视频，还有另一个种类，即真人短剧。在这些真人短剧中，成人演员装扮成动画片里的角色或电影里的超级英雄，加入暴力、色情和低级笑料……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儿童也在这些影片中出镜了。一些片中不乏虐待儿童的镜头，令人胆战心惊。

《纽约时报》2017年7月就报道了YouTube上存在的少儿不宜的恶意动画短片，而这些影片，都被和原版动画片一起，归在了

儿童区域。

在报道中，《纽约时报》指出，违规影片出现在儿童区，可能是算法造成的；也可能是有心人士找到方式操控，进而让短片流入儿童区。尤其这类恶意频道通常会以儿童、教育等关键词命名，更是让家长难以一眼发现。

而根据视频平台的算法，一旦小朋友观看了几部视频之后，就会被推荐更多同类视频，然后观看量越来越大（有些播放量甚至达到数百万），最终形成可怕的循环。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下，2017年 YouTube 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到去年 11 月，YouTube 宣布删除了超过 50 个频道、15 万个视频。

内地未成年人同样面临危险

不要以为宣扬暴力、血腥、错误世界观的邪恶动画视频，仅仅存在于 YouTube 上——内地的孩子也可能看过！

2018 年 1 月 21 日，记者在百度视频中搜索“艾莎公主”，出来的第一页，就充斥着许多少儿不宜的内容，其中一些视频的播放量并不

少。

而且，随意点进一个视频，下方就会自动推荐大量同类视频。这些推荐视频，也都是用各种儿童熟悉的卡通人物来命名的。只要通过简单的关键词搜索，很容易获得。

和YouTube上被封杀的邪恶视频一样，国内网站上的这些视频同样以动漫人物为主角，同样包含暴力、色情等内容，而且同样被打上了早教、母婴、亲子、儿童等无害的标签。

在观感上，国内视频令人不适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YouTube上被封杀的“前辈”。比如艾莎公主睡觉的时候，蜘蛛侠在她舌头上倒了一包糖，然后蚂蚁爬满了艾莎公主的舌头。

还有蜘蛛侠被两个公主撕扯成两半的血腥画面。

另一部动画中，一个小黄人正在对着一个木桶撒尿，而连接木桶的水龙头另一边的小黄人，正在用杯子接起木桶中的尿喝。

而在一个真人短片中，出现了艾莎公主被僵尸咬脖子的场景。艾莎公主被咬时表情痛苦，最后也变成了面目可怖的僵尸。这些画

面，口味之重，连成年人看了都不寒而栗，却被堂而皇之地贴上了儿童的标签。

色情元素也没少在国内的此类视频中出现。比如小蜘蛛侠拿剪刀剪断艾莎公主的内衣绑带。甚至还出现了艾莎公主身穿内衣裤，趁着蜘蛛侠熟睡偷亲他的剧情。

此类视频的主角不仅限于“艾莎公主”，搜索米老鼠，也能发现许多错误诱导两性关系的视频。比如，怀孕的第三者抢走了新郎、吃饭会导致怀孕等。

不少视频甚至已经开始本土化，出演面孔全是亚洲人，视频中出现的宝宝，也是亚洲人面孔。

杜绝邪恶动画传播 仅靠删除还远远不够

学龄前的孩子最擅长模仿，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点的防备和辨识力。长时间观看这些邪恶影视的孩子，很可能会在自己喜爱的动漫角色的反复灌输下，形成扭曲的世界观。

有网友指出，而在视频的下方和弹幕里，也潜藏着一堆特殊癖好者，他们真正欣赏孩子被虐待时的无助样，真正希望有年幼的孩子被

洗脑后对性爱习以为常。他们和无知的孩子们一起观看这些邪恶的内容，在屏幕后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Reddit上的帖子在国内曝出以后，国内的几大主流视频网站纷纷关闭了“艾莎公主”的关键词搜索，相关的内容一律删除。从2018年1月22日开始，各大视频平台纷纷发布声明，表示在积极地下架清理问题视频。

但关键词远不止艾莎公主一个，米老鼠、小黄人、彩虹小马、海绵宝宝，只要是孩子们喜爱的动画形象，都没有逃过这群人的魔爪。更何况，如果当真把所有关键词下的视频都“一刀切”删除了，孩子们该上哪看他们喜爱的正版动画呢？

YouTube kid的全球负责人在接受《纽约时报》访谈的时候无奈地表示，平台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改善这件事情，但要做到更好的保护和杜绝，则需要家长们的配合。

首先，不要让你的孩子与iPad单独相处，注意孩子正在观看的视频内容。

孩子的童年不应当仅与iPad和电视为伴。

不要让iPad和电视成为孩子的保姆，父母更不应把孩子看动画片当成自己脱身的方式。

不少父母由于工作繁忙，极少注意孩子看的动画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低幼的儿童内容也确实很难引起成人的兴趣。但在没有完美的算法可以过滤邪恶动画的时候，只有家长能成为替孩子筛选内容的最后一道“人肉防火墙”。一旦发现邪恶视频，应马上举报。

其次，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主动带孩子认识这个世界，让孩子意识到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污秽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尽早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教育。

第三，关注孩子的异常举动。孩子是天生的模仿者，他会模仿的不仅是父母，也会模仿周边其他事物。若发现孩子有奇怪的举动和错误的观点，要及时沟通，及时拔除祸根。

最后，多给孩子一点陪伴。父母们总是尽心竭力，试图为孩子营造出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贴上家里的插座、裹上家具的锐角，只为让他免受伤害。

但百密一疏，那些躲在屏幕背后的邪恶之

手，却在父母们的眼皮子底下，用孩子们最喜爱的卡通人物，悄悄地腐蚀着孩子们的心灵。

但这个危险并不难化解，这些邪恶的动画和真人短片，只要父母多陪陪孩子，便能很快发现。❶

比尔·盖茨答中国记者问：同中国合作，我感到非常自豪

记者 / 卢伊

一直以来，比尔·盖茨都是全球最受瞩目的商业偶像和财富神话之一，他一手创办微软，推动人类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让电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因此屡次问鼎世界首富。

近几年，褪去微软首席执行官身份的比尔·盖茨，将精力转向慈善领域。2000年，他和妻子梅琳达共同创办盖茨基金会，宣布将98%的个人财富投入其中，股神沃伦·巴菲特紧随其后，也决定将大部分捐款交给基金会打理。

目前，盖茨基金会每年捐助额超过4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改善最贫困人群生活健康状况。

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到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营养、烟草控制、结核病与艾滋病防

控，及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等领域，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每年年初，盖茨夫妇都会以发布公开信的形式，盘点过去，展望未来。2018年2月，盖茨夫妇发布了他们第10封年信。在这份以《最难回答的问题》为主题的公开信中，盖茨夫妇针对全球健康、气候变化、挽救儿童生命、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等人们经常提及的诸多问题，一一作答。

年信发布前夕，比尔·盖茨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针对中国在发展中取得的长足进展和诸多挑战，盖茨始终乐观。

与中国合作倍感自豪

记者：您曾经说过对在2030年前消除贫困很有信心，中国在推动全球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承诺2020年之前在中国消除极端贫困。但是现在中国仍然还有43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您是否依然对消除贫困保持乐观，您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进展？

盖茨：全球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叹为观止的进展，特别是中国。在基金会参与之前，中国

就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中国政府还设定了消除极端贫困的宏伟目标，我们也和政府探讨如何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我们相信，盖茨基金会对于健康问题的了解，及在数字金融等方面的一些专长，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开展扶贫工作。据我所知，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极端贫困，还要实现更加广义的平等，这就需要把健康、居住条件、食品等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进去，并开发适当模式。中国对实现平等作出坚定承诺，这成为政府开展所有工作的基石，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成功模式将为其他国家和政府提供有益借鉴。

当然，消除极端贫困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还要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因此需要更加创新的政策。我相信中国在累进税制和遗产税等方面的改进可以让社会更加公平，而消除极端贫困则是一个起点。

事实上，彻底消除贫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如果有人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嗜酒或吸毒，我们也需要帮助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所

以我坚信全球将在减贫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但说完全消除贫困，为时尚早。

记者：盖茨基金会长期帮助中国推进医药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此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盖茨：我们和中国企业有成功的合作案例。10年前，我们开始支持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开发生产乙型脑炎疫苗，现在这款疫苗已在多国应用。最近，该集团成功研发的二价脊髓灰质炎疫苗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将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在北京合作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推进针对结核病等药物研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具备强大的科研实力，并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激励相关投资方面出台了很多举措，潜力巨大。

如果非要说挑战的话，中国医药监管或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实施的监管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同，我们在推动中国创新走向世界过程中，会面临一些复杂局面，需引入世卫组织来审查工厂状况和生产流程，耗费很长时间。如果类似情况在美国，医

药产品只须通过美国FDA审核，即可自动获得世卫组织的标准认证。

因此，我们与食药监总局合作，不仅能帮助提高中国药品和食品质量，让中国老百姓从中受益，还能让拥有优质疫苗或药品生产能力的中国企业，以财政可负担的价格将产品供应给贫困国家，或以商业方式推向国际市场。几年前，我们和中国食药监总局就已开展相关合作，政府也把这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并取得进展，这将令中国为全球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儿童健康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盖茨基金会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中国开展儿童健康项目？

盖茨：我们针对中国国内工作的重点是特定疾病的防控，及消除极端贫困。我们一些大的项目包括艾滋病防控，帮助更多群体减少艾滋病毒感染，确保艾滋病患者能够获得治疗药物；结核病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目前中国的结核病负担依然很重，但我们也看到取得了很多进展；还有一个领域是与烟草相关的疾

病，这方面我们与政府合作推动政策制定，降低一手烟或二手烟导致的肺癌及其他癌症引发的死亡。

的确，中国在很多儿童健康相关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的创新经验不仅能继续助力我们在中国的项目，还能通过政府间合作，帮助其他国家，造福世界。所以我们在中国主要专注于两件事，一是帮助中国解决国内问题，二是与中国合作来帮助其他国家。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预算比在印度或非洲要少很多。您一直强调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为什么基金会不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金？

盖茨：盖茨基金会迄今在中国投入了数亿美元，包括资助科研、开展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和烟草控制等方面的项目。的确，我们在印度和非洲投入资金更多。事实上，很少有慈善机构有我们这么大的投入，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度和非洲的健康挑战比中国严峻得多。如，非洲很多国家的儿童死亡率是中国的10倍以上。

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以及与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我感到非常自豪。单在结核病防控方面，我们就取得了瞩目成绩。我们也希望在其他领域取得更多进展，包括帮助食药监总局尽快与全球监管标准接轨，以及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正在进行的药物研发工作等，这些不仅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我们在非洲的慈善投入比例也会相应更高，因为非洲不仅人口增长率高，而且全球最贫困的一些国家都在非洲。



2008年8月12日，比尔·盖茨夫妇在海南三亚农村探访当

地结核病患者。

中国慈善行业发展乐观

记者：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慈善行不通，您是否曾和其他人讨论过慈善的价值和效用？为什么您和妻子梅琳达女士认为慈善能完成政府和企业所做不到的事情？

盖茨：慈善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规模比私营部门或政府部门都小得多。即使在慈善规模最大的美国，涵盖环保、文化、宗教、教育以及医疗研究等多个领域，其总和也不超过经济总量的2%。虽然经济规模小，但慈善部门在推动新想法的诞生、推动那些政府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方面，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并带来众多出色成果，包括提供奖学金、孤儿救助、助残、提高环保意识等等。

以“绿色革命”为例，它创造出更好的种子，使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翻番。中国也受益于绿色革命，尤其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后。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都是农民，农业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他们能不能吃饱饭、孩子能不能上得起学、在成长中能不能获得营养。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提升种

子质量、改良土壤、获得贷款、发展养殖、给牲畜进行预防接种，让他们饲养的牲畜更健康，甚至改良一些牲畜的基因，这样奶牛的产奶量、鸡蛋产量都会大为提升。因此，我们的工作会为这些穷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包括营养的大幅提升。

我们正与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内的伙伴进行合作，开发能够耐受干旱，且更少依赖肥料、除草剂与杀虫剂的水稻品种。类似“绿色超级稻”的这种技术创新在未来几十年对于抗击贫困和养活世界人口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我看到全球慈善行业逐渐兴起，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变得更加富有，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看到慈善能够发挥的作用。亚洲有很多有创新意识的慈善家，包括中国和印度，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所做的工作。所以慈善领域的一些大动作及其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证明慈善的价值。

记者：在您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寻求广泛合作过程中，您是否认同中国应把慈善工作放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

盖茨：从根本上来说，基金会开展的很多

工作，包括帮助贫困农户提升粮食产量，或是拯救儿童生命，都是全球公认的发展重点，中国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对于中国采用何种机制与其他国家合作，有着非常灵活开放的态度。中国非常注意聆听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发展重点。“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希望中国能参与帮助东南亚及一些非洲国家消除疟疾的工作中，如果这恰好符合“一带一路”的整体思路，且中国决定这样去做，我认为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记者：您十分擅长说服富豪加入“捐赠誓言”的行列，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等三位中国富豪已加入其中，但他们不是中国最有钱的富豪。我相信您认识中国最有钱的那部分人，您是否曾劝说他们加入捐赠誓言，他们是否对此感兴趣？

盖茨：做慈善是一个自愿决定。我喜欢和别人讨论慈善，慈善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从慈善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包括和配偶一起去做慈善。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国家相比，我迄今在动员美国成功人士参与慈善做得更好。因

此，每次来到中国，我都期待在正式访问之外，慈善能持续成为一个重要讨论话题。

我还和中国的慈善家们联合创办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旨在探讨中国慈善行业的最佳实践和特点。

我对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非常乐观，相信中国很多成功人士会选择捐出财富。数年前，还没有中国人加入捐赠誓言，但随着相关对话的加强，我们看到了众多榜样。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捐赠誓言成员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也会努力与更多人开展对话，争取做得更好。

记者：外界普遍担心，2018年中美之间不仅会有传统的贸易战争，还会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打起“冷战”。您和基金会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创新，并加强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您如何说服中美领导人在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更多开展合作而非对抗？

盖茨：美中关系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我相信，两国有很多领导人及我本人都希望两国之间能持续开展对话，共同解决全球健康、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这也会让美中两国人民意识到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我个人无法解决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我相信两国会继续保持牢固的关系。如我投资的泰拉能源正和中国合作推动第四代核能的发展，微软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研究院，给微软和中国都带来很多好处。

每一年美中关系都会面临不同挑战，但整体上非常牢固和积极。我会尽个人最大努力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声，同时也殷切地希望这一关系能良好发展下去。

技术创新推动全球健康



2008年8月12日，比尔·盖茨夫妇在海南三亚农村探访当地结核病患者。

记者：您在摩根大通健康峰会上提到，您

将致力于减少全球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需要更多的创新。然而，目前很多创新药和治疗方法较为昂贵，如癌症疗法CAR-T花费高达80万美元。您认为应如何利用科技创新，让更多医疗服务变得更加可及？

盖茨：基金会一直努力降低一些过于昂贵的药品和疫苗的成本。比如，我们为某个新型HIV治疗方案提供了价值4亿多美元的销量担保，帮助生产商优化生产成本，现在患者每年只要花费不到100美元便可获得治疗。我们也在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帮助他们覆盖部分研发预算。

要想达到降低价格的成效，采购量必须足够大，成本也必须足够低。目前，我们已研制出低成本的霍乱疫苗和伤寒疫苗。我们资助的合作伙伴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Tom Frieden博士，也力求让降血压药物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贫困国家。

很多新的医疗发明一开始是比较昂贵，但我们希望能提速降低成本，让这些发明惠及所有人。在贫困国家，我们从负担最重的疾病着手，目前仍以传染性疾病为主。从长远来看，

我们希望将这一方式拓展到其他疾病类型，最终实现健康平等。

记者：技术创新在提升全球健康水平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哪些创新是您现在最关注的？

盖茨：在全球健康领域的宏伟目标中，针对营养不良，我们发现儿童肠道菌群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创新企业合作，从7年前开始资助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决营养不良问题，还有助于解决其他疾病。目前，这一领域聚集了各类大小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力量，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希望以此提高儿童的营养水平。

创新成果产生的影响非常多，我无法面面俱到，但我想着重谈谈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问题。5岁以下儿童死亡几乎有一半发生在他们出生后30天内，多由疟疾、肺炎、腹泻等疾病引起。为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对出生30天内获得确诊的新生儿进行取样研究，分析能否通过为孕产妇注射疫苗，让她们摄入抗生素，或为新生儿保暖进行预防。此外，我们还运用最新的工具，从病理学

和遗传学角度研究这些问题，并建立儿童健康和死亡率防治监测网络，该数据库不仅能指导我们的工作，也能帮助其他所有人共同减少新生儿死亡。

当然，还有大量的创新研究也在进行当中，如疟疾、肺结核、HIV 等疾病的疫苗研发，以及早产儿营养等领域。这些科学研究的进步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工具，加速我们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

记者：您认为人工智能在全球消除贫困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盖茨：人工智能能提高生产率，我们也经历过巨大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并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农业生产率就曾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但我们在其他领域也创造了更多、甚至更好的工作机会。

人工智能能够降低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力投入，这样能释放劳动力去帮助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缩小阶层差距。如果发展得足够好，我们甚至可以缩短每周的工作天数，或让人们提前退休。

所以当生产率提高时，如果政府能够以明智的方法确保人人平等的从中受益，在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机会，那它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对人工智能加以利用，有的政府也可能选择不去利用，但整体上来说，我认为未来几十年，人工智能能带来非常积极的好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④

“问题地图”背后：

在华外企不可触及的“红线”

记者 / 关珺冉

“错绘国界线；漏绘钓鱼岛、赤尾屿和南海诸岛等重要岛屿；海南岛与大陆不同色；台湾岛注记错误；未被编发审核通过编发审图号。”1月下旬，一连犯了五个错误的世界地图被印在日本企业无印良品《2017年秋冬家具目录册》中，上述图册因此被重庆市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发现并要求回收，一把火销毁。

事发后日本政府对于中方的做法予以抗议，但无印良品并未与政府形成“统一战线”，而是按照中方要求废弃地图，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指导，认真学习中国法律法规。中国外交部对此强调：“在中国的任何外国公司都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

世界的地图本没有统一版本，一直以来不同国家“各执一图”。当今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大大小小多达百处，领土问题牵涉甚广，商业公

司在使用世界或所在国地图时也会慎重考虑因地制宜。譬如，谷歌地图就利用虚实线描绘主权争议地区：以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以南的藏南地区为例，其在中国版地图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版地图上则被划分到印度国境内。

全球化背景之下闯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公司，愈加懂得如何适应在华经营之道，其中包括处理诸如“地图问题”一类的敏感问题。

频频出现的“问题地图”

“好像是无印良品的店铺里睡了一晚。”在“问题地图”事件通报之前，拥有79间客房的无印良品全球第一家酒店于深圳开业，不少顾客如此感慨。然而，这番公关宣传却不及被测绘局通报登上各大媒体头条来得快。

事发后日本政府强硬发声，称日本无法接受中方“单方面的主张及措施，这会对日本企业的活动造成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隔空喊话，称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应错看“政府（保卫领土）的决心”。对此，无印良品低调回应说“不评价日本政府的做法”，“没有对日本政府表达

任何希望其介入的意向。”

在海外市场利润整体走低、中国市场持续增长的趋势下，无印良品不像韩国乐天玛特以牺牲中国市场为代价附和自己国家的政治决策，而是选择以遵守中国法律为前提，并照顾到中国国民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恰逢无印良品自2014年以来第八次调低商品售价，据称多数商品降价幅度高达20%。而这距离上一次调价才过去4个月。此前无印良品多次被诟病在华定价过高，经过几轮“新定价”后，中国市场的服装类商品定价基本与日本持平。

亦有中方人士认为，此次同时被测绘局通报的是八起典型案例，无印良品只是其中之一，其余被通报的七家企业均为中国本土企业，因此不必过分解读其背后的政治意涵。

无印良品的反应，也像是一批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以身试法”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早在2001年，一家意大利公司上海代表处就因为悬挂了“问题地图”而被赶出中国。这家外企在接待室墙壁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不光用不同颜色标注中国内地和台湾，更是把台湾用英文标注为“TAIWAN (Formosa)”——表现出了殖民

主义色彩（括号中的英文译音为“福尔摩沙”，是过去殖民主义者强占台湾后对其命名）。

而同一家外资企业在“问题地图”上犯错后，态度也迥然不同。2015年，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在其全球年会上提到中国市场的业务时使用了一张不完整的“问题地图”——缺少了台湾、藏南、新疆阿克赛钦等地区。当时有相关人士私下作出提醒，但奥迪却不予理会，认为其只是为了体现销售业务。

2017年3月15日，奥迪在其德国总部介绍中国业务时，再度使用了这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被细心的中国网友发现并在社交媒体引起轩然大波。次日“奥迪中国”在微博发表道歉声明称：“此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据悉，中国市场目前是奥迪全球最大单一市场，2016年的销量达到了589088辆，但其增长幅度已经远低于竞争对手奔驰和宝马，2016年的同比增幅仅为3.73%，而奔驰和宝马则分别达到了26.6%和11.3%。

今年年初，万豪集团在官方发给会员的调研邮件把港澳台和西藏列成国家而不是地区，引起非议。之后万豪集团道歉称，问卷调查将

港澳台和西藏列入“国家”解释为“系统错误”；旗下“万豪礼赏”推特点赞藏独账号“西藏之友”贴文系个别员工的行为.....对此有中国网友质疑说，“这已不是第一次投诉万豪，万豪不但不改，反而越来越过分。”由于此事影响恶劣，上海黄浦区网信办和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还约谈了相关负责人，并立案调查。

以此为契机，美国500强企业达美航空公司、国际知名服装品牌ZARA、美国医疗科技公司美敦力等一批外企，纷纷对其官网中将台湾和西藏作为“国家”而致歉。

除了在华外企，在境外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也因多次使用“问题地图”而被诟病。2015年，时任小米全球副总裁的雨果·巴拉在印度的宣讲图中将阿克赛钦和藏南地图“划给”印度，而中印正好是领土争议的双方。2017年1月，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的中美地图双双出错：中国地图漏掉了台湾地区，美国地图则漏掉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对于频频出现的“问题地图”，有专家指出，中国在处理“问题地图”方面早已有法可

依，但相应的执法主体是否明确、执法细则是否到位，可能都是影响执法力度的原因。

法律“红线”制定流变



2016年7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海洋国防教育馆的一名导游在南海3D地图前做介绍。

中国标准的地图在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是可以找到答案的。依据最新的下载量排行：第一名是1：1.3亿的世界地图，第二名是1：4800万的中国地图。除了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之外，“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经城市分布地势图，以及G20国家分布图等也有明确示范。

虽然有了这些规范，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公众应用地图的不断增多，使得地图市场快速扩张，各类“问题地图”不断涌现，一场“问题地图”大作战正在进行中。2012年以来，中国共开展执法行动11000多次，查处相关案件近1000起，收缴各类违法违规地图产品20万余件，完成1000余个存在“问题地图”网站的处置。仅2016年中国各地开展地图市场检查1660次，查处地图违法违规行为253件，涉及43000多个“问题地图”产品。

为了加强监管力度，测绘地信局、网信办等多部门还成立国家级互联网地图监管主节点和31个省级分节点，实现了对各类网站中登载地图的日常监控、快速检定和及时处理。测绘地信局甚至专门开通了“问题地图”举报机制，公布了举报电话和邮箱，积极发动广大社会公众提供“问题地图”线索。

2017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排查整治的8起典型案件中，不仅涉及像无印良品这样的外企，中国的公司、出版社、网站也都“榜上有名”。东莞市龙昌公司涉嫌生产销售“曾母暗沙”标注错误等问题的地球仪；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引进的图书《熊猫地震求生记》登载的一幅世界地图漏绘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错绘藏南地区国界线……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对于“问题地图”所制定的法律“红线”也从出版物延伸至互联网。

测绘地信局会同有关部门早在2003年和2009年分别出台《公开内容表示若干规定》和《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补充规定(试行)》等法规政策，对互联网地图公开标识内容作出具体规定。2016年开始实施的《地图管理条例》还特别设置“互联网地图管理”一章，对互联网中登载使用地图等行为的安全保密、地图审核和备案等提出明确要求。

去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正式施行。新法规定，地图的编制、出版、展示、登载及更新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地图编制标准、地图内容表示、地图审核的规定；互联网地图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经依法审核批准的地图，建立地图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互联网地图新增内容的核校，提高服务质量。

“问题地图”全球治理难题

虽然国内法规日益明晰，但对于海外的涉华出版物，中方除了口头抗议似乎无能为力。2012年12月，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2台《新闻之夜》节目采访时，指出BBC所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对地图进行审核或者监管的机构，中国难以对他国提出修改意见。加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出版物进行保护，即使美国政府有意愿维护中国地图的正确性，也难以要求其出版商对错误地图进行修改。

如今“问题地图”更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问题，用谷歌搜索中国地图，满屏皆是错误图片：港澳台以不同底色标注为国家；漏绘南海诸岛及九段线；漏绘藏南地区……同样搜索美国地图，不含阿拉斯加、夏威夷的图片也不在少数。与中国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相比，不少国家面临地图出现错误时，并无较好方法进行修正。

2017年日本众议院大选期间，日本“希望之党”在阐述政治见解时使用了一张有争议岛屿“北方四岛”的地图，被竞争对手拿来撰文

章：“这么重要的事情没有看到，不可理喻。”但此类错误在被质疑后一般再无下文。日本对于地图等出版物的法律规定多侧重于街市店铺的商标权益以及个人隐私的保护，对于地图测绘问题尚无明确规定。

围绕“问题地图”，韩国和日本近年来角力不断，甚至发酵为外交风波。据韩联社2012年报道，苹果公司决定在韩国和日本以外地区登录苹果地图时，将“独岛”（日称“竹岛”）显示为“独岛、竹岛、利扬库尔岩”等三个名称。此举引发了韩国政府严正抗议，韩国民众也一度发起针对苹果公司的抵制运动。后来，苹果公司不得不更改了相关标注。2013年，谷歌地图未将“独岛”标注为“竹岛”，日本政府拒绝授予其当年的“总理大臣奖”。2018年1月，韩国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在其官方主页上将日韩争议岛屿直接标为“独岛”，再次引发两国摩擦。

不过对于类似事件，韩日两国政府基本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其国内还没有用法律法规处罚涉事企业。

美国学者丹尼斯·伍德在其著作《地图权力学》中曾提到，地图的力量，在于可以有效地

为各类利益服务。

在其看来，地图不是肤浅地复制地球表面的形态，而是在梳理人类千百年来获取的各学科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精心挑选信息重新建构这个世界。地图可以折射出人类的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地图的背后，是复杂的、隐而不显的制作各方的利益。

由此来看，外资企业如何在海外扩张商业的同时不逾越东道国的“红线”，还需谨慎思量。●

台港澳

台湾英语教育“装逼风”疯魔25年

特约撰稿 / 霍安治（台湾）

托业（TOEIC，台译多益）成绩在2017年10月公布，台湾考生平均534分，于全球49个受测地区里排名40，敬陪末座，在东亚远远落后于韩国（679分）与内地（586分）。台湾媒体猛烈批判现行英语教育。“行政院长”赖清德如应斯响，宣示将成立“推动委员会”，研拟以英文为“第二官方语言”，全力推动英文教育。

一场由当局主办、耗资亿万英语教育大拨款已经箭在弦上。

一向疯魔英文的台湾民众，反应却异常冷淡。自李登辉时的教育改革开始，25年来，家长节衣缩食，供学童几乎用所有精力学英文。在幼儿园小班，四岁小童中文尚语不成句，却已开始学英文，小学六岁幼童在放学后直接送入号称完全以美语对话的“全美”安亲班补习到深夜，初中考“全民英检”，高中字汇6000到7000，还是天天补习英文。上了大学，又需托

业及格才能拿到毕业证书。为英文牺牲奉献的人力、财力已然达到极致，过度的英文教育反而造成不少学童敌视、恐惧英文。

经历漫长磨难的台湾学子与家长，已为了学英文而心神憔悴、精疲力竭。托业成绩不堪入目，显然不是家长和学生不努力，而是制度性问题。台湾社会不少声音呼吁道，此时英文教育的改革重点不在加重，而在减轻。台湾当局却大肆描绘以英文为“第二官方语言”之画饼，常使有识之士扼腕叹息。

从小抓起的双语教育

台湾民众是最仰慕英文的，“装逼”心态于两岸三地间堪称第一，英文教育却长期欲振乏力，即使是尖端大学的优等毕业生，英语也大多讲不出口。

外语专家何万顺是东海大学外语系高材生、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博士，英文水平修练至台湾英文教育金字塔之最尖端，其自我调侃的妙论疯传一时：“有一次我在一个研讨会上批判大学英语毕业门槛，在场有一位院士级的大佬，于是主持人请他表达意见。他轻描淡

写地说，纽约的乞丐英文比我好。”

英文教育失败的主因是人尽皆知的。校园英文课专重考试，教学内容以填鸭题库为主，与现实应用脱节。早年的正式英文教育由初中一年级开始教26个字母，循序教到初级文法与词汇，课程名为“英语”。高中开始教长篇文章阅读与写作，课程名为“英文”。循序渐进，立意良善，然而英语英文是联考（高考）的升学考试课目，出题风尚刁钻艰涩，因此校园之英语英文教育丢下课本，改读参考书背题库，听说读写只专重考试用的“读”与“写”，认真教听力与口语的老师反而被视为不务正业。学生的学习兴趣磨耗无存，一朝考上大学，英文立即丢光，毕业后自然讲不出口。

1990年代教育改革，英文教育是重中之重。当时教育界普遍批判填鸭式题库教育，强调学英文需听说读写兼重。自以为是的教改专家并不理睬英文教育的症结，反而以大幅开放英文教育的年龄限制的媚俗异招，献媚于家长。自1993年起，小学可以利用“团体活动时间”，自行开办英语学程。

使英文正式挤入小学教育的“德政”，猛然

激发家长狂恋英文的魔性，各地小学争先恐后抢开英文课程，小学是否有“明星”与“重点”身价，视英语教育而定。而眼高手低、粗枝大叶的教改专家们，并未明定小学的具体课程与施教年龄。各小学的英语教程教材由学校自行决定，教师自行招聘，甚至连开始学英文的年龄也由各“县市政府”自主决定。

循序渐进的禁例一旦打破，小学英文如野火燎原般不可遏抑。小学是学生养成中文听说读写语言能力的关键期，学者纷纷激情论证语言学习生活化环境越早越好的道理，只要提早开始学英文，英文就能说得与中文一样好，小学英文的学习年龄就火速提前。原本公认读英文最早只能由五年级开始，但如台北县市等教育资源充沛的县市很快下修到三年级，在一般中南部县市苦苦追到三年级时，台北市索性规定小学一年级起读英文。

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英文的潮流，造成巨大的学习灾难。一年级学童连中文字都认不出几个，中文尚靠注音符号分辨，最怕语文概念混淆。在小学一年级开始学ABC，26个大写字母是一套符号，26个小写字母又是一套符号，再

加上学中文必需的注音符号，一个六岁小童竟然需背三套符号。

更糟糕的是，英语教育的师资并不整齐，英文老师本身与洋人对话时其实也要紧张出一头大汗。教改之前，英文老师尚能依靠固定教材照本宣科，教改又提出教科书“一纲多本”的超现实理念，课本由民间出版社自行编写，各学校可以自行选择课本版本。卖课本首重市场销售手腕，内容在其次，课本质量一落千丈。英文教育专家张武昌随手抽看坊间教材，四层楼房英文是a four-storied house，教科书却写成中式英文之a four-floor house。统计用圆饼图是pie graph，教科书却不知由何处字典乱抄，以cake diagram施教。

即使背熟了ABC，听说读写仍然是大灾难，尤其是读音。台湾英语教师人力以本土培养为主，本土培养的大学教授尚普遍没有直接以英文授课的能力，小学英文老师更不可能用英文上课，必需使用中文教英文，学习环境难求真正之口语学习“生活化”。而小学幼童已经需背三套符号，无力再学KK音标，只能寄望“自然发音”，以游戏、歌唱等生动方式潜移默化。

因此，老师是什么口音，孩子就学会什么口音，而“台式英语”的口音却是从ABC之基本发音开始荒腔走调的。

台湾小学生看到一只睡着的猫，普遍能开口讲出A cat is sleeping之初中二年级水平文句；由贵族学校养成的十岁小童，甚至能讲出Have You Seen My Cat之接近高中层级文句。然而，讲出来的文句只有台湾本地老师听得懂，真正美国人常听不懂台式发音，对话时常有鸡同鸭讲之窘。听说读写之“说”既然不标准，“听”更听不懂美国英文的南腔北调，于是英文教育只好继续在“读”与“写”上打转，教改后念了20年英文的大学毕业生，英文开不了口是常态。

校园英文教育只能教出洋人听不懂的台式英文，精明的补习班业者迅速推出“全美语”与“双语”补习班，教师直接雇用金发碧眼的洋人，教学互动禁说中文，一律以英文表达交谈。全美与双语的风气迅速攻占幼儿园，吉的堡、何嘉仁等贵族幼儿园纷纷打出“全美”洋教师招牌，一般幼儿园被迫急起直追，即使雇不起洋教师，也必需重点开办英文课程。

即便是昂贵的“全美语”教育，师资与教材也是一团乱，反而沉重打击学童的学习兴趣与人格养成。有一家英文教育机构的电视广告弄巧成拙，不小心点出洋教师的来源。两个洋乞丐收获不佳，即以流利美式英文聊道：“听说到台湾教英语很好赚”。

“双峰”商机

“台湾许多的双语幼儿园虽然大力标榜外籍老师授课的‘全美语环境’，但孩童间的互动、孩童和本地教师的沟通，都无法真正以英语进行。出了幼儿园后，孩童所接触的当然也不是英语；和家人交谈，更不可能使用英语。这种情形下，双语幼儿园所营造的，其实是一个十分扭曲的‘全美语假象’。尤有甚者，这种扭曲的全美语环境，对幼儿的发展实际上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李樱与林佩蓉沉痛总结全美语教育的乱象，“目前有许多幼儿由于无法迅速学会幼儿园所教的英语而备感压力，导致夜间尿床，或因英语不佳，怕被同学取笑而感到焦虑，不愿意上学。最令人忧心的是：由于双语幼儿园禁止使用母语（No Chinese！），幼儿难以畅所欲言，无形中等于

剥了孩子学习表达自己的想象、思考、叙述自身经验、诉说故事的机会。这对正值想象力、思考力发展关键期的幼儿，实在是莫大的伤害。”

然而，“全美语假象”等怪状是无法改革的，英语教育已经成为台湾最赚钱的生意。由幼儿园小班开始狠抓的英文教育，无法养成听说读写流利的好英语，却能冲高英文考试成绩。台湾的英文水平差，英文考试却异常火热。学校本身的考试测验成绩只是基础入门，托业、托福等检定证书才是英文考试王道。台湾本地最流行的英文考试是由“LTTC 财团法人语言训练测验中心”创办的“全民英检”，英检迅速融入校园，初中考英检初级，高中考中级，大学考中高级，大学以上考高级检定，俗称“英检疯”。

攻掠中学与大学之后，“英检疯”迅速掉转枪口，攻占小学校园，疯魔英文的家长常要求小学生考初中等级的英检，初级英检的考生约有1/5是12岁以下学童。单靠游戏式小学英文教育无法考英检，1/5考生全是安亲班、补习班焚膏继晷般啃题库补出来的。

部分有良知的学者猛烈批评揠苗助长的“英检疯”怪状，迫使“教育部”明文规定小学生不得参加英检，但让小学生提前考张英文检定证书的市场需求仍然火热。2015年底，LTTC正式推出“小学英检”，仅一个月即有万名小学生报考。不管英文之听说读写实力如何，一张证书就足以使家长颜面有光，师长侧目以视，高中和大学的升学路随之更为宽广。

于是，惨烈的英文补习从童稚启蒙即火热冲刺。由“全美”幼儿园起步，小学念“全美”安亲班，中学念“全美”补习班，大学更要补习考托福、雅思、多益、英检。各级英文教育实际上已经补习班化。据业者统计，2010年全台有70%学童参加美语补习班，英文补教商机约达新台币160亿元。

台湾有1/3劳工月薪不到新台币3万元，而标榜“全美”的贵族幼儿园，一年学杂费用常在新台币20万元左右。退而求其次，提供英语教育的私立幼儿园，一年学杂费约15万上下。收费低廉的公立幼儿园普遍没有英文课程，常使家长有输在起跑点之危机感。

升学小学后，英文教育的战场则转为放学

之后补习到8点的各种课后辅导安亲班。安亲班老师各个是题库专家，将学校的各种英语测试细心“考古”后编成题库，手把手教写作业、背题库，学生到了小学课堂，各个作业出彩、考试满分。安亲班一年耗费在20万上下。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补习，台湾的双薪父母有一半薪水送给了英文教育。

若不参加补习，任由孩子在正常学校环境自在学习成长，英语成绩十有八九惨不忍睹。小孩好慕虚荣，已在安亲班背好题库的小朋友英文考试轻松猎取好成绩，骄傲自满，常使未参加补习的孩童心生自卑，放弃英文。从小学开始，英文教育出现补习学生成绩极佳、未补习学生成绩极差的“双峰现象”。

台湾高校英文教育的第一重镇是师范大学英语系，师大英语系主任张武昌2006年撰文疾呼道：“小学英语教育是透过唱歌、游戏、说故事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来提升学童的兴趣。在能力的培养方面，虽然理想上是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并重，但限于教学时数与每班的学生数，大都仅能着重于听、说的教学。但是对大部分的初中英语教师来说，他最重要

的教学目标仅是：帮助学生在基测的英文科拿到高分，而初中的英语教学也因此就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许多的大小考试取代小学的活动式或多元化的评量，英语的学习不再轻松有趣，而以纸笔测验为主的段考试题在题数与难度上的骤然增加，也使得初一新生遭遇到难以适应的困难。若是接连几次考试的成绩皆不理想，学习的信心必将迅速滑落，很快就丧失了兴趣。在笔者最近参与的一次公听会中，就有初中教师指出校内有越来越多初一新生放弃英语学习的趋势。”

台湾家长花费半数薪水，将英语教育浇灌为补习班化的考试机器，学生自幼儿园起狂补硬啃20年，英语能力只能考试，仍然无法与洋人从容对话。托福与托业考试的两种极端表现，无情曝露英文教育的真实惨状。2016年全球托福平均分数81.3，台湾是80，在亚洲30个受测区排名12，成绩傲人，媒体欢呼一片；而2017年托业却是全球49受测区排名40。托福是尖端学子留学美国的语文考试，说明从小读“全美”幼儿园的高峰学生有优秀的考试实力；而托业则是由工作与生活出发的实用英文，说明学子在考试外的英文能力并不出色。

“第二官方语言”的魔宴



某小学前”全美”补习班之广告。

在人人上大学的台湾，英文考试是挥之不去的魔咒，为业者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机，台湾学生仍然前仆后继考托业。

大学常以托业为“英语毕业门槛”，强制考试引起反感。2017年，一名政治大学学生起诉政大设立外语毕业门槛。政大要求学生于全民英检、托福、CBT电脑托福、IBT网络托福、IELTS国际英语测验、剑桥大学国际英文认证或托业等7种认证择一考试，达标始能毕业。

商业利益如此庞大，台湾当局无心斩断乱源。赖清德任“台南市长”时，于2015年力推英

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不但将校园内的英语教育办到小学一年级开设英语课，更使英文商机走出校园。“政府文书信息双语化”使公务员努力考英检，公交车司机要补习英文。竞争力在其次，官商合作的庞大商机才是“第二官方语言”的真正益处。

今日，若有家长不愿让小学生补习英语，孩子成绩十有八九赶不上在安亲班背好题库、写好作业的同学。学校老师甚至会好意提醒补习安亲的重要性，家长即使对英文教育的弊端洞若观火，也不敢让孩子冒成绩“吊车尾”的风险，只能随大流迷失于英语考试的补习魔宴。●

人物

人大附中的教育“扶贫”路

记者/ 蓝艺

近些年，提到基础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总绕不过这些词，“均衡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平权”，但究竟怎样实现这些目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有大陆媒体报道过，有的地区教育改革很彻底，小升初100%电脑派位，结果是重点学校的生源变得参差不齐，老师的积极性遭到打击，学校的教学水平下去了，而其他普通学校也没有因为流入了部分优质生源，教学水平就提上来，当地教育由此一落千丈，很多家长不得不跨省跨市送孩子上初高中。

可见，用削尖填谷式的平均主义来解决教育均衡的问题，也不是很对症。

那有没有相对比较好的“药方”呢？

其实，是有的，很多地方政府、名牌学校、民营教育机构甚至NGO组织，都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其中，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的努力是可以作为经典案例剖析的。

优质学校的社会责任是双重的，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



刘彭芝校长和学生在一起。

在全国，中国人民大学很有名；但在北京，人大附中比人民大学有名。而刘彭芝，正是让人大附中出名的一届校长。

在北京，提起人大附中，人们就会想到刘彭芝；提起刘彭芝，就等于在说人大附中。这两个称谓，实在是一块招牌的两面。从1997年她执掌人大附中开始，人大附中从一所很平常

的重点中学，成为了在北京市高考、在国内外各种高端竞赛和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都蜚声海内外的顶尖名校，成千上万的北京家长都梦寐以求要把孩子送到人大附中就读。除此，刘彭芝还于2009年受聘国务院参事，2016年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除了办学有一套，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教育扶贫的探索方面，刘彭芝也有一套。

说来有趣，2002年人大附中第一次走出北京到河南新密办分校，始于偶然事件。

2001年北京评出15所高中示范校，人大附中总分名列第一，报道一出来，全国各地的教育局领导纷纷带队来人大附中学习交流。

当时，河南省新密市（县级市）市长林建刚，是一位有着记者履历的理想主义者，对中西部发展思考很多，认为“让一两代人受到起码的或良好的教育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比一时的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他听说刘彭芝的事迹后，就跑到北京考察。看人大附中办得有声有色，就动了与他们合作的念头，想借人大附中的手，把新密的教育往上拉一拉。

林建刚来到人大附中拜访刘彭芝，邀请人大附中到新密办一所分校。那个时候，刘彭芝的理念是练好内功，人大附中在北京的事儿都忙不过来，没想过要去外地办学。

刘彭芝和她的团队一商量，校领导班子给出了回馈：不同意。

林建刚也倔：你们不同意我就在人大附中的院子里站着，一直站到你们同意。后来，他真的跑到人大附中的院子里站了两天。

到了第三天，刘彭芝坐不住了，召开校领导班子会议：“总不能让人家一直站下去吧？怎么说也是一市之长，所求之事不过是让我们帮他们那个地方办学，提升一下那里的教学质量，人家这么看得起咱们，咱们人大附中有什么了不起的，就非不帮人家、让一个市长这么求咱？”

于是，人大附中就下了决心，有困难克服困难，能帮就帮吧——2003年3月，人大附中郑州分校就开始奠基。

刘彭芝的性格是，要么不干，要干就真刀真枪。要办好学校，得先有好老师。4月，人大

附中就接收了首批18名新密教师进京培训。

之后的6年里，新密市主管教育的领导、郑州分校的干部、教师以及新密市兄弟学校的干部、教师，共37批、430余人次来人大附中进修学习。人大附中也先后派出骨干教师、教研组长、外教等15批、100余人次赴郑州分校讲学、指导——注意，这个培训指导也包括新密部分中小学校长和老师。

人大附中陆续派了6位领导前往郑州分校当校长（4位常驻），新密那几年市委领导班子换得很勤，市长换了好几任，但引进人大附中办好新密基础教育这个项目却没有因为林建刚等市长的调离而终止，每任市长都很支持。人大附中派去的朱家华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退休后受聘于人大附中）任市长助理兼郑州分校校长顾问，乐进军老师任教育局副局长兼郑州分校副校长，都出席市委市政府有关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新密市的基础教育提出具体建议。

经过6年的努力，人大附中郑州分校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成为当地最好的中学。刘彭芝觉得到了把它交给当地的时候了。2009年

初，郑州分校更名新密中学，挂牌人大附中联谊校，后并入新密二高。新密市政府最初承诺要给人大附中办学经费，以示对人大附中在品牌、人力、物力和智力方面付出的尊重。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人大附中最终没有接受，6年来始终提供无偿帮扶。2010年至2011年间，已是国务院参事的刘彭芝利用外出开会的空隙时间，还赶到新密二高，看望师生，调研人大附中撤走后的教学情况。

有两组数字，可以看到人大附中进驻新密，对盘活当地教育资源产生的促进作用：

第一组数字是：2003年人大附中去新密之前，新密的高考成绩每年本科上线仅数百人，居郑州周边几个县的倒数第一；人大附中进去后，高考成绩开始上扬，至2017年，新密本科上线超过3000人，一本上线率将近1000人，于周边地区名列第一。

第二组数字是：2003年被派往人大附中进修的18名老师，后来都成了新密教育界的骨干力量，近10人担纲各级中学校长，从乡镇中学到市重点中学。

至今，人大附中与新密二高依然保持着联

谊关系，利用网络资源共享等方式对其提供帮助。

新密办学让刘彭芝看到了中西部地区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认识到教育帮扶的重要性和优质学校的社会责任，以及北京、新密两地的地理距离造成的困境，在教育理念、地方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她意识到，远距离的教育帮扶难以持久，需要另觅他途。

教育帮扶是一项事业，好学校扶贫时既要带去先进的教学理念，又要输出和培养一批带头人

及至2006年，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时任党委书记杜玉波找到刘彭芝，提出让人大附中接管北航附中的时候，刘彭芝的脑子里有了相对成熟的“扶贫”新方案。

同为海淀区的大学附属中学，北航附中坐落在北航大学里面，早些年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建校的时候有50亩地，但后来因为大运会占地等诸种原因，逐渐被减少得只剩21亩地、几百个学生，甚至连学生运动场都没有了。好老师好生源纷纷离去，北航附中质量逐年下

降，最后，连带大学的一些中青年教师为了孩子升学，也开始申请调往其他大学。为此，北航教职工意见很大。

2006年，人大附中派出一位副校长任北航附中校长。

2007年，为了加强力量，受北航大学邀请，刘彭芝兼任北航附中校长。

刘彭芝做事就一个风格，抓细节！细节决定一切，要么不帮，要帮就必须帮成、帮好。她带着人大附中领导班子多次到北航附中调研，总结出8个问题，敦促北航大学领导班子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为研究附中问题的校务会，针对办学经费、教师引进、设备更新、校园改造等问题，向北航大学的领导提出最快提升北航附中的办法：一是人大附中长期派副校长任北航附中执行校长；二是把北航附中纳入人大附中教学体系——北航附中的老师每周到人大附中跟各学科老师一起备课；人大附中的老师也要送课到北航附中；人大附中在北航附中自初一起办两个“人大附中”班，给北航附中的师生示范怎样“教”与“学”；三是引进人才，对附中招聘来的骨干教师，大学必须给予足够

重视和支持，解决编制等问题；四是不合理的建筑必须拆走，给学生空出运动操场；五是北航的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要向附中开放；六是附中不应办成子弟学校，要开门办学，让非北航子弟也能入学。

刘彭芝担任北航附中校长后，还发现北航附中多年来一直是大学办中学，归大学后勤处管理，经费来自大学科研经费——这是附中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根源。经过刘彭芝和北航校领导的多方协调和努力，最后妥善解决了由国家财政拨款办学的根本问题。

有了这些整改措施，人大附中派过去的几任执行校长得以大展拳脚，北航附中眼见着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前北航附中连北航的二代子弟都留不住；人大附中进去后，不仅二代子弟往回涌，三代子弟也往里挤，一时间学位紧俏，不得不想办法扩大办学空间。

从2006年至2014年，人大附中先后给北航附中派了五任校长，包括在人大附中主管教学和高三工作的副校长。

如今的北航附中已更名为北航实验学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从海淀区中学排名靠

后的学校，成为海淀区示范校、北京市优质高中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在航天科技教育上办出了特色，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市长奖每年就5个），并与大学共同开启了通用航空后备人才培养的探索之路。为了提升海淀区的基础教育，北航实验学校于2017年4月接管了中关村中学分校，很快还将接管一所小学。



与河南新密进行远程教学。

本地的优质师资要惠及当地乡村，才能务实地解决教育资源均衡的问题

2005年3月，北京市教委推出100所名校各自帮扶一所郊区学校的活动，分配名单下来，北京市延庆县（2015年11月撤县设区）永宁中

学成为人大附中的“手拉手”对口帮扶校。

延庆距北京城区近百公里，永宁中学是延庆县唯一的一所有高中的山区学校，该校教学薄弱到什么程度？在它的近十几年，基本上培养不出大学本科生。

面对基础条件这么差的现状，刘彭芝没有推诿。这个时候，刘彭芝对帮扶已经有了点经验，反而想利用这个时机，看看优质资源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虽然从高一抓晚了点，但也要试试。

2007年秋，人大附中派出11名骨干教师去延庆支教。教师们去了以后，不仅带去了刘彭芝教育要有大爱的情怀和理念，也带去了新的教学模式——人大附中老师不仅对永宁老师开放课堂，还对延庆的几所中小学的老师开放课堂。第一年，从高一四个班里分出两个班，全部由人大附中的支教老师授课、任班主任；第二年从高一又分出两个班，这11名老师两个年级跨着教，还是忙不过来，刘彭芝就又给加派两名老师。但到了第三年，人大附中派不出来老师了，一方面，人大附中的老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聘太多代课教师，另一方面，

高三了，正是紧要关头，不能对永宁撒手不管。虽然市教委当初并没有就怎么帮扶提出硬指标，怕给学校压力大，但永宁师生和家长可都盼着结果呢。没有办法，只好把永宁两个高三班接到人大附中本校就读一年。2010年高考，永宁中学这两个班80名学生里，56名考上了大学本科，震动整个延庆。

这次实践，证明了刘彭芝的一个判断：即使初中学习基础不太好的农村学生，只要有好老师教，经过高中三年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考上大学本科的。

当时北京市有一个政策，凡是通过名校“手拉手”取得显著成绩的学校，可由北京市发改委拨款，旧貌换新颜。在刘彭芝的推动下，永宁中学凭此得到了发改委7000多万经费，办学条件从此步入现代化。趁热打铁，刘彭芝结合新密办学的经验教训，向延庆县教育局建议，把永宁中学的高中部划归延庆县教学质量比较高的一、二、三、四中，集中全校优质师资打造好初中；同时，人大附中与延庆一中等校“手拉手”，对其开放人大附中的网络资源，从而解决永宁中学的高中生源得不到优质师资教育的问题。

题。

延庆县教育局经研究接受建议，经过几年的建设，永宁中学现在已是北京小有名气的农村学校，各个方面都是延庆地区农村中学的“领头羊”。

要把人大附中成功的办学经验加以复制和推广，让更多的学校变成优质学校

有领导说，人大附中办学，办一所成功一所。

地处北京市中心地带的翠微中学、卫国中学也是两所薄弱校。由于教学质量一直上不去，骨干教师和学生逐年流失。2013年，翠微中学初三学生流失率53.9%，卫国中学初二学生流失率达到51.7%，两所学校骨干教师加起来不到20名。两所学校所在的羊坊店学区，有翠微小学、七一小学等5所在海淀区排名前列的小学，可是那里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后都飞走了，几乎没有人愿意选择翠微和卫国这两所近在家门口的中学。就连本校教师也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别的学校。附近居民吓唬孩子的时候常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来这儿

了”。

2014年初，北京市有关领导和海淀区教委想委托人大附中承办翠微中学和卫国中学。刘彭芝说：“当时，人大附中已经向帮扶的学校先后输出了几十位校长和骨干教师，很难再往外派团队了。可是那两个学校的情况又确实让人揪心，如果我们不伸手帮一把，那两个学校就有可能办不下去了。”

正当刘彭芝左右为难的时候，时任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和人大附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刘小惠来找她说：“校长，我想去试试。”并给她出了一个点子：去翠微、卫国的教师可采取轮流支教的方式。

刘小惠带去的这支支教队伍实力了得：有主抓初三、高三的年级组长，有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生物等部分学科的教研组长和备课组长，他们中多数人是北京市或海淀区的学科带头人。

刘小惠他们进去后，延续人大附中的风格——先抓教师业务水平。每个年级都由教研组长领着统一备课，也去人大附中参加集体备课；每个老师都要做课件，听课，试讲，业务

考核。以前翠微中学老师都是坐班制，每天下午到了4:30，整个校园都已经空空荡荡的了，师生全走了。没有老师有加班热情，也很少有学生有学习热情。人大附中去了以后取消坐班制，老师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但是，却经常灯火通明。

经过4年努力，2017年，翠微中学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培养出了海淀区中考状元，中考录取分数也由2013年的458分，提升到519分；高考只谈一本录取率，文科从2014年的14.3%，提高到39.1%；理科从2014年的5.4%提高到36.2%。

有的帮扶是扶起来以后送一程，有的帮扶是帮着帮着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还有的是其他区县教委主动来结盟人大附中的，这样的学校多了后，2013年，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就成立了，现在共有22所学校——这也符合北京市教委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号召。

按照刘彭芝的“扶贫方法”，凡是挂人大附中牌子的，必须有人大附中的人在。那么，疑问出来了——人大附中将这么多教学骨干和管理干部都输送出去了，对人大附中的教学和管

理不会有影响吗？

刘彭芝说，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客观地说，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但通过努力，我们实际上也没有下滑，因为我更相信人大附中自身的“造血”功能。优质校帮扶薄弱校，如果只是单向输出，很快就会被“掏空”。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两手抓，一手抓薄弱校帮扶，一手抓本校干部、教师的培养。这就是输血和造血并举。人大附中每年都会进一批优秀硕士生、博士生，学校通过老带新、岗位历练等方式让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他们很快就成为学校的管理骨干和学科骨干。

2014年，人大附中先后获得两个奖：全国教育教学改革一等奖、国务院扶贫办颁发的“全国先进扶贫集体”——这后一个奖，是中学界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一个优秀的校长可以带好一所学校，一所非常突出的好学校又可以带起一片优质学校

囿于人大附中毕竟只是一所学校，精力和能力有限，即使拆了也办不了几所学校。因

此，2009年，当上海教育局找到刘彭芝，商讨建立刘彭芝校长培训基地时，她一口应允。“校长是学校的精气魂，要想学校好，先得有个好校长”，“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

为了造就基础教育领军团队，2009年4月，上海市教委在人大附中建立了“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刘彭芝卓越校长培养基地”，北京市旋即也在人大附中建立“北京市普教系统先锋校长培训基地”，两个基地同年同月揭牌，来自17个省市和地区的校长纷纷前来，于是，“中国基础教育卓越校长卓越教师培养基地”（简称双卓基地）应运而生。

双卓基地的学员都是依托各省市名校长基地选拔出来的优秀校长，刘彭芝和人大附中团队以人大附中为样本，通过“必修、选修和科研课题”等板块教学体系对培训负责。

——江南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华文化的先进地区，无论教学经验还是考试成绩，历朝历代都是响当当的，传承渊源，大上海怎么会到北京来拜师学艺呢？

2015年12月15日，在深圳的创新人才交流大会上，与会的校长基地成员上海甘泉外国语

中学校长刘国华对记者说：“实话实讲，刚开始我们也对刘彭芝不服气不理解，我们上海也是硬气的。但跟着听课、到人大附中实地研讨一年多下来，不服不行，人家是干出来的教育家，不是说出来的。”“我们上海第一批学员有22人，其中20人已被评为特级校长或特级教师”。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是基地学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证实：“几年来，跟刘校长学到了很多東西，她的奇思妙想既符合教育规律和本质，又具有独到见解，尤其可操作性强”。

——那么，都怎么产生影响的呢？

一位参加国培计划已两年多的四川校长说：“主要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一流的教育，了解一流学校到底是怎样的以及他们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刘校长请来美国教授给我们上课，里面就有很多教育理念和具体办法，让我眼界大开，这对我们回去办学就非常有帮助”。

据刘彭芝介绍，这些校长都是有任务的，学完回去后，他们要带动那一个地区的校长进

行学习。

2015年，人大附中通过竞标，取得了校长国培计划培训资质，成为全国八个培养基地中唯一的中学基地。

名校长领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层次的校长培训项目，前期从全国遴选出64名中小学校长，最终，通过各基地与校长学员的双向选择，有8名校长成为了人大附中基地学员，刘彭芝任基地主持人。通过为期3年的培养，人大附中将助推这8名校长成长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教育家型校长。

——这么多项工作加身，刘彭芝个人总该得到一点可观的回报吧？会是多少呢？好奇。

“一分钱也没有，任何待遇都没有接受过”，刘彭芝说，“我就是热爱教育事业，喜欢孩子，喜欢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更多孩子、更多家庭的命运。我也闲不住，想干点儿事。你问我图什么？我就图这辈子能把这点教育理想实现了，对我来说，成就是最大最好的奖赏。”

基于人大附中培养基地身处办学一线，自

身的办学思想、学校的办学实践成果以及生成性资源等，他们以托起未来的教育家为培养目标，确立了“学校发展与校长自身发展有机结合、培养工作与基地校工作有机结合、培养工作与学员校特色发展相结合、自身发展与示范引领有机结合”的四结合培养理念。

2018年1月22日，“教育部校长国培计划校长领航工程中小学校长领航班人大附中培养基地学员成果汇报会”上，学员们认为，通过领航基地近三年的培养，不但促进了他们从优秀校长向教育家型校长的发展，校长工作室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校长。

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平台，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名校课堂，共享优质教育



双师教学第一课堂，人大附中刘蓓老师正在上课。

人大附中的授人以渔还包括远程教育。

1998年，人大附中就建成了第一代校园网，与加拿大渥太华理德高中进行了第一次远程教学；1999年，陆续跟美国堪顿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网络生物教学；从2000年起，人大附中又开始与北京远郊区县十余所中学、长沙、韶山、河南、宁夏等地建立网络授课，分享人大附中的课堂教学给教育资源贫困地区。

2005年，人大附中发起成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刘彭芝任主席，联合全国几十所优质中学，汇聚优质教育资源，从2006年6月2日开始正式启动，向社会开放，受

到各地尤其是边远山区教育落后地区的欢迎。至2018年1月，已辐射全国31个省区市，有4756所加盟学校，注册教师和学生近92万，建成了6万多课时的教学资源，成为覆盖全国的公益信息网络平台。

2013年9月，人大附中先后有刘蓓、李颖、李晨光三位老师，接受了刘彭芝派给的艰巨任务：做一年的网络直播课程，就是他们在人大附中的课，将同步出现在北京延庆、内蒙古、河北、广西、重庆、云南等地区13所中学教室——每天上一节公开课。这对老师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到与北京人大附中的学生同样的师资。为了教育均衡，人大附中的老师也是拼了。刘蓓说，整整一个学期，她没有睡过一晚好觉，因为每天早上八点她的数学课都要现场直播。

但进行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各地区孩子的基础不尽相同，直播有时不容易被贫困地区的孩子即刻理解。于是，很多学校改为录播，他们的老师先看一遍，然后放给学生看，遇到学生不懂的地方，按暂停，老师再在黑板上做讲

解。

双师教学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支教创新”，这种“公开课全程全覆盖”模式的推广，大大加速了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改善进程，是对地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老师业务水平的提升以及学生素质的培养都有利的多赢举措。试点学校的老师们说：“双师教学全程、全覆盖的教学指导，是最有效、最实用的教师培训”，“因为每堂课都是在线直播，跟着第一课堂的老师一起学习，向他们请教，研究他们的课堂，是促进教师成长的最快捷有效的方式。”

有两个事例、一组数字可以证明成绩的显著：经过一年的学习，广西阳朔朝板山中学，年级平均分是56.6分，双师教学试点班的平均分却高达92.7分；内蒙古和林二中，年级平均分是39.5分，双师教学试点班则为59.7分。

现在，全国很多优质学校都采取双师教学这种模式，比如重庆彭水自治县，录制了本地优质小学音乐课和美术课，在地区近10所小校开展双师教学试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教育行政部门牵头下，在全省174所中学推进双师教学模式。成都七中、新疆的华山中学等，也利用

网络平台向落后地区和教育洼地开放自己的教育资源，为教育均衡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推动教育制度改革上，刘彭芝和人大附中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她种下了改变的种子。再过一些年，她当年种下的种子就会陆续开花，成批结果。”人大附中2003届的一个校友这样评说自己的母校。🌱

国际

肯尼亚的中国电商时间

特约撰稿 / 刘壹昭（发自肯尼亚内罗毕）

对于像Patrick这样的肯尼亚司机而言，熟悉的中国名人名录里，除了Jack Chen（成龙）以外，如今又多了一个“Jack Ma”。

“Jack Ma ! Tao Bao !”虽然从未见过马云本人，但Patrick对这位中国企业名人毫不陌生。去年夏天，马云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到访非洲，引起一股追捧热潮。肯尼亚最大报纸《星报》等媒体此前持续半个月进行了预告，“Welcome Jack Ma”刷遍非洲各大媒体。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马云宣布了四个小计划，包括资助200个非洲年轻企业家到杭州学习、与非洲大学和政府合作对学生进行培训、设立保护区巡护员奖励基金以及成立一个1000万美元的非洲年轻创业者基金。“不需要等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再做电商，在非洲，我看到

了创业的热情和激情。”他说。

肯尼亚早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电子商务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国较为开放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与逐渐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加上近年来海底光缆建设的推进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肯尼亚的网络覆盖率已达总人口的60%，居非洲第一位，而非洲的平均覆盖率仅为18%。

经济学人智库（EIU）最近发布《科技驱动非洲零售业》白皮书，预测未来十年内，非洲电子商务的潜在估值或高达每年500亿至750亿美元。但同时，非洲电子商务增长的障碍也不少，包括欺诈行为、电信网络基础设施相对缺乏、供应链的障碍、非洲零售市场的分散性以及亟待提升的人口文化素质等。在肯尼亚这片潜力与挑战共存的“蓝海”，早有中国玩家入场。

比支付宝更早，肯尼亚用上移动支付



路边随处可见可用M-Pesa支付的小店。

网上购物的生活方式是2012年进入肯尼亚的。在经历了最初发展缓慢的阵痛后，过去四年来，电商在肯尼亚已经成为一个发展全面的行业——有数十家线上购物平台在网上拍卖商品，数百位商家甚至直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销售。

在中非B2B跨境贸易平台Amanbo工作的殷英彬刚到肯尼亚就被“震惊”了：从线下零售店的付款到线上手机充值，内罗毕市民都在使用一种名为“M-Pesa”的手机银行业务。

M-Pesa在肯尼亚上线的时间，甚至比支付宝在中国上线的时间还早一年。2007年，由

Safaricom和沃达丰研发的M-Pesa在肯尼亚上市，最初是为了解决小额贷款者用Safaricom的话费进行收款和还款的需求，最终演变为城市打工者将钱转账回农村老家的业务。除了手机支付功能，连支付宝、微信等平台都不支持的存取款业务，M-Pesa也能通过其网点实现。

“肯尼亚银行网点太少，居民又有大量的汇款、转账需求，M-Pesa的出现解决了这一切。”Patrick说。使用M-Pesa并不需要绑定银行卡，只需要注册一个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就是支付账号。用户将钱存入账户中，通过向其他用户（商品卖家）发送短信进行支付。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肯尼亚银行店面的平均间隔距离为9.2公里，而M-Pesa代理商的服务网点仅有1.4公里。内罗毕以外的地区，96%的家庭拥有至少一个M-Pesa账户。即使是未被电网覆盖的农村，只要有Safaricom信号，同样可以使用M-Pesa。

很少人能把这种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支付方式同贫穷落后的非洲大陆联系起来，中国电商却看到了机遇。“非洲目前已经跳过PC端时代，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多种条件使它

必然会接受电商，移动支付方式就是其中之一。”Amanbo肯尼亚运营中心经理殷英彬告诉《凤凰周刊》。



Amanbo团队在本地零售市场做推广。

作为非洲大陆覆盖率最高的移动支付方式，M-Pesa为Amanbo、Kilimall等中国电商在非洲的支付环节提供了基本条件。十年间，M-Pesa还不断扩展业务范围：2010年推出超市付款业务；2011年，推出国际汇款业务；2012年，M-Pesa用户可以在合作银行的ATM机上取款。截至2016年，M-Pesa全球用户达到2500万，覆盖非洲、亚洲及欧洲3个大洲、共11个国家，其中肯尼亚用户1900万，平均日交易额预

计150亿肯先令。

M-Pesa让肯尼亚农村及偏远地区大范围实现了普惠金融，但这种电信运营商、银行和支付清算商“三位一体”的小额支付方式也有其短处。若使用M-Pesa网购，中间要向运营商支付较高的费用。而在东非，信用卡并不那么普及。肯尼亚拥有信用卡的人仅占总人口的0.005%，即便很多地方支持信用卡支付，但由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未能经过安全审核——这意味着支付机构需要购物者出示身份证件扫描件才能完成支付。而绝大部分购物者会在这一步骤上放弃支付。

对Patrick来说，他们一家已成为中国电商的“忠实粉丝”。2017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Patrick下载了Kilimall，购买了一台价值为6000肯先令的三星手机。之后，他推荐给了妻子。现在，Patrick的三个女儿和中国的大多数热爱网购的女孩一样，每日期待着在家收到包裹。“电商在肯尼亚会有很好的发展，因为它真的很方便，很快。”Patrick说出了直观感受。

网购前三名：手机、服装、假发

即使具有号称非洲第一的网络覆盖率，肯尼亚的电商消费市场仍是一片不同于中国的境况。

在非洲生活了两年的Kilimall创始人杨涛，认为非洲的线下零售市场自有其难处。目前的现状是，非洲的零售业绝大部分还处于乡村集市的状态，商品的可选择性少，且价格极其昂贵，一般是中国的三倍以上。作为一家主打非洲市场的跨境B2C电商平台，Kilimall2014年诞生于内罗毕，目前已将肯尼亚的本地化运营扩张到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市场。

为解决这一痛点，肯尼亚政府也在近年采取行动，通过政策与资金推动电子商务领域发展。根据肯尼亚通信技术部制定的蓝图，该国将制定配套政策大力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力争在未来可以将宽带覆盖率覆盖到50%，行业产值占到GDP的35%，成为经济恢复与增长的行业支柱之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亦将解决该国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欠缺的问题，带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而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中小型商家，非洲市场目前仍处于培养消费习惯的阶段。对于

这一点，Amanbo与Kilimall达成了微妙共识。以B2B业务为主的Amanbo，客户以本地中小型商家为主。推广过程中，殷英彬发现，客户普遍对于电商这个新鲜事物不太容易接受，“最主要还是信任问题”。为了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Amanbo团队曾尝试在每周五举行客户见面会，邀请有需求的客户到门店内咨询、参观。

即便智能手机普及率飞速提高，仍有一部分肯尼亚人受制于各种原因，无法使用手机端进行网购。对此，Amanbo采取的策略是“O2O”立体营销模式，即通过雇用本地年轻人去连接线上平台与线下社区。这些会使用智能机、对电商领域有一定了解的年轻人，每天在公司开完早会后，就出发去各个批发零售市场，寻找中小型商户讲解、推广。

据市场调研机构尼尔森的调查显示，2013年-2014年间，肯尼亚人的网购开支已超过100亿肯尼亚先令。他们不仅在网上出售和购买服装、电子产品、家居用品等，还出售和购买传统市场才需要的产品，比如农业物资、机器甚至牲畜。

“说到用户特点，肯尼亚的消费者极其追求

性价比，用户忠诚度较高。”电商平台Kilimall物流副总监李政权告诉《凤凰周刊》，肯尼亚消费者在网购时，最青睐的产品依次为电子产品、时尚类产品与电器。电子类产品主要以中低端手机为主，时尚类产品除了服装，假发的销量也十分可观。在非洲，假发素有当地非洲女性“第二套衣服”的美称。

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在进行网购时，尚未形成在线支付的习惯，更青睐货到付款。由于消费者心理、客观环境等复杂因素，常常造成货物送达，消费者却无钱付款的窘境。对此，Kilimall团队聚焦肯尼亚消费者最喜爱的电子通讯类产品，采用线下推广的活动培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如在非洲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传音手机的线下发布会上，请来当地歌手助阵。由于迎合了当地人热爱歌舞的特点，李政权记得，那场线下发布会共计到场5000人左右，极大带动了网售手机的销量。

为了使商家和消费者的移动支付渠道能更好对接，李政权透露，Kilimall开始计划自主研发支付端口。“以肯尼亚目前的条件来说，很难专注于电商这一件事，必须把诸如产品、支付

方式、物流等各类渠道综合搭建起来，才能更好发展。”

从推广、支付到物流，肯尼亚的中国电商基本已经实现团队本地化。由于政治环境与文化差异的影响，团队在初期仍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在肯尼亚，人们较为缺乏时间观念，生活方式也较为懒散，不能适应加班。除此之外，肯尼亚大选期间，必须给员工放假投票。2017年肯尼亚经历两次总统大选，员工假期前后长达数日，给团队的正常运营带来极大挑战。

中国电商如何应对残酷的非洲市场

尽管过去几年互联网企业数量增长迅速，非洲媒体Disrupt Africa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非洲70%以上从事电子商务的新兴企业并不盈利，主要面临缺乏资金支持、信任缺失以及物流困难等困境。

这一方面源于Jumia、Konga等非洲电商巨头早已挤占了市场的多数份额，中小型电商玩家面临强劲对手。以有“非洲亚马逊”之称的Jumia为例，2012年诞生于尼日利亚的Jumia为

Rocket Internet旗下电商平台，其产品类型多样，销售鞋服、电子产品、化妆品甚至酒精，业务模式与亚马逊十分相似。Jumia业务覆盖喀麦隆、埃及、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英国等十个国家。截至2014年，Jumia在肯尼亚市场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900%，同年获得1.5亿美元投资，市值为5.55亿美元。

但即便坚挺如Jumia，也不得不承认非洲市场的残酷性。2013年，Jumia曾预期在一年半之内实现盈利，但2015年亏损1.1亿欧元，2016年前三个月亏损1700万欧元，随后把目标调整为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盈利。Jumia现任CEO Juliet Anammah更是表示，非洲市场将是一场持久战。

交通的拥堵与不便，是内罗毕市民趋向于网购的一大因素。Jumia的数据显示，早上六点到九点之间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之间是网购高峰期，许多人会选择在拥堵时间段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浏览购物。随之而来，快递行业成为肯尼亚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最大受益者——2015年下半年，快递业的出货量上涨了30%，但由于肯尼亚自独立以来还没有形成一

个良好的物理地址系统，对物流发展形成重大挑战。值得庆幸的是，肯尼亚政府即将开始采取行动，通过加强街道命名来完善电子地图及地址，推动肯尼亚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在从业者眼里，即便解决了支付问题，货物如何成功送达消费者手中也是一大难题。据房地产智库Knight Frank所做的《2016非洲物流报告》显示，过去10年，仓储及物流业发展速度每年增长24%，但非洲交通设施破旧、交通堵塞，物流时间是发达国家的2-3倍，物流成本占商品零售价格的50%-75%，成为电商的主要障碍。

除了价格贵、速度慢，物流公司尚未建立一站式物流管理系统，消费者与商家不能即时了解货物的流程，而只能通过报表在每个流程手工核对，造成很大不便。殷英彬也体验过当地物流的“不靠谱”。一次，他在某购物网站上购买了洗衣粉等日用品，购物网站上保证一到两日送达，途中三个快递员通知他货物即将到达，但两周后仍杳无音讯。忍无可忍之下，殷英彬取消了订单，但他也没想过投诉，因为“投诉的周期更长”。

物流的成本直接影响着售后服务的执行。在国内，客户退换货是与商家沟通，平台主要是起到鉴定、仲裁的作用。而在肯尼亚，由于客户不清楚流程，只会直接联系平台退货。“必须给退了，不然警察就扛着枪过来了。”李政权有些无奈。

就本地物流运转来说，自建与第三方物流合作方式是中国电商在肯尼亚内罗毕市采用的主要物流模式。以Amanbo为例，自建仓储主要解决货物短期存储的问题，消费者可以通过城市的自提点网络领取货物，第三方物流则针对的是更长途的物流运输问题。

针对快递递送流程无法跟踪的情况，Kilimall采取的策略是与本地物流公司合作，搭建物流订单跟踪系统。物流跟踪系统与货物售前检验结合，完善了售后体系。在货物寄出前，公司会对货物状态进行拍照检验。若消费者收到的货物有质量问题，七天内将免费退换。

在人口红利、经济增速、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Kilimall的杨涛认为，非洲至少还得2-5年时间，才能达到中国十年前电商市场

的爆发状态。“如果把电商的发展状态分为四个阶段，即非主流人群买非主流商品、非主流人群买主流商品、主流人群买非主流商品、主流人群买主流商品，目前非洲的发展，还属于第二阶段。”杨涛说，“但目前来看，非洲人比中国人更需要电商。”

美女拉拉队往事

平昌冬奥会背后的南北关系

记者 / 陈祥 嘉沐



2018年2月7日，韩国京畿道坡州市，朝鲜拉拉队抵达京畿道。这是朝鲜拉拉队第四次访问韩国，上一次是在2005年仁川举办的亚洲田径锦标赛，距今已有13年时间。

被称作史上“最冻人”的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来自北方的贵宾为这场盛会带来暖意。金正日的四女、金正恩最信任的胞妹——金与正来到此处。这是朝鲜金氏家族“白头山血统”成员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踏上南方土地。

这位据称30岁的女性是朝鲜的政治红人，现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她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一同留学瑞士5年，如今不仅负责安排兄长需出席的一切活动，还常站在他身后接过别人献上的鲜花，被视为“影子随行”。平壤干部圈里传言“所有事情都通过与正同志”，甚至说她是“第二号”实权人物。

金与正的风头甚至盖过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永南。金永南1998年出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以来连任至今，是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韩国人关心这位90岁的老人能否受得了零下15度的严寒。既然金永南只是国家外交的象征性存在，韩方更加期待金与正的到来，因为她才是金正恩的特使，能替最高领袖传递消息。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指出，金与正访问韩国体现了朝鲜方面缓和半岛局势的意志。

2018年的新年贺词里，金正恩提到要把平昌冬奥会打造为一场大型的民族庆典，被认为是他软硬兼施策略中“软”的一面。舆论普遍认为，金正恩欲将朝鲜参加冬奥会作为离间美韩关系的一颗棋子，借此削弱国际社会对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制裁。

拉拉队时隔13年归来

金与正给外在的柔和印象，跟一道来韩的朝鲜艺术团和拉拉队一样，堪称朝鲜的“武器”。

一袭鲜红色大衣的229名美女拉拉队员，坐火车走京义线，于2月7日抵达韩国的南北出入境事务所，随后换乘韩方准备的大巴车，奔赴奥运村，吸引上百家媒体关注。

韩国统一部次官千海成于2月7日举行晚宴欢迎到访的朝鲜代表。千海成在晚宴上说：“你们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来到韩国，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旅程，它重启了韩朝关系。你们为支持韩国和朝鲜运动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将为韩朝双方扩展和解与合作打下重要的基础，并且释放了和平的意愿。”

参加晚宴的朝鲜拉拉队队长回应说：“现在正处于朝韩关系的缓和期，一度冰冻的朝韩关系现在正在慢慢升温。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一次我们的和平使团从海上、陆路、空中三种方式来到韩国，拉开了朝韩和解与合作新时代的序幕。”

与拉拉队同行的还有跆拳道示范团26人、记者团21人，以及朝鲜体育相金日国在内的朝鲜民族奥林匹克委员会4人。陆路共计过来280人。这当中，金日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黑名单上，韩国为了冬奥会网开一面。此外，韩国允许朝鲜的火车和轮船入境，都是暂时打破韩国对朝鲜单方面制裁措施。

朝鲜在去年年底就结束了冬奥会拉拉队的选拔工作。229名队员来源与往常差不多，主要来自金星学院和平壤话剧电影大学，均在23岁以下。金星学院也在平壤，是一所专门艺术学校，学制包含4年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它集中了全国的艺术苗子，毕业生被分配到银河管弦乐团、牡丹峰乐团等国家层面的艺术表演团体。平壤话剧电影大学，用于培养朝鲜的电影、话剧、电视、广播人才，包括创作人才、技术人员，也包括演员。

选拔标准是身高160cm以上，170cm档次的优先录取。对选拔者来说，身高比面容更重要。长年食品供应匮乏导致朝鲜人平均身高比韩国人矮7.5cm，男性身高更是将差距拉大到15cm。朝鲜军队对入伍的身高要求，由2008年

150cm，降低到2012年的142cm。

这是金正恩上台后第一次派出美女拉拉队到三八线以南，她们的一举一动也代表着国家的颜面，况且朝鲜今日已宣称其为有核国家。“当局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文化的威力展现成为核强国的共和国的力量’，改变参与对朝制裁的世界各国对朝鲜的认识，同时还能消除百姓们的不安心理。”有消息人士告诉韩国媒体。

美女拉拉队如何养成

从穿衣、发型、化妆，到走路姿态和说话方式，拉拉队的训练可谓包罗万象。为2014年9月仁川亚运会之行准备的拉拉队，训练了三个月，最终因政治大气候原因未成行。当时培训老师甚至教授大家吃饭时不能出声、餐具要放整齐等环节。那一年，美女们的包、服饰，包括内衣，都是从中国订购的；皮鞋和运动鞋，则是平壤市平川区的一家鞋厂以“第8号产品”专项定制，出发前15天才发给大家。

2014年的拉拉队，据称还有了一项新福利，免费做小型整容手术，如割双眼皮。不

过，朝鲜当时已经对一些涉外行业的人员免费提供这类手术。

想入选拉拉队，除了身体素质，思想更得过硬。成员亲密的亲属中不能跟韩国有关系，也不能是“脱北者”家属。上级会考察每个人最近的思想状况，从根源上杜绝有人逃跑。拉拉队里混杂着不少负责监视的保卫部女职员，她们改了名字和年龄，跟大家一起接受拉拉队培训。当然，拉拉队员之间也要相互监视。“拉拉队是进入敌方阵地（南朝鲜）宣传伟大领袖的劳动党的宣传先锋队。”这是2014年拉拉队内部思想教育的核心主题。

朝鲜美女拉拉队在韩国的首次亮相，是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288位面容姣好、身材婀娜的女子齐刷刷现身，统一身穿红色短袖、戴白色棒球帽。举全国之力选举出的美女行列，自然震惊世界。神秘美女们的第二次亮相是2003年在大邱举办的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这一次，来了303位美女。

2005年仁川亚洲田径赛，朝鲜派来124位拉拉队员。一些韩国男士甚至做出颇为出格的事，据称，有人潜入拉拉队所在的宿舍去求

爱，让警卫人员很苦恼。

124人中，有一位来自平壤金星学院的学生，名叫李雪主。她的出身只能算普通，父亲是空军飞行员，母亲是中学教师。从仁川归来后4年，即2009年，李雪主嫁给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外界暂时不知这段爱情的缘起，唯一能肯定的是跟她2005年的仁川之行密不可分。李雪主也因此被形容为“平壤版灰姑娘”。

吃穿住行在内的拉拉队一切费用，按国际惯例当然是由朝鲜出了，可之前全由韩国政府包揽。对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政府而言，阳光政策往北边送了这么多钱，不差这点招待费。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朝鲜还要求韩国为运输拉拉队的轮船“万景峰92”号加满燃油，朝鲜直接说自己没燃油让船驶回去了。而2014年度的拉拉队来韩之梦破灭，一大原因就是保守派李明博政府拒绝出钱。

这一次，朝鲜同样提出了类似要求。韩国统一部发言人2月7日说，朝鲜要求向停泊在韩国东部港口、作为艺术团住宿场所的“万景峰92号”客货轮提供燃料。该船靠港本身，是违反韩国政府对朝单独制裁措施的破例对待。如果向

其提供燃料，令人怀疑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相抵触，因为决议规定了向朝鲜提供石油精制品的上限。

韩联社认为，拉拉队是在推行南北融合政策的金大中、卢武铉时代被派往韩国的，起到了放松韩国人心理警惕的作用。朝鲜显然希望历史重现，1月举行的南北部长级会谈中，朝鲜方面首席代表主动提及金大中政府就是明证。

韩国民间褒贬不一



2003年8月20日，朝鲜派遣303人组成的拉拉队参加在韩国大邱举办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这也是朝鲜派出拉拉队员规模最大的一次。

平昌冬奥会期间，与拉拉队同样吸引眼球的还有朝鲜艺术团——由三池渊乐团、牡丹峰

乐团等6至7个朝鲜艺术团体的顶尖艺术人员组成的三池渊管弦乐团。140多个团员由团长玄松月带队，乘坐“万景峰92号”邮轮访韩，依次在江陵艺术中心和首尔国立剧场进行演出后，从陆路返回朝鲜。

这群姑娘们2月8日晚8时在江陵艺术中心举行首演，这是朝鲜艺术团时隔十五年半再度在韩演出。她们以韩国民众熟知的朝鲜名曲《见到你很高兴》开场，之后演唱的流行歌曲《向着未来奔跑》将气氛推向高潮。每一首歌曲结束后，台下观众都起立鼓掌欢呼。分析认为，她们的演出重新架起了韩朝长期以来中断的文化交流桥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也有望对缓解半岛紧张局势起到积极作用。

来自朝鲜东海岸元山港的“万景峰92”号客轮，于2月6日傍晚缓缓靠近韩国江原道东海市墨湖港。挂在船上的朝鲜国旗，很快被换成“朝鲜半岛旗”，它又名统一旗。这艘船有着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它是在日朝鲜团体朝总联在1992年募集40亿日元建造的，庆祝金日成当年八十大寿。新船下海后，专门替劳动党在朝日之间运输货物和人物，象征朝日贸易，直到受

日本制裁而禁入日本领海。

为了尽可能减少资本主义的“污染”，朝鲜政府禁止乘客们当天下船，让他们在船上解决食宿。韩国政府则在船周围设置禁飞区，韩国市民只能通过望远镜、长焦镜头观察船上的举动。除了欢迎队伍，几百名抗议者在岸边举行示威活动，高喊“反对‘平壤奥运会’”“返回朝鲜”等口号。众人挥舞太极旗和星条旗，还有人当场焚烧朝鲜国旗，焚烧行为很快被警察制止。

2月9日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鲜和韩国两国运动员代表团举着“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比赛期间双方还将在女子冰球项目上组队参赛。这也是继2006年都灵冬奥会后两国运动员又一次携手出现在冬奥会赛场。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这次冬奥会视为一个来之不易的与朝鲜对话的机会。今年1月，韩国与朝鲜之间进行了3轮对话，讨论朝鲜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这是朝韩双方两年多来首次举行官方对话。一位前统一部官员粗略计算了冬奥会期间韩国人需要为朝鲜代表支付的账单，预计总开销将超过20亿韩元。

韩国政府对平壤表现出的友好姿态却让民间诟病不断。“奉献青春所付出的努力，在政治游戏面前化为了泡影”，“不要来，少作秀了”……是近期韩国网上常见的情绪性话语。一曲名为《平昌遗憾》的RAP在坊间热传：“降下太极旗，升起韩半岛旗/如果不是夺牌圈，就是朝鲜优先/你们没有公正和希望……/全世界嘲笑的平壤冬奥会，我不要。”

1月17日，文在寅视察忠北镇川体育村时，表示女子冰球韩朝联队将“名垂青史”。但不少韩国青年群体强烈反对该联队的组建，为被朝鲜名额替换下去的韩国运动员打抱不平，认为这些收入不高、仅凭兴趣参训多时的运动员沦为政治牺牲品。青瓦台人士表示担忧说：“最近韩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切有关朝鲜的问题上都持保守态度，在竞争中疲惫的年轻一代担心组建联队有失公平。”

时代变换，风云激荡，如何面对北方的邻居不仅仅反映韩国政治光谱中左右翼的争议，更体现了2030世代（20-39岁）与386世代（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长）之间价值观和理念上的冲突。2030世代见证了延坪海战、

天安舰沉没事件、炮击延坪岛事件、木盒地雷挑衅事件等，也多少了解到朝鲜社会的实情，普遍对朝鲜不抱希望。386世代则是进步派总统文在寅的票仓，这代人年轻时在大学校园里阅读各种激进书籍、仰慕主体思想，还积极投身学运。当文在寅阵营里有人指责“青年人群在保守政权的10年里没接受过像样的统一教育”，对方立马回击，“我们是目睹天安舰（击沉）和延坪岛（炮击）的一代人”。

韩国人付出的热情已经收获了诸多不快：1月14日，朝鲜政府反击文在寅的新年讲话时称，“南朝鲜当局者别搞错了。我们不会对给韩朝关系泼冷水的不纯行为坐视不管。”开幕式准备期间，朝鲜曾警告：“如果南韩当局不能妥善管理舆论，管不住嘴巴，一不小心，喜事就会变成丧事。”1月底，朝鲜单方面宣布取消金刚山联合文化演出，理由是韩媒存在恶意报道。就在出发前，朝鲜还反复威胁说，“要知道，搭载我们（去平昌的）代表团的火车和巴士，还在平壤呢。”

“没有一个国民会相信，朝鲜派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冬奥会并举行几次韩朝对话就能解决朝

核问题并给我们带来和平。”有韩国媒体发表社论说，“因此，我们在欢迎朝鲜运动员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保证冬奥会和平举行的同时，不能为了对话而对朝鲜摇尾乞怜。”

朝鲜保持强硬姿态

对于南北近一段时间的走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对朝韩之间重启对话持欢迎态度，但对于朝鲜方面的动机美方仍持怀疑态度。

前来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月2日的一场演讲中说，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时代结束了，奥运之行就是为了传递这条简单明了的信息。“美国政府正凭借全新的美国力量，对朝鲜进行前所未有的孤立，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如果朝鲜继续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并威胁美国，很显然我们会将所有的选项摆上台面。”

彭斯还带来了一位不平常的美国平民客人，他是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亲。奥托去年被朝鲜扣押，最终折磨致死。彭斯还去参观了被朝鲜鱼雷击沉的天安舰，以及陈列天安舰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和西海守护馆。对朝鲜而言，这些举动都充满火药味。

2月8日，文在寅在首尔会见彭斯时称，韩方将借平昌冬奥会力争把朝鲜拉回无核化的对话桌，强调在此过程中韩美“无缝”合作最为关键。彭斯再次强调，美国的决心毫不动摇，守护同盟以及韩国国民的意志坚定不动摇。

基于美方的态度，朝鲜代表团抵达韩国时对外宣称“访问南朝鲜期间无意与美方会面”。朝鲜外务省局长赵泳三强调，“我方代表团前往南朝鲜纯粹只是为了参加冬奥会比赛，我方并不想利用冬奥会这样的体育庆典作为政治空间。我们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朝鲜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美韩在冬奥会结束后就按期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与日本一直催促尽早启动军演。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宣称，“美国心怀鬼胎，想要趁早在改善朝韩关系氛围进一步高涨之前进行破坏……问题在于韩国军方好战狂正在倒行逆施，响应美国的战争玩火闹剧。”朝鲜《劳动新闻》更提出警告，“在美国触碰到这片土地的瞬间，哪怕仅是一棵草，特朗普本人的脊椎骨将被折断，美帝则会变成地狱，而原本就十分短暂的美国历史也将随之永远地划上句号。”

为了展示强硬态度，平昌冬奥会开幕前一日，朝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式，由头是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70周年。此前建军节一直是4月25日。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在美国坚持对朝敌视政策、搅乱半岛局势的情况下，军队更要切实履行保家卫国的使命。这次阅兵并无新意，也不似苏军红场阅兵总会出现神秘“大杀器”，军队规模和阅兵时间都小于去年太阳节阅兵，也没邀请任何其他国家媒体采访报道，更没有现场直播。看得出朝鲜用意，对内高压绝不能因为南北关系或许出现回暖而稍有放松，但又不能过于刺激正在举办奥运盛典的韩国。

国际社会担心的是，此次南北融合不能带来使朝鲜弃核的结果，并且韩国还逐渐接受朝鲜的单方面要求，使得此前建立起来的对朝制裁网一点点瓦解。“这不是长期外交努力的结果，也没有结束潜在的紧张局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朝鲜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警告说：“未来在其他战略问题上的任何互动，无论是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离散家庭团聚，都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法国“问题奶粉”背后的企业

“拉克塔利斯拥有庞大而惊人的权力，我不能与他们争执，否则非常危险。我们超市一半的奶酪架和几乎所有的牛奶架将是空的。”

记者 / 张竹林（发自巴黎）

“我觉得是我给孩子喂了毒药！”法国西部城市昂热乡下的一位年轻母亲痛斥道。她的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经常性腹泻长达六个月，并两度入院治疗。儿科医生最终发现，孩子感染了沙门氏菌，而她每天喂食的拉克塔利斯集团（Lactalis）旗下奶粉是罪魁祸首。

据法国官方1月9日通报，去年8月以来，法国本土共有35位婴幼儿感染了沙门氏菌，住院的有18位。同时在西班牙和希腊各有一起疑似病例。

但这与“沙门氏菌污染牛奶受害家庭协会”主席古耶曼（Guentin Guillemain）向《凤凰周刊》提供的数据天差地别。古耶曼的孩子不到一岁，作为受害者家庭的代表，他正在全力收集相关信息。在超过3000个法国家庭提供的资料中，他刚完成了1000个案例的分析，并

发现有超过200位孩子感染了沙门氏菌，住院的婴幼儿达到60位。

这些患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六个月以内的婴儿。过去几个月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喂食了来自法国西北部小城市克朗出产的婴幼儿食品，无论这些食品是来自超市、托儿所，还是信誉度更高的药房和医院。

“整个行业都在颤抖”

去年12月2日，经过长时间的怀疑和调查之后，法国政府宣布，一些婴儿在食用了拉克塔利斯集团出品的奶粉和婴幼儿食品后患病。从这一天开始，这家全球最大的奶制品公司陷入了风暴眼。当天，拉克塔利斯宣布召回在其克朗工厂中出品的从7月中旬到11月底的十二个批次产品的20万罐奶粉。

“12月1日，婴幼儿奶粉受到污染与一些儿童感染沙门氏菌之间的关联性得到确认，24小时之后，法国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的专家们抵达克朗工厂，第一时间组织处理方案。”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向媒体传递的这番话，似乎在撇清民众对政府处理不力的质

疑。12月9日，克朗市所在的马耶纳省发布地方法令，责令克朗工厂停产。但几周后，有消费者在法国大型平价连锁超市勒克莱尔发现仍在销售中的问题产品。

2018年1月9日，法国大型超市集团勒克莱尔宣布，其旗下多家超市销售了1000多罐位于召回名单之列的婴幼儿奶粉。次日，法国主要超市集团欧尚、家乐福等纷纷“投案自首”，家乐福承认共卖出434罐、Système U卖出384罐问题奶粉，其他超市也或多或少销售了一些“问题奶粉”。“整个行业都在颤抖！”法国《费加罗报》如此评论。法国消费者协会更向以上几大超市提起诉讼，称其故意拖延“问题奶粉”下架时间。

1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政府有能力保证食品和卫生安全，法国政府对待“问题奶粉”的态度是“零容忍”。如有必要，政府将采取制裁措施。次日，三位相关主管部长分别在不同的电台早间节目上表达立场。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用了严厉措辞，称之为“严重的溃败”；农业部长特拉维尔则称“这是一个错误”；健康部长布赞说：“我担心，我们还将在

拉克塔利斯集团发现一些震惊的事。”同一天，勒梅尔还召见了拉克塔利斯集团首席执行官贝斯尼尔。

一向对媒体严防死守的贝斯尼尔于1月14日打破沉寂，接受了法国《星期天报》的采访。为了“灭火”，他承诺将会对被牵连到的家长进行赔偿。他同时保证，将召回从克朗工厂流出的1200万罐奶粉，但并未对问题实质做出解释。据悉，召回影响的出口市场遍布全球，包括中国内地及台湾、巴基斯坦、希腊、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海地、罗马尼亚、秘鲁、苏丹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被迫抛头露面地作出公开表态，但贝斯尼尔的强硬立场纹丝不动。该企业内部去年8月所做的两次检查中，均在清洁工具上发现过沙门氏菌。11月的另一次检查中，沙门氏菌还出现在车间瓷砖上。“但没有任何产品被检测出被沙门氏菌污染。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生产程序中没有出现失误。”贝斯尼尔坚称。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集团

“拉克塔利斯集团在法律之上。”1月16日，

法国最引人注目的电视栏目《现场调查》中，法国农业部长特拉维尔无奈地说。别说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部长，即便他的几位前任，也没人能拿到贝斯尼尔的手机号码。前任农业部长勒弗尔2017年卸任时坦言，在其任期内甚至无缘见到这位总裁的尊容。

这是一个极不透明的家族企业。1933年，现任首席执行官贝斯尼尔的曾祖父安德烈，在其简陋的小作坊中制造一种叫做卡门培尔的奶酪。1955年他去世后，儿子迈克尔子承父业。1945年到1975年，这段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辉煌三十年”中，贝斯尼尔家族企业增长迅猛，开始收购小企业并在海外扩张。1999年，公司正式更名为拉克塔利斯。此后，贝斯尼尔接过集团大权，开始新一轮的国际扩张路线。

按照他亲信的话，掌管集团十八年的贝斯尼尔遵循其父的一句格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因而极其低调。

贝斯尼尔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几乎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问题奶粉”丑闻爆发后，法国媒体甚至找不到他的近照，大多数用的还是一张拍摄于2007年、他在克罗地亚农业部的访

问图片。不仅是农业部长，拉克塔利斯15000位员工中的大多数也从未见过老板真身。他几乎从不去工厂，平日里车窗是茶色玻璃，用餐也只去私人包间。

贝斯尼尔的低调，还表现在对公司财务数据的严密控制上。拉克塔利斯集团始终拒绝社会上要求其公布财务数据的呼声——贝斯尼尔认为，因为集团属于非上市公司，并没有公布财务信息的义务，从而倾向选择支付罚金来摆脱财务公开的压力。拉克塔利斯集团唯一一次被迫公开财务数据，是在2011年。当时集团计划收购意大利著名牛奶公司Parmalat，以此达到维持全球奶企老大的地位。在一些顽固股东的反对下，收购最终未能成功，但却促成了集团史上唯一一次财务公开。2017年，拉克塔利斯再次试图购入该意大利公司的股票，以便促使该企业退出股市，结果再度败北。

在督促企业财务公开上，法国政府并非无动于衷。前总统奥朗德执政期间，法国牛奶业因高亏损而爆发牛奶危机。养殖户要求企业公布财务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提出与大集团“利益共享”，并以“缺乏最重要公司资料信息

的情况下无法分析法国市场行情”为由，要求拉克塔利斯集团公布财务情况。奥朗德政府还推出了“萨潘二号”（SapinII）反腐法案，对拒绝公开年度财政资料的企业追加罚金，并给予食品价格和利润率观察所主席拥有向商业法庭要求、取得该公司财务信息的权力。

当时的观察所主席菲利普·查尔曼这样做了，但拉克塔利斯依旧无动于衷、分毫无损。直到《现场调查》节目的披露，民众才恍然大悟：拉克塔利斯集团总部所处的拉瓦尔市，其商业法庭副庭长正是该集团的司法事务总监。节目中，特拉维尔认为，这显然是“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异常现象。



2018年1月17日，法国西北部拉瓦尔省，工人们正离开奶业巨头拉克塔利斯集团的总部。法国司法机关当天对拉

克塔利斯集团的5处办公场所进行搜查，以调查该公司奶粉受污染、以及随后召回过程中出现漏洞的问题。

对合作者的“铁腕”手段

过去几年，法国牛奶收购价暴跌，导致农户入不敷出，许多人即便每周工作60个小时，还是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因而大约一万户奶牛养殖者被迫退出这个行业。仅仅在2015年，法国有600多位农民自杀。位于卢瓦河大区的萨尔特，一位从2001年开始养殖奶牛的农户说，“过去两年，亏损了7万欧元”。这位养殖者也是拉克塔利斯集团的牛奶供应者。

与此同时，这家奶业集团的业绩却维持稳固发展。目前，拉克塔利斯在全球的47个国家分布着246座生产基地，75000人直接为他们工作，集团营业额达到170亿欧元。根据2017年《财富》杂志的排行榜，这位1970年出生的首席执行官以93.2亿欧元的身价，名列法国富豪榜第八位，全球第116位。而四年前，他的财富为43亿欧元。也就是说，法国奶牛养殖业陷入困境、养殖户越发绝望的黑暗时期，贝斯尼尔的个人财富翻了一倍多。

拉克塔利斯集团的牛奶供应商多为一些个

体户，他们不具备有向全球最强大奶业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一些养殖户提出的“利益共享”愿景，不仅被坚决否认掉，甚至还被讽刺教育。2016年的一次会谈上，拉克塔利斯集团购销部的一位负责人称，“分享附加值是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点，并非拉克塔利斯集团的基因。”

“每一年，拉克塔利斯集团的决策者只会通知我们已经订好的价位，我们没有说话的权利。”一位农户抱怨，“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中世纪模式的奴役。”

并非只有农户们手足无措，一些合作伙伴也不得不迫于压力对其低头。勒克莱尔超市是法国最大的营销企业之一，在欧洲拥有738家分店。拉克塔利斯集团曾一度不满意勒克莱尔超市对其奶制品价格上调指手画脚，而决定不再为这家连锁超市供货。当众所周知的品牌，如Président、Bridel、Lactel、Roquefort Sociét等从货架上消失的时候，勒克莱尔超市不得不屈服于拉克塔利斯集团的实力。

“拉克塔利斯拥有庞大而惊人的权力，我不能与他们争执，否则非常危险。我们超市一半

的奶酪架和几乎所有的牛奶架将是空的。”一位超市负责人如此回忆。

潜伏沙门氏菌的食品厂

此次爆发沙门氏菌感染的所有产品，均来自拉克塔利斯集团在克隆市的工厂。这家工厂此前为另一家奶制品企业“喜丽雅”（Celia）拥有。2005年，喜丽雅因爆发婴幼儿感染沙门氏菌而一蹶不振，次年被拉克塔利斯收购。在对克隆工厂进行调查取样分析后，负责监测的法国巴斯特研究院细菌学家Simon Hello向法新社透露，爆发于2005年和2017年的两种沙门氏菌极其相近。“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我们将会证实，2017年的菌源来自于2005年。”

可以设想，拉克塔利斯集团于2006年收购喜丽雅的工厂后，并没有彻底消灭车间内存在的沙门氏菌隐患。那么12年间，这家工厂的奶制品是否导致了其他婴幼儿受害者？或者，这些沙门氏菌经过长达12年的“睡眠期”之后才爆发？

现在，拉克塔利斯集团受到“过失伤害”“威胁他人生命”和“欺诈”等罪名的指控，正在接受

巴黎检察院的司法调查。民间的抵制也在蔓延。去年3月，刚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法国籍奥斯卡影后玛丽昂·歌迪亚，鼓励她的粉丝们集体抵制这个道德沦丧的品牌。“在拉克塔利斯发生的完完全全的丑闻，非常荒唐。这些人不配有孩子！”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更为关键的是，所有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婴幼儿奶粉和食品是否已经从市场上召回？作为受害者代表的古耶曼告诉《凤凰周刊》，最近他与几位部长面对面会谈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有83个国家在销售这些奶制品。拉克塔利斯集团有众多的品牌，在外国，有的是以其他品牌销售的。所以到现在，谁都不清楚具体情况。不少国家的卫生部门甚至不知道市场上销售的品牌中，哪些涉及到沙门氏菌污染。”

这些国家中，中国亦是其中一个市场。早在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就造成了6名婴儿死亡，近30万婴儿身体不适，引起了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从此，海淘代购奶粉成为了婴幼儿口粮的主要来源。

此次“问题奶粉”事件刚一爆发，中国火速

暂停了拉克塔利斯集团旗下涉事婴幼儿配方奶粉工厂在华注册资格。该集团之后发出声明，称公司将预警性召回在华销售的喜丽雅品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目前暂涉及6个具体批次，共3208箱。这也是继四年前恒天然肉毒杆菌乌龙后，涉及国际知名乳企的最大一起召回。

古耶曼则呼吁法国政府能够采取果断行动。“事件各方都应承担责任，但我们好像面对着一片无人区。发生了违法行为，但没有人受到惩罚。”^②

（作者系法国《国际邮报》记者）

军情

“白嘴鸦”坠落：叙利亚危局下的惨案

特约撰稿 / 田聿 科京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月5日下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向此前在叙利亚阵亡的苏-25强击机飞行员菲利波夫少校追授“俄罗斯英雄”称号。他还说，俄国防部给予菲利波夫亲属最大限度的慰问，并将全力支持他们今后的生活。

两天前，34岁的菲利波夫驾机在叙西北部伊德里卜省“冲突降级区”执行停火监视任务时，突遭地面火力袭击，他跳伞后力战不支，引爆手榴弹自尽。

妥协下的“冲突降级区”

为何如火如荼的叙利亚战场有“冲突降级区”和停火协议？这归因于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化，以至于让那里充斥着“代理人战争”的味

道。

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东岸和北岸几乎被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占据，北部一小片由土耳其扶植的叙自由军控制，西北部的伊德里卜山区和中部的霍姆斯台地是当前战况最激烈的地区，俄方支持的叙政府军主力正与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的“沙姆自由运动”、“征服阵线”交火。

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也不太平，盘踞在那里的“伊斯兰军”拉赫曼旅和深水旅不时对大马士革发起袭击，他们的背后有欧美势力的影子，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通过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偷运进来。

出于各方利益考虑，“冲突降级区”是相互妥协下的“次优方案”——它设在伊德里卜、霍姆斯、大马士革郊区和南部德拉、苏韦达地区，在其周边划定安全线、设立检查站，防止冲突发生。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作为担保国，可以派兵监督区内停火执行情况，不过被认定为极端组织的势力不得在区内活动。

从效果看，“冲突降级区”限制了叙利亚反对派的战斗行为，但也为其提供了便利。在遭到政府军攻击时，他们换上平民服装就能进入

降级区躲避，也能通过降级区走私武器和粮食、增强实力。叙政府多次抱怨俄土伊三国监督不力，致使“冲突降级区”沦为反对派的根据地。为此，驻叙俄空天军部队集群加强巡逻力度，这次的苏-25就是在低空监督降级区内的反对派动向时被击落的。

据俄罗斯《红星报》披露，出事当天，菲利波夫驾驶绰号“白嘴鸦”的苏-25从赫米梅姆联合基地起飞，在伊德里斯省萨拉基比市“冲突降级区”上空执行核查任务，突遭敌人用肩扛式导弹伏击，导弹击中飞机的尾部，导致右侧发动机起火。菲利波夫立即向司令部报告遇袭情况和方位，并试图驾机盘旋脱离危险区。遗憾的是，机上火势迅速蔓延，判明飞机无法控制后跳伞。

菲利波夫落地后用无线电台发出求救信号并寻找隐蔽，但敌人跟随着降落伞下落的踪迹，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试图活捉他。菲利波夫躲在一片石头后面用随身携带的斯捷奇金自动手枪抵抗，打光一个半弹匣后，他眼见突围无望，遂拉响手榴弹自尽。

被认定为极端组织的“征服阵线”从菲利波

夫遗体上找到钱包、诺基亚手机和个人证件等物品。一开始，有人说菲利波夫是从克里米亚投奔俄罗斯的乌克兰籍飞行员，俄国防部立即予以驳斥，详细罗列了这位英雄的生平：罗曼·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少校，2007年毕业于克拉斯诺达尔高级军事航空学校，分配到远东军区（今东部军区）的强击航空兵部队，从飞行员成长为副中队长。

2013年俄罗斯“航空飞镖”大赛上，当时还是大尉的菲利波夫率领双机编队夺得亚军，是俄空军最精通苏-25飞行和攻击的专家之一。折翼之前，他已在叙利亚飞行了近一年，数十次执行轰炸和为人道主义运输车队护航任务。

菲利波夫驾驶的“白嘴鸦”战术编号蓝色06，机号RF-95486，隶属驻克里米亚的俄空军第37混成航空兵团。作为苏联解体前投产的最后一型低空攻击机，苏-25具有较强的防护能力，驾驶员坐在有钛合金装甲防护的装甲座舱里，尾部两台发动机间距较大，防止被一发弹药同时摧毁。不过，由于此次行动在“冲突降级区”内，菲利波夫可能未料遭遇导弹攻击。当敌人从飞机正后方发射导弹，位于盲区内的他没

有察觉。从“征服阵线”公布的视频来看，苏-25既未发射红外干扰弹，也没有进行任何机动摆脱导弹的意图。

大国竞争的“牺牲品”？

俄国防部2月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方情报部门与土耳其方面合作，已将菲利波夫的尸体运回国内，于8日在家乡沃罗涅日市举行葬礼。

菲利波夫阵亡后，俄军强烈谴责叙武装派别在“冲突降级区”内的无耻偷袭行径，同时展开报复行动——俄海军的11356R型护卫舰从地中海向坠机附近的“征服阵线”营地发射三枚“口径-NK”巡航导弹，据称打死反对派30多人。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沙马诺夫说，在伊德里斯卜，有1000多名美国雇佣军和军事顾问，正是这些人教会了恐怖分子如何使用肩扛式导弹。

目前，俄专家分析击落苏-25的导弹可能是俄制9K34“箭-3”或美制“毒刺”导弹，这些导弹是国际市场的大路货，包括诸多中东国家在内的买家众多，合法或者非法的转卖出手的情况也是数不胜数。沙马诺夫痛斥，走私给反对派

的先进武器，总有一天也会落到美国或土耳其人的头上。

不过，土耳其和美国则立刻撇清关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土耳其军方分别发表声明称与“白嘴鸦坠落”无关。考虑到土耳其入叙作战，进攻阿夫林州的库尔德武装受挫，而俄方一直和库尔德眉来眼去，土方暗中“放水”让“征服阵线”教训一下俄罗斯确有可能。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向来赞助叙反对派大批美制武器（甚至有不少默许流入极端组织手里），近年来更出现转手让盟国提供俄制武器的倾向，这让俄罗斯“有苦说不出”。

俄罗斯《技术与武器》杂志披露，美国利用俄罗斯急需军火出口创汇的机会，利用亲美国家秘密购买俄制武器，尔后，转给对抗俄军的叙反对派，达成“以俄制俄”的效果。2月4日，土耳其还破获一起叙自由军向库尔德人走私武器的大案，缴获俄制“巴松管”反坦克导弹8枚，这些武器能对土军坦克造成严重危险。事实上，叙境内军阀混战，“私相授受”的情况使得防武器扩散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2018年2月3日，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当地反对派成员拍摄到一架被击落的苏-25战斗机。当天，由俄罗斯飞行员菲利波夫驾驶的这架战斗机在萨拉基比市“冲突降级区”上空执行核查任务时，突遭敌人用肩扛式导弹伏击，菲利波夫最终不幸遇难。

叙利亚政府的心态则有些微妙。叙政府一直渴望俄罗斯协助其收复全境，但俄罗斯奉行“有限战争”策略，边打边谈，还与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甚至美国“有事好商量”，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颇为不悦。2017年12月，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主力撤离叙利亚，驻叙俄军主力退缩到赫梅米姆基地，飞机数量只有过去的一半。本次被击落的苏-25是单独行动，没有

空中支援和策应，也是俄兵力捉襟见肘的鲜明写照。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俄军支援，叙政府军的攻击力度也大打折扣。

菲利波夫事件是去年12月31日赫梅米姆基地遇袭后，驻叙俄军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俄罗斯是继续加速从叙撤退，还是触底反弹增兵反击？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动静。但大部分俄媒呼吁，伊德里卜“冲突降级区”的事故实际上应由土耳其负责，普京一方面得给“征服阵线”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也要给放纵“征服阵线”的土耳其一点颜色看看。俄罗斯《生意人报》认为，跟土耳其作对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将会“越战越强”，个中奥妙，恐怕安卡拉会“心知肚明”。●

城市观察

简州新城的梦想和未来

记者 / 闵云霄



成都“东进”，跨越龙泉山，一个崭新的城区——“东成都”正在崛起。简州新城作为“东成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国内外资本逐鹿的热土，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谋划在简州新城占有一席之地——就像当年的上海浦东新区。

2017年11月24日，简州新城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引进涵盖新经济、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的15个重大项目，其中5个新经济产业项目协议投资约95亿元。

3个月前，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现身

成都，宣布三大项目落地简州新城。从7月派人考察，到9月签约，短短2个月，投资总额达300亿元的项目就落户简州新城。

《凤凰周刊》记者获悉，目前简州新城共引进重大产业项目9个、协议总投资800亿元，跟踪洽谈一汽红旗小镇等重大项目30个、总投资1000亿元。

简州新城是成都“东进”战略的重要一子，一开始就“高点起步、高标建设”，未来，必然成为助推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根据成都市委的决策部署，简州新城由龙泉驿区（成都经开区）委托管理，2017年12月15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委书记、成都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简州新城党工委书记何勋在龙泉驿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提出：要着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推进成都经开区和简州新城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加快建设一汽红旗小镇、神龙小镇和吉利小镇，打造特质鲜明、分工协作、配套完善、要素可及、环境优美、底蕴深厚的特色汽车小镇，加快构建以“一区一城三镇”为主要单元、共生共享共赢的汽车产业生态圈。

成都“东进”：释放新机遇

沿着成简快速通道，穿越龙泉山隧道，就抵达养马镇。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一块新的门牌低调地挂了出来，它就是简州新城管理委员会。

作为西部的龙头城市，成都近年来因经济快速发展引起全国关注，被列为“新一线城市”榜首，但是一直受制于大山阻隔，对外开放步伐大受影响。最重要的是，截至2016年底，成都人口已达2030万，三个圈层的经济结构和环形交通组织方式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实质是城市空间规模产业结构失衡、生产生活生态布局不均所致。”

自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后，着眼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重塑城市经济地理，成都市委提出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十字方针。

“东进”，是成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开辟永续发展空间战略选择。简州新城是成都实施“东进”战略、开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主战场”规划的四大新城（简州新城、简阳新城、

空港新城、淮州新城）之一。2017年 7月5日，简州新城管理委员会筹备组正式成立，设立规划建设局、产业发展局、财税金融与国资管理局、地方事务局等职能部门，从龙泉驿抽调18名、简阳抽调4名“精兵强将”。

从中不难看出简州新城的“雄心”。担任筹备组组长的陈茂禄，是原成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而他曾在龙泉驿区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担任规划建设局临时负责人的唐剑波，毕业于清华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是原龙泉驿区规划管理局总规划师。

2017年8月12日，四川省委编委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成都简州新城等4个管委会（党工委），此次设立4个管理机构，是省委、省政府支持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举措。《凤凰周刊》记者获悉，专业机构设立后，将着力实现跨越龙泉山脉“东进”发展。

虽然简州新城诞生才5个多月，但是养马镇、石盘镇、周家乡、灵仙乡4个乡镇却在悄然发生变化，道路两侧换上了“成都东进，简州崛起”的标语，覆盖原成资工业发展、石盘工业园的100平方公里区域正演绎着“筑城、兴业”的协

奏曲。

“以城兴产”：建设新城区

作为成都“东进”战略的重要举措，从简州新城公布的规划来看，简州新城规划223平方公里，建设面积100平方公里，起步区38平方公里。明确了“成渝走廊新支点、成都东进服务新中心”的战略定位，聚力发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及其相关智能制造产业，切实做到谋定而后动，战略、方略、策略有机融合，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产业定位内在统一。

简州新城的定位是“一区三城”，一区就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示范区”，三城是指：魅力山水生态城、先进汽车制造城、美好生活宜居城。成都市对简州新城提出了“一年成势，三年成型，五年成城”的要求，预计到2035年，简州新城将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化水平，涵盖50万人口的产业新城。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有产业，还要适合人居，形成聚人气、留人才、服务于人的城市功能。

“努力塑造一个能够留得住人的产业新

城”，简州新城管委会主任陈茂禄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简州新城提出“以城兴产”，将营城理念从“产、人、城”升级为“城、人、产”，将转变产业城镇发展模式，不仅是兴产，更要建城，为各类人才聚集打造宜居的城市环境，推动产业发展。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简州新城西接龙泉驿，东连简阳新城，北望淮州新城，南临空港新城，不仅是“东进”区域的地理中心，也是承接先进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

目前，简州新城区域内交通非常方便，目前已有3条高速、一条快速路、一条铁路。接下来，还将建设中成龙简、金简、淮简、蜀都大道东延线等多条市域快速路，连通其他3座新城，以及成都市区、天府新区和高新区。

《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简州新城目前已完成蜀都大道东延线初步选线方案，启动龙腾大道等多条干道建设。纵横交错的快速路，将使简州新城成为四通八达的产业新城。

目前，简州新城的规划由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遵循“一个产业类别就是一个主题城市社区”原则。相关负责人对《凤凰周刊》记者

表示，规划成果已通过市委全会审查，正进入法定程序。

市场化运作：聚集新项目

按照“先公建后产业”原则，简州新城超前储备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有侧重地配套商务办公、展览交流、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设施。《凤凰周刊》记者获悉，目前简州新城已经储备了综合医院、国际学校在内的40余个功能项目。

简州新城启动以来，探索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新城运营模式，积极搭建四大平台，以精准高效的体制机制服务投资促进。管委会设置“五局一办”，已完成内部竞聘，实行大部制、员额制、扁平化管理，深化财税、行政审批等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2017年8月11日，简州新城管委会与中国交建西南区域总部、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聚焦“前端”高点策划、聚焦“中端”高水平建设、聚焦“后端”高标准运营，打造“城、房、产、基、金”产业

链、生态圈。

“此次合作的目的在于，通过搭建新城综合运营开发公司这一平台，探索采取PPP模式，提前启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切实把新城产业立起来、人气聚起来”，简州新城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而“谋篇布局起好步”对于这个几乎是“在白纸上作画”的新城来说至关重要。与优质产业发展相生相伴的必将是大量产业人才聚集新城。因此，简州新城的思路为先筑“好巢”，引来高端人才，优化产业发展。

在产业方面，根据《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简州新城的产业定位为发展新能源和智能汽车以及与之相关的智能制造产业，建设中国智联新能源汽车生态示范区，力争到2022年实现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年产值500亿元，相关智能制造产业年产值100亿元，初步形成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圈。

2017年9月14日，成都简州新城管委会与吉利控股集团签署总投资300亿元的三大项目合作协议，包括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项目、吉利铭泰汽车文化小镇、吉利零部件产业园等。其

中，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按照在校生规模25000人进行建设；吉利铭泰小镇将建大型汽车乐园和大型场地赛道等；零部件产业园主要建设年产40万台发动机、年产60万台7DCT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政府还与中国一汽签署“关于在蓉产业发展项目合作备忘录”，红旗小镇项目纳入产业合作重要内容，简州新城和一汽战略规划部已组建工作团队，加快编制概念性规划与落地方案，力争2018年项目落地，建设红旗整车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心，红旗汽车展示体验中心、智能网联示范体验中心、红旗创新创业中心、红旗汽车主题公园。

龙泉山以东区域已经成投资“沃土”，新兴产业入驻、与空港新城等多个产城相融的功能板块联动，“东进”无疑给百端待举的简州新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活力，简州将学习新思想、拥抱新时代、谱写新篇章，建设践行新理念的未来之城、以人民为中心的成都东部新城。●

从制造到智造：让每个城市都有“龙泉造”

记者 / 闵云霄

中国每个城市，都有“龙泉造”汽车。这不是梦想，已经成为现实。没有“龙泉造”汽车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没有通公路的乡村。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目前已聚集一汽大众、一汽丰田、沃尔沃、吉利汽车、东风神龙等12家整车制造企业，零部件企业300多家，其中世界500强67家、上市公司57家，成功跻身全国汽车产业第二方阵前列。整车产量连续两年破百万，汽车零部件则行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龙泉造”正以惊人的速度抵达你的身边。

汽车产业已成为龙泉驿的“名片”、龙泉驿人的“骄傲”。在成都如火如荼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汽车产业已成为重要的支撑产业，在工业空间布局上，以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为主体，打造“大车都”板块，推动该区域从全

国汽车第二方阵向第一方阵挺进。

近年来，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汽车产业围绕建设中国大车都，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发展汽车主导产业，初步建成了以乘用车、商用车制造为龙头，汽车关键总成、核心零部件配套为重点，汽车创意设计、汽车研发检测、贸易博览为核心，汽车生产生活为支撑的现代汽车产业体系。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汽车产业未来的计划是：加快提升汽车产业的“层级”，实现“汽车制造”向“汽车智造”转变，着力构建汽车产业生态圈，推动汽车产业奔向高端。奋力建设“先进汽车智造区、美好生活品质城”。



重新定义“智能制造”

围绕提升城市竞争力，成都聚焦汽车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环节，进一步提升产业配套率，加速行业聚合力，加快构建汽车产业生态圈，努力在新一轮转型发展中抢占先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企业、龙头企业、零部件企业等落户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成都汽车产业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将更加完善，汽车制造业正强势崛起。

在神龙汽车成都工厂的车间里，一台台新车快速下线。“我们现在的日均发车量已经超过千辆，常常是车刚刚下线就被发货运输车迅速运到全国网点。”神龙汽车成都工厂党委书记吴

政介绍，2014年10月16日，神龙汽车成都工厂举行奠基仪式。2015年10月，“白车身”下线。2015年11月底，首台东风标致SUV整车样车也正式下线。

这样的建设速度，让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也颇为震惊。标致雪铁龙集团监事会主席加洛瓦感叹道，“这是成都奇迹。”

神龙汽车内部有句话：“晚一天投产，亏损3000万”。账是这么算的：作为成都经开区北拓区的首个项目，它一旦在2016年底建成投产，将贡献36万辆的产能，差不多每天有1000辆车下线，晚一天，利润损失就是3000万元。

神龙成都工厂投产一年以来，东风标致4008、东风标致5008、东风雪铁龙SUV天逸C5Aircross三款“龙泉造”车型已有50000辆入库并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神龙汽车成都工厂月产量达11200辆，最高日订单达1725辆。可容纳7500辆新车的成都工厂停车库，空空荡荡，因为刚下线的新车一入库，就被发货运输车运走。

自动化、智能化、环保化工艺……神龙汽

车成都工厂直接被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定义为“全球新一代标杆工厂”，成为率先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推进汽车制造技术升级与转型换代的新标杆。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汽车产业投资服务局投资服务处处长谢兴云告诉记者，在加快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成都经开区还不断引进智能制造高端项目，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记者获悉，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放量，位于成都经开区的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也正在加紧推进工厂的二期建设，占地500亩的二期新厂区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计划今年2月开始搭建厂房，并同步引入全新的生产线设计和工艺布局，预计2018年6月底投产使用，届时该企业的年产能将达到2.5万辆，将更好地满足市场供应。

中植一客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新动能，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敏锐地意识到，当前，全国的汽车产业进入转型升级、由大变强的战略机遇期，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抢占发展先机、实现赶

超跨越的战略突破口，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增长板块。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21年，在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重大突破，“五基地”建设成效明显，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汽车产业生态圈基本建成。到2035年，先进汽车产业形成规模，绿色智能成为主流，汽车产业生态圈全面构建，局部领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智慧城市初步建成，城市功能设施更加完善，创新创业成为主动力，生态宜居特质全国知名，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称，作为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汽车产业将成为重中之重。成都希望能够重新定义汽车行业和智能制造，打造出一个先进汽车及智能制造产业园。从制造到智造，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正向“先进汽车智造区”发起冲刺。

千亿产业集群核心区

2017年9月14日，成都简州新城管委会与吉利控股集团签署总投资300亿元的三大项目合作协议，包括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项目、吉利

铭泰汽车文化小镇、吉利新能源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其中，吉利铭泰小镇将建大型汽车乐园和大型场地赛道、美式椭圆赛道、汽车越野赛道；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主要建设年产40万台发动机、年产60万台7DCT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按照在校生规模25000人进行基本建设。

这是成都汽车制造史上的重要一笔。谢兴云告诉记者，“成都发展汽车产业的历史并不算太长，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汽车产业发展起步于2006年，整车产量从2008年的1.56万辆到2016年的111.6万辆，9年时间增长了70倍。2017年1—9月整车产量91.6万辆，产值1021.9亿元……”

20年前，成都的汽车产业还是一穷二白；20年后，再度谈及，它已不知不觉成为全国汽车保有量第二大城市，不可忽略。作为西部的一个重要窗口，它的发展趋势和着重点成为我们观察西部的一个关键点。

据悉，面积仅占成都3.82%的龙泉驿，经济总量占比却达到8.6%，并成为四川区（市）

县GDP千亿俱乐部首位成员。

产业，是一座城市发展最根本的支撑。车轮上的成都，连续三年迈上三个千亿台阶：2012年汽车产业链主营业务收入破千亿元，2013年汽车制造业过千亿元，2014年整车制造业过千亿元。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是成都汽车产业布局的主战场，从2011年造车15万辆到2014年90.5万辆，连年倍增，培育出全省成长最快的千亿特色优势产业，也成为了全国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基地。

据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统计局数据，2016年“龙泉造”整车产量首次突破110万辆大关，达到111.6万辆；汽车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519.6亿元，其中整车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16亿元。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整车与零部件规模比例一般都在1:2以上，而我们仅为1:0.2，还有较大差距。”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世界级汽车城，一方面要加大对整车企业的引进力度，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零部件配套的巨大潜力，甚至后者蕴含着一个新的千亿产业机会。与此同时，发展新能源汽车是

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的目标是，到2021年新能源整车产能达50万辆、产量达40万辆。智能网联汽车是决定未来经济的12大颠覆技术之一，将迅速形成万亿级美元的经济规模。成都经开区坚持“两着重”发展新能源汽车：着重促进现有整车企业加快导入新能源车型，着重跟踪引进一批国际知名、全国一流的新能源整车企业。

目前，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已经布局了一汽—大众配套园、兵装工业园以及神龙汽车配套园三大主体零部件配套园区，基本搭建起发动机、底盘、汽车电子、车身、新能源“三电系统”等五大系列的配套体系。全力推动整车制造扩量发展、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新能源汽车倍增发展、汽车服务业高端发展，努力成为全省打造6000亿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区域。

在2017年7月2日召开的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提出，力争到2020年整车产能突破300万辆，力争到2022年制造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50%以上，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市。作为成都市五大支柱产业之

一，汽车产业是重中之重。

“没想到成都拥有这么大一座汽车城，成都的发展也非常快，在中国处于汽车制造的前端。”英中贸易协会主席沙逊勋爵说，成都拥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带来了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同时，成都拥有非常好的招商政策和宜居的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兴业。❶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打造世界级“城市绿心”

记者 / 闵云霄



苍翠的龙泉山，原本是怀抱成都的一只臂膀，但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连接中心城区与东部城市新区的脊梁。

据最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成都将跨越龙泉山“东进”，未来城市格局将由原来的“两山夹一城”（龙门山、龙泉山、成都城市片区）转变为“一山连两翼”（龙泉山、中心城区、龙泉山东侧现代产业新城）。其中的“一山”即龙泉山。以龙泉山为界，西边为中心城区，东边则

塑造全新的东部产业新城，从而形成“双城”格局。

随着空间格局的变化，作为外围生态屏障的龙泉山脉将变成城市中央“绿心”。一座规划面积约1275平方公里的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这座公园将成为集“山地运动、山水度假、城市休闲”于一体的中国首个城市中央大型生态休闲公园。

作为成都“东进”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是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重要实践。连绵起伏的200余平方公里龙泉山脉，是龙泉驿人的生态本底，也是全成都人民的幸福靠山。

“世界级生态工程”

龙泉山之名起于明代，宋代随灵泉县（龙泉驿）称灵泉山，唐代称分栋山。龙泉驿地名与龙泉山山名息息相关，亦步亦趋，如影随行。

规划建设中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地处成都平原东缘龙泉山脉成都段，南北向绵延90公里，东西向跨度10公里-12公里，北起金堂县、

南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西靠龙泉驿区、东临简阳市，包括以龙泉山为主体，以沱江小三峡、三岔湖、龙泉湖、丹景山等为代表的龙泉山生态区域，涉及金堂县、青白江区、龙泉驿区、简阳市、高新东区、天府新区六个行政区，38个乡镇（街道）268个村（社区）。

“由于涉及的区域比较多，需要多方精密合作”，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规划局规划编制管理科科长许霄逍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通过前期深入调研，摸清城市森林公园范围内15大类80余项基础数据基础上，会同相关编制单位，聚焦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着眼建设“碧水蓝天、森林环绕、绿树成荫”的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龙泉山披着黛青色的连衣裙，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凝视。2017年11月25日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相关负责人对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龙泉段)规划建设工作进行实地调研时强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建设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世界级生态工程，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按照成都市委“对标、融合、精准”的要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以“世界眼光、国内一流、成都特色”为标准，以“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为指导原则，编制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从空间布局上来看，成都规划了“一环串联、三片整合、四核驱动、多点支撑、全域发展”的格局。

所谓“一环串联”，即通过构建龙泉山环山公路，配套建设旅游驿站、观景平台、自驾车服务体系和旅游导览系统等，提升环线沿途生态环境和景观质量，将其打造成集快速通道、风景道、自驾线、产业带于一体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旅游交通纽带以及龙泉山旅游形象展示窗口。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旅游专项规划》（初稿）已编制出炉。规划显示，依托龙泉山的资源条件和地形地貌，结合区域旅游发展现状和特色，根据未来规划发展方向，此次规划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划分成三个不同的特色主题旅游片区，分别是北部的天府云顶，中部的天府原乡，以及南部的天府山水。最终打造

成为集“山地运动、山水度假、城市休闲”于一体的中国首个城市中央大型生态休闲公园、国际知名的全景山地休闲旅游目的地，向世界展示成都的“国际范”。

掀开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内旅游产品的神秘“面纱”，一大拨重点项目规划也初现端倪。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内，将涌现出一批特色小镇。规划显示，将策划梨花小镇、国际诗意田园小镇、国际康养运动小镇、洛带国际文创旅游小镇、五凤溪慢活小镇、汽车文化主题小镇、桃花驿站小镇、国际滨湖旅游度假小镇、巴蜀时光小镇、国际颐养小镇等10个主题小镇。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相关负责人强调，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把握机遇，高水平规划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龙泉段)，发挥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城市绿心”和“东进”桥头堡作用，带动“东进”区域整体成势。

该区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治理，出台“治霾十条”铁腕治霾、“治水十条”重拳治水、“治堵十条”治堵减霾、“全域增绿”普惠绿色

福利。持续巩固环境治理成果，通过创新构建区、镇、村三级网格化监督管理体系、落实“河长制”等，实现环境保护责任到人，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生活环境更宜居。

根据规划，到2020年，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初步建成，山体森林覆盖率达到68%，提升7个百分点，形成“大规模绿化全川”的示范区。到2030年，全面建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城市森林公园。

《凤凰周刊》记者获悉，在重点旅游产品打造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将优先打造大云顶康养生态度假区、五洛文创休闲旅游带、天府生态博览园、国际IP主题乐园四个引擎旅游项目，铸造龙泉山的核心旅游品牌力量，引爆游客市场。

做足“山”的文章

“在规划中，还充分凸显龙泉山特色，规划沿龙泉山山脉设置健身步道，形成南北向的山水风光健身步道”，许霄逍介绍说，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将会有一条环状旅游交通道路串联各景区，两条东西向的景观廊道连接。同时，

规划依托景观条件突出的道路，提升沿路景观效果，配套服务设施，打造自驾车道体系，游客可以自驾欣赏到沱江峡谷风景道、山花原乡风景道、湖光山色风景道等三类主题风情体验。

作为“城市绿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之于成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做足‘山’的文章，利用龙泉山的独特优势，严控沿山区域开发，打造望山轴线、观景平台、靓山灯带，形成独具魅力的显山、望山、靓山、坐山观城的城市景观。要塑好生态格局，加快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花海林麓段和湖光山色段建设，推进锦城绿道和中央生态活力芯建设，构建‘H’形生态本底，依托主要河流、道路、绿地构建‘15径15脉’的城市生态脉络，形成‘3大生态区、3级绿道、8大城市公园、15处小游园、100处微绿地’的五级绿化体系，着力构筑生态宜人的绿色家园。”

在所涉区（市）县，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工作如火如荼，生态恢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登山步道、游园、河流串联

其间，部分主题公园建设已初具雏形，一个宏大的“城市绿心”规划图景正在逐渐移步现实。

对于重大项目的引进，也在不断落地落实。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坚持以提档升级一批、包装策划一批、争取签约一批“三个一批”为抓手，启动实施了5个生态提升项目、10个景观提升项目、9个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初步包装策划了天府植物园、古驿茶店等生态产业、历史人文项目。

“下一步，还将以城市森林公园环山景观大道和绿道建设为引领，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城市森林公园范围内道路、市政配套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将持续推进增绿、增景工作，协同相关市级部门，研究制定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建设2018年行动方案。”该负责人介绍。 ●

龙泉驿：建设天府绿道 重现《蜀川胜概图》

记者 / 闵云霄



湖水旖旎，田园金黄。天鹅湖畔，有老人执竿垂钓，有稚子追逐嬉闹。更多的人，则在锦城绿道悠闲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闲暇时光。

作为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坐落在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的环城生态区天鹅湖示范段，即将修建成为天府绿道首期工程中的锦城绿道段。既有花又有田的天鹅湖公园又被称为“花田湿地”，它南起成龙立交、北至驿都大道，占地总面积1366亩。本着“基本农田保护、生态湿地示范、农耕文化体验”的功能定位，天

鹅湖环城生态区在规划设计上充分保持了原生生态环境，利用现有的农田、塘堰、沟渠，连塘成湖、连花成片、连禾成景。这样一来，市民漫步绿道便可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田园之美。

天府绿道是近年来成都市最大规模的绿道规划方案，也是一项惠民的重大工程，旨在让市民享受更多的绿色福祉。《凤凰周刊》记者获悉，成都全域将形成“一轴两山三环七道”的区域级绿道1920公里，以及城区级绿道5000公里以上、社区级绿道1万公里以上。

“漫游田园、望山俯水”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建设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按照“可进入、可参与、景观化、景区化”的规划理念，天府绿道将构建区域、城区、社区三级绿道网络体系。城区级绿道在城市各组团内部成网，与区域级绿道衔接；社区级绿道是与城区级绿道相衔接，串联社区内幼儿园、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健身场馆、社区养老等设施，体现“绿满蓉城”的宜居品质。

截至记者发稿前，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已开工建设青龙湖景区、天鹅湖示范段和玉石示范段共计6.01平方公里区域，预计建成绿道(骑游道、步道)共计30公里，优化了城市功能，促进了绿色出行。下一步，将围绕“漫游田园、融入都市、拥抱森林、望山俯水”的绿道规划建设总体目标，打造体现龙泉驿特色的城市绿道。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将继续按照“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要求，从时间上、空间上、标准上、管理上精准实施“森林绿道、湿地绿道、滨河绿道、车城绿道、环山绿道、古驿绿道、休闲绿道、滨水绿道、花果绿道、田园绿道”十大绿道，规划建设城市绿道1000公里，力争到2021年新建成城市绿道500公里。目前已启动驿马河公园、星光路和航天南北路等绿道示范段建设，新开工建设城市绿道100公里。

“规划建设天府绿道，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重大实践，是筑巢引凤的重大支撑工程，是城市绿色发展的靓丽名片，是重大的惠民工程，也是推进‘东进’‘中优’战略落地落实的生态建设

示范工程”，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建设系统化、多元化、特色化、品质化的绿道体系，让城市形态更美丽、环境更宜人、交通更绿色、魅力更彰显。

重现《蜀川胜概图》

“目前，在全世界的城市中，就市域级别的绿道而言，天府绿道是最长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景观院总建筑师、副院长张静说。

按照《成都市天府绿道规划方案》初稿，“天府绿道”以“一轴两山三环七道”为主体骨架将在全市铺开绿网，全面构建天府绿道体系。这个“庞大”的绿道系统，2025年将初步建成1920公里市域主干绿道体系，到2040年，市域绿道体系将全面成网。绿道建成后，将形成133平方公里生态公园、20平方公里生态水系、24平方公里城市森林、8条一级通风廊道，保护35.2平方公里基本农田，辐射周边千亿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

“天府绿道，为成都营造一个开放空间，一个具有传承性的天府公园，打造新时代的《蜀川胜概图》。它的设计借鉴了波士顿、新加坡

的优秀案例。”张静表示。

《蜀川胜概图》是宋代著名绘画艺术珍品，相传为北宋画家李公麟的名作，最为乾隆所欣赏，列“乾隆四美”之一。画卷所绘内容为宋代川峡四路（今四川、重庆）的著名山岳、河流、城池风貌，且对宋代的地理名称有详细标注。

将来，坐落在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花田湿地”所在的天府绿道将会与白鹭湾、青龙湖连成一条线。“花田湿地”，一定会有一番别样的风景。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也正努力为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贡献龙泉力量。🌱

财经线

虚拟货币全球监管风暴

记者 / 胡越

“比特币不是货币。一种价格日均波动达到25%的东西是不能用来支付工资的。因此，它就是一种基于误解的投机。”

在1月份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投资大鳄索罗斯表明了自己对于比特币的态度，当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是否持有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

其实，不仅是索罗斯，随着2017年12月底比特币冲上历史高位后又快速回落，引发全球虚拟货币投机泡沫以来，各大监管机构和投资机构都对虚拟货币的规范和前景密集地表达了关切。

一面是不断涌入、遍布全球的疯狂炒家和创业者，一面是主流舆论对泡沫破灭的担忧。两个世界的割裂如此明显，以至于有“币圈一天，世界一年”的说法，但是随着泡沫散去、监

管收紧，这两条看似平行的线条终将交汇，虚拟货币也不得不回到现实，迎接全球吹来的监管风暴。

走，“出海”去

“根据我们的监测，目前全球有大约1500种数字货币。”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吴震教授告诉《凤凰周刊》。而在2017年5月，全球有交易的数字货币还只有700种。

如此种类繁多的数字货币，每天在全球各大交易所上演着财富游戏，而各国之间的监管步调并不一致，这就给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发行企业和炒家们在全球范围内施展乾坤大挪移的空间。

从全球虚拟货币几大交易所的注册地和总部位置，就可以窥探出各国对于虚拟货币的态度。2017年7月，中国贵阳还推出了国内首个“区块链ICO沙盒计划”，在保证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对沙盒内的ICO项目实施有限豁免或有限授权，允许ICO项目开展测试活动而不需要担心监管后果。但是到了9月份，随着数字货币和

ICO的乱象愈演愈烈，中国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文，宣布整治境内ICO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国内的几大主流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纷纷转移至境外。火币网和OKCoin就是在那时将站点转移到了海外，或者与海外公司展开合作。到2018年1月底，比特币中国也宣布被香港某区块链投资基金收购。

ICO（是Initial Coin Offering缩写），即首次币发行，是源自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概念，是区块链项目首次发行代币，是募集比特币、解决以太坊等通用数字货币的行为。

即使是选择“出海”，也未必能让中国监管部门放心。1月上旬流出的一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简报（第53期）》中，特别强调了对平台“出海”和场外交易的整治。简报中提到，对采取所谓“出海”形式继续为国内用户提供虚拟货币投机炒作服务网站平台的、为国内用户提供虚拟货币集中交易服务的境外网站平台、为“出海”或“场外”平台提供支付服务的和涉及资金出入境的相关“出海”平台，都需要有关部门坚决取缔查处。

2月1日下午，币安网宣布不再为中国大陆地区用户提供服务。正当大家纷纷猜测是否是被相关部门约谈或听到风声的时候，其创始人赵长鹏在朋友圈称：“不用猜测，没有消息。是嗅觉，也是尊重！”

靴子可能终将落地。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将对虚拟货币境外交易平台网站采取监管措施。次日，内地《财新网》进一步报道称，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监管措施陆续出台，部分网站已经被屏蔽。“中国目前采取的措施是理性的，只是执行起来会面临困难。”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数字货币监管多年的Rainer Böhme教授告诉《凤凰周刊》。

如此严格的管控，是否会伤害到一些需要融资的区块链项目呢？对此，吴震认为：“在目前ICO大规模涉嫌投机或诈骗的背景下，ICO这种方式在整体上被否定了，政策必须一视同仁。优质的区块链项目技术上可以区分，但无法保证商业上的成功。建议优质区块链项目可以通过其他合法方式获得融资，不需要仅依赖于ICO。”

谁唱红脸，谁唱白脸

时至今日，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持完全肯定态度的已几乎没有，谨慎乐观、规避风险是各国监管的主基调。但是，由于部门分野，一国之内各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的态度也有可能不同，有时甚至给外界“朝令夕改”之感。

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和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地之一，其政策态度对于市场影响很大。在美国，涉及虚拟货币监管的部门有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国税局(IRS)、财政部，以及各州的金融服务署。而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在虚拟货币政策上被赋予了相当的自主权，这就造成各州之间的律令并不一致。

号称第一个在美国拿到牌照的虚拟货币企业Coinbase，目前已经在美38个州拿到了经营货币转账的执照，一向以鼓励创新闻名的纽约州更是给其发放了专门的虚拟货币牌照，类似的虚拟货币牌照还被发放给了Ripple、Circle、bitFlyer等公司。对于发放牌照，另一个较为激进的国家是日本，到2017年底，日本金融厅(FSA)已经发放了15张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牌

照，包括bitFlyer、QUOINE、BTCBOX、GMO等。

对于虚拟货币的一些衍生品创新，美国监管机构的态度也非一以贯之。得益于CFTC的放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17年12月推出比特币期货，但2018年1月份，CFTC就首次对三家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提起了诉讼，称其欺骗客户并违反了大宗商品交易的规则。SEC则多次驳回了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上市申请。SEC投资管理部主管布拉斯发表公开信，列举驳回原因，包括估值风险、流动性不足、套利风险、市场操控和欺诈风险等。

不仅是官方机构，民间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同样会成为虚拟货币市场的晴雨表。例如，高盛从2014年开始关注比特币，一直认为比特币的波动性太大且流动性不足，大规模应用仍有时日，但依然看好围绕比特币的一揽子金融服务。2017年12月，比特币价格下行以来，高盛连发警告，强调“比特币不是新黄金”“比特币出现泡沫”。

2月1日，Facebook宣布禁止在平台发布比

特币和ICO的广告，而就在三周以前，其创始人扎克伯格还在Facebook个人账户上发布了自己的2018年挑战，提到希望通过“加密技术和加密虚拟货币让人们从集权式技术系统中取得权力”。

公开唱衰的也不少。不止索罗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在2017年12月表示，目前价格高涨的比特币，没有金银等作为支撑，虽然能购买到产品和服务，但最终没有任何价值。2018年1月，“股神”沃伦·巴菲特在接受CNBC采访时也提到：“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虚拟货币不会有好下场，但什么时候发生、如何发生，我不知道。”

忧心忡忡，所为何事



2017年11月，韩国首尔，一位路人用手机拍摄大屏幕上的虚拟货币交易数据。

数字货币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究竟挑动了监管部门的哪根神经？

一是虚拟货币资产本身价格的巨大波动。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学者项目学者邹传伟的统计，从2011年1月1日到2018年1月18日之间，比特币价格的平均日波动率为10.88%，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年波动率为14.25%，也就是比特币价格一天的波动程度接近标普500指数一年的波动程度。

但是数字货币交易所并没有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审查，大部分交易所允许投资

者匿名，身份核查根本无从谈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监管要从交易实名制开始做起。

二是ICO的欺诈问题。2017年可以称为是ICO年，各种各样的ICO喷涌而出，令人眼花缭乱。根据Crypto Valley Association和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底，这一年全球已诞生430个ICO项目，共募集到46亿美金。而在2013年，ICO项目还仅有两个。

2017年9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加拿大PlexCorps发行的代币PlexCoin涉嫌非法融资，打响了ICO判例的第一枪。2018年1月底，美国证监会紧急叫停了总部位于达拉斯的AriseBank的ICO活动，据了解，这个号称已筹到6亿美元的项目，实际上可能只拿到了100多万美元。

实际生活中更多的ICO属于典型的“空气币”项目——没有任何实际产品作为支撑，凭借一个团队和一纸白皮书就开始进行代币融资，项目质量如何、何时会启动、如何进展，全都在黑箱中。很多缺乏辨别能力的投资者轻易相信了团队的宣传，将积蓄投入，最终血本无归。

三是交易所的安全问题。2014年，当时世

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Mt.Gox被黑客攻击，85万枚比特币被盗，损失达4.8亿美元，Mt.Gox就此破产。即使在近期，还发生了两起较大的盗窃事件，2017年12月13日，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之一的Bitfinex宣称，平台受到了“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导致该平台在12月12日关闭了交易服务。2018年1月，位于日本的Coincheck交易所价值5.3亿美元的虚拟货币被黑客盗取，这是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大的交易所失窃案，日本金融厅已就此开始对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安全性展开全面排查。

四是市场操纵问题。虽然数字货币打着去中心化的旗号，很多数字货币其实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这就意味着“庄家”们有能力去操纵市场价格，然后借机牟利。他们可以先将价格炒高，吸引散户涌入后再砸盘，或者利用期货等做空机制对冲盈利。

五是洗钱、走私、偷税漏税等灰色地带。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17年5月12日爆发的WannaCry勒索病毒事件，恶意加密用户文件向用户发起勒索，至少有99个国家的其他目标在同一时间遭到攻击，而勒索犯索要的赎金就是

比特币。数字货币的匿名性造成了执法部门无法有效对其进行追踪和监控，使其无可避免地成为犯罪的温床。2018年1月31日，韩国海关总署发布声明，指控了价值6375亿韩元(约合6亿美元)的非法外币交易，包括使用数字货币的未记录资本外流。

虽然面临着种种风险，但是各国监管机构是否敢于及时出手呢？2018年年初，韩国计划加强数字货币监管的风声刚刚传出，就有超过20万名韩国民众签署网上请愿书抗议管制，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

“谁都不想错失机遇，政府也一样。所以，要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即使这些政策是完全理性的。”Rainer Böhme如此说道。

市场能否回归理性

经历了2017年年底的泡沫，2018年必定是虚拟货币的监管大年。各国或多或少都开始收紧紧箍，或者至少对国内投资者发出了警告。在主要数字货币价格一路狂跌的背景下，不少散户和小型投资者已经开始割肉出局，而据经

济数据分析平台DataTrek追踪，到1月下旬，“比特币”的谷歌搜索指数已经从2017年12月的高点掉落了一半，这可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字货币热的逐步降温。

人们不禁要问，2018年，数字货币监管领域会发生哪些大事件？这个躁动不安的市场，能否最终回归理性？

首先，可以预期的是，ICO代币项目会遭遇一轮大洗牌。在1月末的EmTech China峰会上，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数字货币研究计划的主任Neha Narula就发表观点称，很多代币根本不应该诞生。而即使是拥有一定合理发行基础的代币，过分的投机炒作也已经扭曲了发行时的初衷。就如同PreAngel创始人、区块链投资人王利杰所比喻的，“当演唱会的门票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所有的粉丝都转化成了黄牛，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关注演唱会本身了。如果没有演唱会，那我们买的是什么呢？”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中韩两国明令禁止了ICO，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其有较为明确的管理，而欧盟、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瑞士、英国、泰国、墨西哥等都明确表示，未来要将

ICO纳入监管。

其次，全球在监管步调上会愈发统一，或者至少在地区间形成统一，否则一国的监管行为只会造成资金和数字货币平台外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风险控制问题。德法两国已经共同发起了在G20峰会讨论全球监管协调的倡议，多边协作机制在这一问题上必会发挥作用。

而各国央行会继续探索以较为中心化的方式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英国、爱沙尼亚、俄罗斯等都已跃跃欲试，委内瑞拉干脆在2017年宣布发行石油币，“每个石油币都将有一桶油支持。”早在2014年，中国央行就成立了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开始论证开发数字货币的可能性。近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陆媒《第一财经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央行如果发行数字货币，应当采取中心化的管理模式，通过代理投放的商业机构进行双层投放，主要目的是替代现实生活中的纸钞和硬币，而非已经实现电子化的货币。

最后，区块链作为数字货币的底层架构仍有发展潜力。目前，区块链技术已经进入3.0时代，可以超出金融领域，为各种行业提供去中

心化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区块链不是万能的，在某些领域并不比中心化应用有优越性，还面临着交易效率低、隐私保护差、监管跟不上、配套设施跟不上等问题。而且，作为激励的数字货币如果被打压，小企业和个人开发区块链应用的热情可能也会散去大半，最终可能仍要依靠有雄厚资金实力的政府和大企业来主导开发。

“比特币之父”中本聪曾经说过，“我很确定，如果20年后比特币没有消失的话，那一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比特币诞生已有9年，比特币不仅没有消失，还多了一群“兄弟姐妹”，但正是过度的繁荣吹大了泡沫，让整个数字货币家族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数字货币究竟只是投机，还是真正具有其内在价值，需要时间的试炼和系统的演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试图完全摆脱国家控制的货币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更是技术也无法掌控的，更多的人还是应该回归业务、回归价值本身，关注底层技术而非数字货币扬起的泡沫，那么人类的下一次飞跃式进步，犹可期也。❶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障碍与破题

特约撰稿 / 易习习



“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一提供者。”2018年1月15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作上述表示。他还称，中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此次国土部的表态引发媒体关注，评论普

遍认为此次或是说在土地市场上，会逐渐放开集体建设用地。

2月4日，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继续提出，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文件也提出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在妨碍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影响城乡平等发展的最重要制度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关键问题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能够与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入市之前

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同时根据该条，仅有三种例外，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可以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获得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同等权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被严格限制，现有集体建设土地要进入土地市场需要通过国家征收制度才能实现。

“这个制度很有问题。”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凤凰周刊》说。他认为，这个制度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引发腐败。土地领域历来堪称腐败的重灾区，土地领域腐败的形成，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紧密相连。2014年，在中央部署的三轮巡视后，21个省份中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业腐败，占比达95%；二是助推高房价。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必然导致高地价，而高地价必然导致高房价。在近几年房价高涨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一些地方超过50%。土地出让部门有意无意地调节土地供应节奏，开发商买地的价格越来越高，摆在开发商面前就只有上涨房价一条路，“大量农民工、大学生买不起房，只能群居在一起，产生很多隐患，社会治安和火灾事故频发，如2017年11月18日发生的大兴火灾事故”；三是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政府征收农民土地，付给农民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只相当于政府出让给开发商

出让费的十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农民对此当然有意见，前些年经常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

地方政府征收一亩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最高支付土地被征收前平均年产值的30倍。如果土地被征收前平均年产值为2000元，则每亩地征收款最多不会超过10万元，而政府转手将土地卖给开发商时出让费不是以亩计，而是以平方米计（1亩约等于667平方米），如果每平方米出让费为5000元，一亩地最少可卖300万元，相当于征收款的30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认为，国土部此次的说明针对的更多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宅基地。在农村，很多宅基地是闲置的，或粗放使用的，空心村、空壳村等情况大量存在。

根据《土地管理法》，宅基地一户只能申请一处，然后在该地块上建房，实行一户一宅、一宅一地，这样这块宅基地只供一户使用，这一户就在确定的一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其实是一种捆绑，因为有些时候宅基地在很偏远困苦的地方，水、

电、网络甚至道路都通不过去。”

孙宪忠表示，国土部之所以选择在当下释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信号，是因为中国农村土地权利法律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以前农民就在土地上耕作，利用土地耕作产生的收入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但目前中国农业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短板”，农民不断“带地入城”，农民收入增加也不再依靠农业，而在城乡一体共享发展的理念之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现行政策需要及时调整。

入市之变

事实上，在1998年修订、1999年实施《土地管理法》之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是被允许的。根据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的研究，当时一些地方政府在支持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前提下，积极探索规范、有序的管理办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苏州市、浙江湖州市就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福建漳州的7个县，山东的临沂、莱芜、烟台，还有陕西的8个县，也出台了类似办法。

然而，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的第四十三、四十四、六十三条等条款，却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让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情况急转直下，有学者评价“历史在这里倒退”。

与法律制度层面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不被允许相对的，是在政策层面上一直进行的探索，中共和政府的文件多次提出，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的办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在法律制度和政策有差别的情况下，尽管法律禁止，但地方政府主导的试点市场一直存在。2005年6月，广东省政府颁布了《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这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交易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实际上是把全省纳入试点。

全国范围的改革探索也在进行。2015年初，全国人大授权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2017年11月，此项改革试点期限延长一年至2018年12月31日。

孙宪忠向记者介绍，他曾到33个试点县之一的四川省泸县走访，他认为泸县的改革整体来讲还是成功的，入市改革效果初显，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规则体系。

对于33个试点县的试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院长陈小君对《凤凰周刊》表示，“我国有50多万个村，但针对‘三块地’改革只有33个试点县，这是什么比例？”

她认为，这种试点可以看作是“试验性立法”，试验性立法并没有完全站在法的逻辑的角度，只是说可以试一试，看看是什么结果，“试验性立法，我认为应当尊重事实、普适意义和科学性。因为试验性立法一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试后对了，可复制可推广；另一种是试错

了，公开问题或经验。对这样的试点在结论上不能似是而非，也不应刻意求全求美，一定要落地，要实事求是。”

入市破题

此次国土部的表态中提到，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2017年8月，国土部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厦门、武汉、合肥、郑州、广州、佛山、肇庆、沈阳、成都等13个城市将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比如北京市，截至2017年12月底，实现集体租赁住房用地供应203.9公顷，完成率102%，超额完成2017年度供应任务。

在多年呼吁后，作为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法，《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终于在2017年5月对外公布。这是自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以来，至今近二十年来

的第一次实质上的修改（2004年该法的修订，只是配合2004年修宪，对征地条款的表述方式做了文字调整）。征求意见稿的最大亮点是，删去了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六十三条关于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不得用于建设用途的规定，并尝试明确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范围。这意味着，集体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不再必须一律先通过征收变成国有土地。这些改变为土地制度改革消除了最根本的立法障碍。

虽然法律障碍得到了消除，但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雪阳对《凤凰周刊》表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还面临着观念上和行动上的障碍。

在观念上，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落实是个问题。在他看来，现在地方政府支出依赖房地产和土地出让金，将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在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建设了租赁住房，“土地财政”势必受影响，“毕竟现在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等都绑在一辆战车上，就看怎么能平衡一下各方面的利益。”

在行动上，农村发展规划能不能做好也是

问题。程雪阳介绍，中国的城市发展政府有规划，农村发展几乎没有规划。他认为，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之前，规划应该先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应协调，否则私搭乱建的情况增多，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在陈小君看来，入市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怎么一体，如何一体。即使城市和农村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同，城市需要发展工业、商业，农村主要的任务是要保证粮食安全，但在同等条件下，城乡应该被一体对待。对此，她呼吁，应该加快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和入市。

“过去我们在工业化时期，都是靠农业哺育工业。那时候农民的税收多高啊，那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直到2006年我国才全面取消农业税。现在工业发展了，工业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应该支持农村，这才是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

财经资讯

链接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键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建设平安乡村。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解读

工商资本介入不可变相圈地

【本刊综合】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工商资本下乡方面，提出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同时，强调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对此认为，工商资本能够并且将会成为未来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如带来资金、先进技术与经营理念，这些都是农村发展所缺乏的要素。另一方面，工商资本应该带动农民而不是替代农民，通过合理分工让农民能通过土地等资源获得应有利益，把“老板”与“老乡”的优势结合起来。“最重要的底线就是关于土地性质，要始终把握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用途管制。工商资本的介入不能变成变相圈地。”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表示，下一步重点要全面实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积极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具体形式

【本刊综合】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包括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系统总结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加快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新形势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文件要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一号文件也对改革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提出一个“不得”和“两个严”，即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要严格实行土地的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未来还将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设计。●

焦点

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

【本刊综合】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

月4日由新华社授权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文件从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

文件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文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

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文件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中央农办主任韩俊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讲意义、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提要求。”^①

历史档案

《西游记》前的“西游记”

文/彭治宇

《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哪怕是小朋友也能对唐僧取经的故事说出点名堂来。《西游记》虽是神话小说，于史实却有所本，那就是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经历，以及叙述这段经历的《大唐西域记》。

玄奘法师自然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但不是最早的。其实，到玄奘的时代，西行求法的浪潮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即将取代印度而成为佛教新的大本营。开启这一进程的，则是在玄奘之前两个多世纪的一位杰出僧人——法显大师。法显的西行之路虽然没有《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其艰苦卓绝程度绝不在那些虚构的神话故事下。

这两三个世纪里西行求法的浪潮，是中古时代中印文化深入交流的一个缩影。佛教在文

学、哲学、建筑、美术、逻辑学、想象力等方面，对华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隋唐文化的全面繁荣，说是重塑华夏、再造华夏也不为过。

可见，文明只有敞开怀抱去主动交流，才能获得发展和飞跃。

中土高僧的困惑与痛苦

外来的佛教能够在中国变昌盛，有政治和信仰上的双重原因。

政治上，西晋皇权的结构性危机促成了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汉人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内迁少数民族纷纷起事，意欲取晋朝而代之，经过十余年混战，羯族建立的后赵统一了中国北方。

羯族来自西域，深受毗邻的波斯和印度的影响。为了维护统治，后赵君主石勒、石虎在北方大力推动波斯祆教、印度佛教的发展，意图取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增加汉人对他们的认同。后赵灭亡后，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因为胡人的身份而秉承了后赵的政策，使得佛教在中国北方扎下根来。

信仰上，两汉的儒家经学具有浓厚的神学性质，因为对政治的神秘主义解释难以应验，以及东汉以来解释权被皇权侵夺，在愈演愈烈的暴政下无能为力，其理论到东汉末年实际上已经破产。士大夫经过数十年的探讨，从道家、法家、名家等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养料，形成了追问事物本原、哲理性更强的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家经学。

但玄学发展到西晋末年，郭象的“独化”之说一出，因儒家经学崩溃而带来的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无为与有为等矛盾已经解决，玄学发展实际上已经到达终点，东晋的玄学不过对此前的一些问题进行重复讨论而已。而当与玄学颇为形似的佛学带着中土相对陌生的生死间的问题参与讨论时，玄学便自然而然的向佛学靠拢，被佛学吞并，佛教在南方士族圈里也流行开来。

东晋十六国以来，佛教逐渐取得全国性的流行，但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教义不全。教义不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佛经翻译成汉语的太少，二是翻译得有问题。

此时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不是印度的原初

佛教，而是经过中亚游牧民族改造的新佛教。佛教在中亚兴盛时，中亚先后被游牧民族大月氏人、嚙哒人统治，大月氏人与希腊人混血后建立的贵霜帝国以佛教为官方意识形态，促成了更具开放性的大乘佛教的兴盛和传播，并且影响到西域，又进而影响到中国。

此时来到中国的僧人以中亚人和西域人为多，如安世高是西域安国人，康僧会是西域康国人，支娄迦讖、支谦、竺法护等则是大月氏人。佛教传播的早期，他们是翻译佛经的主力。

早期佛教经典一般借助口述来传播。虽然后来也用文字记载下来，并且在贵霜帝国时期钦定为梵文记录，但游牧民族对文字不甚重视，一般不会带经文写本来中国。于是，他们也喜欢采用传统的方式，把记忆的经文口述出来加以翻译。

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自然是难以记住大部头，所以通过口述翻译出来的佛经数量很有限。私人翻译也不像后世官办译场那样有规划性，翻译出来的佛经不成系统。

另外，这时的佛经由中亚人和西域人传入

中土，在他们那里已经由梵文翻译为他们的语言，再从他们的语言转译为汉文，是第二次翻译，其中走样、舛误之处自是不用多言。

这时的中西交流也不够深入，这些中亚胡人的汉语水平都比较差，帮助翻译的汉人则对佛教没建立什么概念，对一些佛教名词不知怎样定义。他们遂拿玄学名词来套，导致经义上出现了很多不到位甚至是错误的地方。

教义不全的后果是严重的，佛教徒难以理解佛经的原义，另一方面，佛教徒的宗教科仪也出现了很多错误，尤其是对怎样持戒认识不清楚。

持戒是摆脱轮回的前提和保障，对于佛教徒是很重要的，但中土的律藏长期跟不上。曹魏时天竺僧人昙柯迦罗译出了《僧祇戒心》，创立“羯磨法”，但远远不够。东晋初年释道安又在襄阳制定僧团戒律，影响极大，但因为“禅法无闻，律藏残缺”，导致他定的戒律“半华半梵，亦是亦非”，与真正的佛教戒律尚有距离。

这时的和尚里，从事务农、经商、诈骗、看相、行医、钻营的都有，唯独专心做和尚的不多，而且有点钱的和尚还贪图享受，跟佛教

的根本教义相悖。对这些情况，中国的高僧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道安曾经焦躁地表示：“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法显也“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

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399年），法显终于与慧景等四位同道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在他之前，三国时代已经有猪八戒的原型朱士行西行求法，但朱士行只到达西域的于阗国，并没有前往天竺，并且他也没有回国，而是选择在于阗终老。

法显以天竺为目标，而且决定把正法带回中国，他的行程注定要比朱士行精彩。这一年，他已经65岁。



法显在阿育王宫殿遗址。

比《西游记》更精彩的行程

法显大师俗家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自幼出家。他长期居留北方，因当时佛教“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功德”的趣味差异，他对禅法和戒律的兴趣比经义更大，因此，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律藏传回中土。

这一路上，充满了艰难的跋涉、教派的争端、理想的分歧、阴阳的永隔。

从长安到凉州的旅途尚称通畅。凉州此时

虽然有西秦、南凉、后凉、北凉并立，西凉也行将建国，战乱频繁，但无论西秦的乞伏乾归、南凉的秃发傉檀、北凉的段业和沮渠蒙逊，还是西凉的李暠，都对佛教崇信有加。他们一路顺畅到达凉州的最西境敦煌。在凉州，他们遇到了五位同道，一行人扩充到10人。

从敦煌开始，路途变得艰难起来，他们要穿过名为“沙河”的沙漠、戈壁。这是一片没有生命的土地，飞禽走兽全无，且气候炎热，容易迷路，路上遍布行人骸骨，十分吓人。经过17天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北疆的鄯善、焉耆等国，但这些国家信奉小乘佛教，他们因为是大乘教徒而不受待见，有3人不得不原路返回筹措行资，从此脱队。

后来，法显等人得到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决定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前往信奉大乘佛教的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何等难走，一路上没有居民，只能靠绿洲补给饮水，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才幸运到达南疆。在南疆，于阗、竭叉、子合等国都信奉大乘佛教，他们得到善待，并且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佛教仪轨与持戒方法，居留了接近半年，途中加入1人，同时

有1人脱队而随胡僧去了今克什米尔地区的罽宾国。

法显等7人坚定了前往天竺的信心，决定翻越葱岭，继续前进。葱岭极为险峻，而且绵延极长，不时有风沙雨雪，很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悬崖，有的地方还要踩绳梯过河，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到达相当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的北天竺境内。

北天竺由贵霜帝国的残余势力统治，据说是佛祖最远到达过的地方，法显等人在北天竺游历，参拜了不少佛教圣迹，体验了更多佛教仪轨。一行人中有3人认为已经到达天竺，决定返回，但法显认为北天竺的佛经都是口诵，没有写本，不够可靠，决定继续向佛教最昌盛的中天竺行进。在北天竺时，一行人中又有1人病逝，南进的只剩下法显、慧景、道整。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对《法显传》的英译本中附录的九张佛陀生平插图，此本出版于1886年。

翻越阿富汗南部的费德科山脉时，恰遇寒潮，慧景冻死在山中。法显与道整强忍悲痛，进入笈多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天竺。中天竺在今印度恒河流域，佛祖的圣迹极多，而且奉佛十分严谨，戒律严明，法显与道整醉心于此地，四处流连，留居了很久。

笈多王朝的首都巴连弗邑（华氏城）作为佛教名城，保存了大量佛教经典，尤其是有不少珍贵的戒律文本。法显在此地留居3年，学习梵文，抄写律藏，得到两部律藏以及一些其他经典。

同行的道整觉得中天竺是佛教圣地，尽善

尽美，而中国佛教远不能及，遂决定在天竺修炼终身，不再回国。这个决定无可厚非，但法显与他志趣不同，法显去天竺就是为了求得律藏并带回中国，两人分道扬镳。

至此，当年结伴西行的前后共11人，12年间经过多番变故，回国的只剩下法显一人。法显决定走海路回国，开启了另一段波澜壮阔的旅程。他在相当于今孟加拉国的东天竺游历两年，从恒河的出海口乘船，前往师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当地人用中国的白绢扇供养佛像，思乡之念不由大盛。居留两年，求得4部律书后，法显搭乘商船，踏上了回国之路，此时他已经年近八十。

法显出海不久就遭遇暴风，船只漏水，十分危急，大风连刮13天，船只侥幸没有沉。船补好后继续前行，他又十分侥幸地没碰到海盗，经过3个月航程，到达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此地婆罗门教盛行，佛教没什么影响，法显等了5个月才等到搭船回国的机会。船只驶入南海后又遭遇风暴，婆罗门教徒认为是佛教徒

法显带来的灾祸，一度想把他扔在海岛上自生自灭，因另一佛教徒极力阻止才幸免于难。

船只的目的地本是广州，却因为连续的阴天而迷失了方向，向东北开了70天还没有到岸。船上本来只带了50天给养，这时航行超过百日，食物和淡水行将告罄，有经验的商人认为已经过站，让船只转向西北航行，最终在今山东境内的青州长广郡登陆。此时距离他从长安出发西行已经15年了，这一路的行程，精彩程度比《西游记》也不遑多让。

此时割据山东的南燕政权已经被东晋太尉刘裕消灭，法显得到刘裕之弟青州刺史刘道怜的盛情招待。他本来想回长安，但看到江南慧远、道生等名僧辈出，而长安的后秦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最终选择在南方的东晋完成译经事业，与北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觉贤）合作，译出数部佛经。

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前后，法显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求道之魂与信仰的时代

法显大师的西行求法，成果十分丰硕。

佛教律藏共有5部，其中《迦叶维律》在中国一直未传，剩下的四部律中，法显西行之前的中国只有口述的《萨婆多众律》。法显在中天竺得到了《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的写本，在师子国得到了《弥沙塞律》的写本。这意味着，汉地流传的四部律中，法显带回了其中3部的文本，只有《四分律》不是他带回来的。

法显和佛驮跋陀罗译出了《摩诃僧祇众律》，这是汉地四部律中最重要的一部。他去世后一年，罽宾高僧佛驮什（觉寿）与东晋高僧道生共同译出了《弥沙塞律》。《萨婆多众律》在他回国之前已经被鸠摩罗什译出，所以没有再译。

从此，中国佛教的宗教科仪大备，戒律也不再缺失，中国佛教日益走上正轨。此外，法显带回和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对佛教义学也颇有影响。

法显大师发愿西行求法，带回律藏，在垂暮之年终于成功，对中国佛教贡献极大，可谓求仁得仁，如愿以偿。但比带回律藏更贵重的，则是他的西行路展现出的求道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知识界，为了追求真理，并没有多少门户之见。当佛学以其精密的逻辑和宏大的建构征服了知识界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将佛学视为真理，视为无上大道。为了追寻真理，他们甘愿自承中土的不足，前往印度求法，绝无后世“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与“中体西用”的扭捏作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开放、自信的心态，是隋唐文化辉煌璀璨的根本原因。

求道之后还要传道，“道”才能真正光大。当时的佛教徒视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为“中土”，视中国为“边地”，与法显同行的道整就乐于终老佛国，不愿再回中土，但最虔诚的求道者不会只满足于得到“道”，还要将“道”推广到更多地方，所以法显才毅然回国。文化的双向交流远比单向交流有效率。

法显虽然不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却是第一个成功到达天竺，又成功返回的求法者。受到法显的鼓励，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之风大盛。在法显圆寂当年，幽州僧人昙无竭率25人重走法显西行之路，礼拜佛钵，求取真经，从海道回国时只剩下5人。此后，西行求法者日

多，虽然埋骨黄沙、殒身雪岭者不知凡几，但依然无法阻止他们的求道之心。

唐代西行求法最有名的两位大师玄奘和义净，都明确受到法显的影响。玄奘曾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遂不顾禁令，西行求法，历时17年，携回佛经600多部。义净则“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从水路前往天竺求法，历时20余年，带回佛经400部。

与西行求法相应的东行传法，同样受到法显求道精神的影响。

唐代鉴真大师在45岁决意去日本传法，经5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大弟子圆寂，甚至连邀他东渡的日本僧人也已病故，但鉴真不为所动，最终在65岁高龄第6次东渡，到达日本，将佛法与中国文化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正是这一批又一批的求道者与殉道者，不断将“边地”变为“中土”，将心目中的真理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促进不同文明交流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最终，中国取代印度，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天竺，使团被叛臣袭击，王玄策当即从吐蕃和泥婆罗（尼泊尔）借兵，大破天竺叛军，横扫五天竺，于次年回长安献俘。

佛教圣地竟然一度被唐朝占领，这大大鼓舞了中国佛教徒，曾经纠结于中国“边地”地位的玄奘，毫不犹豫地称颂唐太宗为佛教教义中的理想世俗君主转轮王。给印度高僧的信中，他也认为中国佛教不逊于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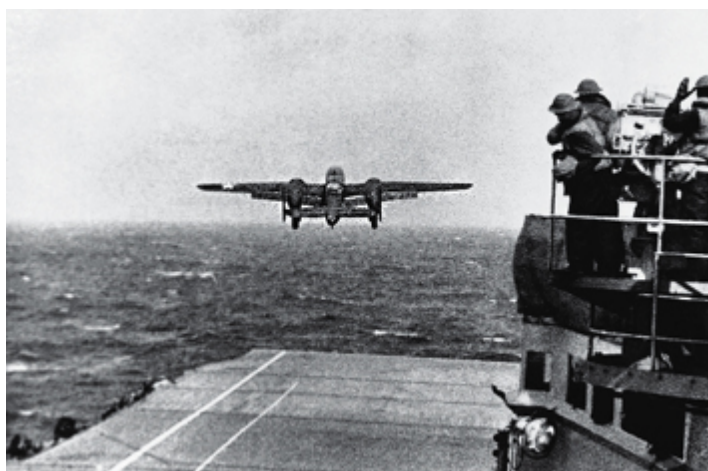
中国的五台山则被公认为佛典中文殊菩萨的道场“清凉山”，连天竺僧人亦来此朝拜。武则天上台的过程中，天竺僧人为她篡改佛经，营造声势，尊其为转轮王、弥勒佛。

隋唐文化也在交流中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峰。入宋以后，中国的文化心态开始转向保守和内向，到明清更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被抛弃在世界潮流外。

那一个信仰的时代，毕竟远去了。❶

微史记

空袭东京后感动美国的一碗“鸡汤”



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的B-25轰炸机从海军的“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前往东京一带。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突袭队驾驶B-25轰炸机空袭东京，16号机的机组人员在南昌附近跳伞，很不幸，5人全被捕。飞行员威廉·法罗中尉、机械师哈罗德·斯帕兹中士于10月15日被日军枪决，一起被枪决的还有其它机组的两名成员。4天后，东京广播电台公布已对美军机组成员进行了“逮捕、审判和严厉的惩罚”，广播只报出这4人的名字，没有更多信息。日本放出的有突击队员被捕的消息震惊了美国社会。美

军虽然秘密通知过被捕者的家属，但要求对方严格保密，这下全社会都知道并深深牵挂这些不幸的勇士们了。

法罗的朋友将法罗的一本笔记本公诸于世，那是法罗在1940年加入陆航前后记录的。除了记录军队指令，法罗还写了励志的“鸡汤”。“我该为自己的日常行为立下规矩。首先我必须列举出我的弱点，并消除它们。然后我必须培养自己做这份工作所需的品质。这会很难，但这是唯一的办法。要想达到目的，带着目标去工作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扉页里，法罗仔细写下自己的缺点，如缺乏好奇心、难以冷静思考、自信心缺乏……然后，他给自己写下21条自勉信条。

这份“鸡汤”式的记录在特殊时刻被发扬光大，上了报纸，传遍全国，鼓舞了美国人。全国各地的人写信给法罗的母亲，多个教堂将法罗语录写在周日公告上。明尼苏达州的西北国家寿险公司，为此印刷了宣传本公司和爱国主义的小册子，名为《一位美国人对胜利的信条》。

有学校在教师墙上张贴有关法罗的海报，

有人在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引用法罗的“鸡汤”。1943年2月，美国通过中立国瑞士终于弄清楚日本枪杀了4人，媒体舆论沸腾了，债券销量急剧上升。法罗的母亲脑子很清楚，她告诉记者，儿子的战友在日本战俘营里反而会生不如死。🌐

韩国日本恩怨趣闻

日本殖民朝鲜时期，朝鲜社会不得不出现在众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艺作品，但朝鲜文艺创作者们见缝插针塞入不少能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元素。一个颇让今人哭笑不得的惯用创作套路是：坚毅不拔的韩国男人总能征服柔情似水的日本女人的内心，小说、电影和戏剧里常常出现这般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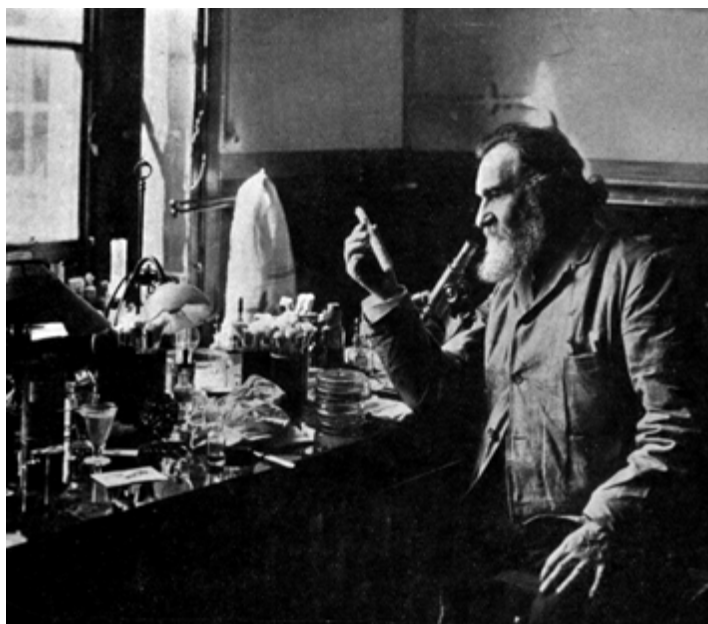
不过，这在当年是符合日本统治者“内鲜一体”大方针下倡导日朝通婚的。朝鲜报纸、杂志的新闻图片酷爱全家送子参加“皇军”的主题，身穿传统韩服的女孩们使劲挥舞日本国旗，父亲总是饱读经书的儒士形象，并戴着朝鲜传统斗笠，骄傲地站在即将离家远行的儿子身边。有作家号召年轻同胞，“表现身为日本公民的忠诚与韩国之子的气魄”，要奋不顾身加入反对美国人的“圣战”。

二战后，韩国社会浸入长年的反日狂热里。韩国电视上不出现一句日语，不让日本歌手登台表演，不放映日本电影。韩国人拍摄的影视剧里，日本人必定是丑陋、卑鄙的丑角，

或者说丑角就长着典型的日本坏人的面孔。

这一切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获得根本性改变，日本科幻电影《孔雀王》于1989年在韩国上映，成为战后第一部在韩国上映的日本电影。❶

酸奶养生学兴衰



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

定居法国的俄罗斯微生物学家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1845-1916），发现了细胞吞噬作用，在190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业内声望很高的他提出，人类进化到今日水准时已经不需要大肠，大肠里堆积着大量腐化的食物，反而成为“有害微生物的庇护所”，各种疾病应运而生。他相信人类告别“肠道腐败”引起的系列疾病后，人均寿命120到140岁不成问题，七八十岁去世则可算是英年早逝。只是，大肠有害论不是梅契尼可夫独创，他独创

了对大肠的食疗，而别的科学家都建议切割大肠最后一段即直肠。

梅契尼可夫在1900年开始宣布“发现了几乎无限期延长寿命的方法”，随后7年里，他宣布发现了导致“衰老病”的细菌、“有益和有用的”细菌，他用后者做成饮料，便是酸奶。他公布酸奶的妙用在于中和大肠主要部分即结肠内部的酸碱度，因为有害细菌在碱性环境中会疯狂繁衍。当时，他瞄准了保加利亚牧民的一款酸奶，因为传言食用者里有诸多百岁老人。他成功分离出使牛奶变酸的细菌，命名为保加利亚乳杆菌。这成为这位伟大科学家身上甩不掉的污点。

1903年，梅契尼可夫的书《人类的本质》英译本出版，在美国畅销。他在书里宣扬，喝他的保加利亚乳杆菌酸奶就能长寿，且能到140岁。1905年9月的《麦克卢尔》杂志说：“梅契尼可夫教授自己就每天饮用——他在实验室里总是放着一大碗——整个欧洲有许多坚定而又冷静的细菌学家和医生都追随他。”很快，美国的有钱人靠酸奶来养生，纽约第五大道上所有药店里的乳酸杆菌经常销售一空。梅契尼可夫

的又一部著作《寿命延长》在1907年出版。他强调衰老是“一种自体中毒现象”，可用乳酸成功治疗。他用很多调查报道来支持自己的论据，尽是保加利亚牧民在内的酸奶饮用者普遍长寿。当时的美国，每10万人里只有1个百岁老人，而每2000名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里就有一个百岁老人。美国一个著名营养科学家在1910年说：“把酸奶作为日常食品，在整个巴尔干半岛都是常见的做法，地球上可能没有比这些农村里的白种人更加健康的了。”酸奶被越吹越神，它还可以治疗结核病、肾炎、风湿病、伤寒、糖尿病等，甚至杀癌细胞。

食品商看到巨大商机，推出大量号称含有保加利亚乳杆菌、获得梅契尼可夫认证的食品。乳杆菌一时间进入到糖果、汽水、药丸等领域。梅契尼可夫只允许巴黎一家公司的酸奶使用“梅契尼可夫教授的独家供应商”标签，但仿冒者太多。此时，酸奶在美国食品市场上已走下坡路，它诞生在各路荒诞食疗法争相斗法的末期。正统医学界人士忍无可忍，美国医学会在1906年成立宣传部以专门打击替代疗法，“肠梗阻产生的自体中毒”便属于首批打击

目标。英国医学界也开始行动，皇家医学学会在1910年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会者纷纷指责酸奶热是“一场危险的热潮”。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英国医生治愈了一个著名贵族而成名，病人喝不卫生的酸奶而中毒。最终，酸奶养生教父在1916年7月去世，71岁，才活了他眼里预期寿命的一半。他身体力行地宣告酸奶长寿说破产。❶

文化

一个“男神”带来的印度电影热 从《摔跤吧！爸爸》到《神秘巨星》的中国成功

特约撰稿/ 冯霜

虽然1月15日美国《福布斯》网站先唱“反调”，预测了阻碍印度电影《神秘巨星》在华热映的四大因素：影片内容与其片名和预告片不符；阿米尔·汗的戏份不够多；故事很难宣传；同期上映的影片竞争激烈，《福布斯》还拿出数据——该片去年在印度上映后票房只有前年在印度上映的《摔跤吧！爸爸》票房的七分之一。





然而，根据电影咨询公司Artisan Gateway的数据，《神秘巨星》自1月19日上映10天以来，在中国的票房收入却已经高达4.1亿人民币。《神秘巨星》虽然面对《马戏之王》和《南极之恋》两大新片的进攻，表现依然坚挺，上映17天（截止到2月5日）累计票房逼近6亿元。业内人士预测，在中国追上去年热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总票房12亿元或有困难，但考虑到本周依旧没有大片抢占，《神秘巨星》仍有不少进击空间。

毫无疑问，一部不怎么被外媒看好的印度电影，在中国接连创造良好票房和口碑，甚至引发了一阵“印度电影热”，这股热温，无疑是印度电影人阿米尔·汗带来的，让人好奇“汗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从《三傻》到《神秘巨星》的中国之旅

很多中国人对印度电影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篷车》等印度老片，其实，如今中国电影院里的主流观众早已更新换代，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们或许对2009年在印度公映的《三傻大闹宝莱坞》更为熟悉。

在印度上映两年后，这部在网上交口称赞的喜剧电影终于在中国主流院线上映，虽然不少中国观众此前在网上下载观看该片，但他们还是特地去电影院重温了一下宝莱坞时光。

自这次印度电影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后，2015年，印度电影《我的个神啊》被引进来华公映。印度演员阿米尔·汗首次来华宣传电影，在被问到：电影在今日印度社会起什么作用时，他回答：“电影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帮助改变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样带着使命感的电影人，用这部喜剧电影收割了1.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打破了印度电影在华的“1亿元”票房天花板。

再到2017年《摔跤吧！爸爸》在华公映，印度电影渐成“现象级”——2017年，中国年度票房十大霸主中闯出一匹黑马，一部非国产、

非合拍、非好莱坞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国最“吸金”的电影之一——制作成本仅1512万元人民币，最终以1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名列年度票房第七。它成为中国迄今为止票房最高的一部非英语电影，也比这部影片在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票房收入加起来还要多。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印度电影在中国经历了由冷到热的过程。从2011年《三傻大闹宝莱坞》上映时的冷清相比，再到《我的个神啊》有了中国喜剧演员王宝强配音、阿米尔·汗亲自来华拉票，再到《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引发的热潮和好评，不由让人感叹：印度电影在华已今非昔比。

这里有中国电影缺失的天真与乐观

但必须要说明的是，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爱似乎并不是对所有在华上映的印度电影，而是更爱“阿米尔·汗的电影”。

一位驻华印度外交官夫人说，自己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店员们窃窃私语：“印度人”，旋即播放阿米尔·汗电影的音乐。目前在国内票

房过亿的三部印度片，《摔跤吧！爸爸》《我的个神啊》《神秘巨星》都是来自阿米尔·汗。相反，印度史上投资最大的《巴霍巴利王（上）》及本土极受欢迎的《脑残粉》，在中国都是反应平平，票房分别只有745万和153万元人民币。

居功至伟的阿米尔·汗却说，他对海外发行不怎么了解，也不相信宣传策略的绝对作用：“在去中国宣传《我的个神啊》前，我根本不知道它能那么火，毕竟宣发方面我也没下功夫。是中国观众的选择造就了这一切，我很感激他们。”

虽然阿米尔·汗谦虚地说没有下功夫宣传，但是他的电影有花工夫讲好故事，让人感到有真诚而努力地拍好电影，而且让这个故事既有印度元素，又有跨越国别联结人心的普世元素。并且阿米尔·汗带来的这几部电影打破对印度电影的刻板印象——必定有大段大段歌舞。而在中国上映的这几部电影，在歌舞上很克制，只是选择配合剧情需要的歌舞，而且长度恰到好处。

阿米尔·汗电影的火热，更有题材上的精

炼。影评人梅雪风认为，《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这四部在华上映的印度电影比主流国产片“勇敢”，它们都敢于触碰这个时代的真正疼痛，敢于反映社会的真正问题。它们的创作者强烈抨击现实的冷硬、势利、混蛋，但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乐观与天真，颇为动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相比老气横秋的大部分国产电影，印度电影还处在活力四射的青年时期。

印度跟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诸多相似的社会问题，例如，应试教育、重男轻女等等，而当电影中的故事围绕这些社会议题而展开时，中国观众也能产生共鸣，同时也透过电影中的故事，更加了解印度和印度人。

这种相互的了解当然会带来一些好的影响，或者如部分海外媒体所说的“阿米尔·汗开启了中印关系的‘汗时代’”——中国观众对汗的感情可能意味着，爱最终在这两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中占据上风。或许，阿米尔·汗被一些人称为是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来，印度对中国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开启中印关系的“汗时代”。

更多印度电影来袭：由火热到常态

其实，早在阿米尔·汗之前，中印电影人便有做过一些借鉴彼此、互利共赢的合作。例如夏雨和印度女演员希尔帕·谢蒂主演的《欲望》（The desire）。这部中印合拍片讲述了一名印度古典舞舞者追梦、以及她跟旅行认识的中国艺术家的爱情故事，电影融合了舞蹈、音乐、艺术、文化和感情等诸多元素，由印度导演R.瑟勒特导演，故事背景设置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然而，这部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却因为制片人的中途退出，而未能发行，只在全球诸多电影节上播放，直到2012年9月才在中印上映。

《欲望》的跌宕命运也映射出中印合拍片开启之初的坎坷，不过到今年的《神秘巨星》热映，中印合拍片逐渐呈现好的发展态势。仔细的人或许能发现，在《神秘巨星》的制片名单中，除了阿米尔·汗制作有限公司、Zee电影工作室两家印度出品方外，还有两家中国公司——孔雀山影业和创世星影业。与《摔跤吧！爸爸》等影片不同，《神秘巨星》这次进入中国银幕并不是通过批片形式，而是分账片。因此，它在印度首映3个月后就在中国上映，远比

其他印度片的引进速度要快。

随着“印度电影热”的升温，不仅有《功夫瑜伽》《大闹天竺》等中国影片去印度取景、合拍，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也进入到印度电影里。曾有消息称，中国公司将参与投资两部中印合拍片，《私奔到中国》与《阿辛哥的奇妙之旅》，分别由曾执导《惊情谍变》的希达·阿南德和《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的导演卡比尔·汗担任导演。

“中印有相通的价值观念和传统因素，我希望与中国有创造力的导演或演员合作。”不过，阿米尔·汗支持有更多的中印合拍片，但他也坦言，这样的合作需要自然而然，不能强硬地计划。

如今，《私奔到中国》与《阿辛哥的奇妙之旅》还没有更新的进展。但《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已经宣布将于3月2日元宵节在中国上映，影片由“印度三大汗”中的另一“汗”——萨尔曼·汗主演，讲述了一个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印度大叔，历经艰辛帮助巴基斯坦哑女与父母重聚的故事。影片中与父母走失的小萝莉沙希达遇到了人称“猴神”的大叔帕万，他们来自不同

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最终却一起踏上了波折的寻家旅程。

这部影片能否再次成为“爆款”，不仅能测试阿米尔·汗的魅力有多大，还能衡量出“印度电影热”到底有多热，到底能热多久。❶

一个三轮车夫的文化启蒙运动

文/ 霍安治（台湾）

名不见经传的志文出版社在1967年推出《罗素回忆集》与《罗素传》，轰动台湾思想界。两书火速再版，志文一炮而红，当时思想界领袖殷海光亲到出版社，向老板张清吉致意。慕名往访的名流大吃一惊，惊艳思想界的张清吉竟然是蹬三轮车创业起家的小学毕业生。

张清吉出身贫寒，热爱阅读。蹬三轮车而不废吟咏，路边等客就展书阅读，感动了同在马路上讨生活的拾荒伙伴。1960年代的台北旧书业兴盛。旧书来自拾荒小贩，不少小贩索性转行做旧书生意。一些拾荒友人见张清吉如此热爱阅读，干脆指引他开旧书摊。张清吉的旧书摊与众不同，寻常潦倒文人开的旧书摊常有君子固穷的书生气，穷苦出身的张清吉却以火热雄心勤奋创业，极盛时同时开三家旧书店。

得益于在社会底层磨练多年，张清吉生意眼光务实而精准。他的旧书摊远离孤芳自赏的台北旧书集市牯岭街，开在台湾大学城中校区

旁的临沂街，以全台第一学府的学生为主力客户。他用心琢磨学生的选书偏好，广结朋友，从而掌握知识分子的阅读品味，旧书进货精准，生意越做越红火。

旧书生意毕竟有限。在张清吉的旧书生意闯出名号时，一位台大学生林衡哲鼓动他进军出版界。这一激励，竟鼓捣出台湾思想界的领航出版社。

罗素的半调子启蒙运动

张清吉与林衡哲进军出版界的第一炮是盗印，由旧书中卖得好的品种“重新编印，一次印个一千本”。首先翻印《天下秘闻》，果然畅销。此后再印林语堂著作，“销售得乒乓叫，印两千本也一下卖完了，加印三千本照样全数售出”。择肥而噬的嚣张盗版中，第一桶金轻松到手。

1960年代的著作权意识虽然薄弱，但盗印仍然是见不得人的。林衡哲又发奇想，劝张清吉出版真正好书：“光只出这种书，没意思。除了赚钱之外，看不出别的太大意义。你应该出一些具有水平的书，对社会有益、有正面影响

的书。”

出好书要经营作家，推广市场，成本巨大。但早年出好书另有翻译捷径。自清末民初起，翻译外洋著作是不需付权利金的无本好生意。在新文化运动的西洋知识热潮中，上海滩各大书局竞相抢译欧西名著。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由柏拉图译到康德、杜威、亚当·斯密，集西方思想之大成。

然而，商务、中华、世界等老书局渡海来台后失去翻译的拼劲。1950年代的台湾如同文化沙漠，老书局只要将上海带来的老版样重新上机，加印“台一版”，就能畅销热卖，连译者版税都能省下。当时台湾市面贩卖的翻译书籍大多是老上海译本。自桧以下，新成立的小出版社更没有出钱找译者的眼光，干脆编个译者假名，直接盗印各老书局的译本。

二战后的西方思想界百家争鸣，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热烈翻译的“新学”，多已成为过时的“古典”理论。19世纪意气风发的穆勒，是清末民初让中国人高山仰止的自由主义大师，商务印书馆热销一时的《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由严复译。进入1960年代，穆勒的学

说已沦为“古典自由主义”，严复以福州话误译 Mill 为“穆勒”的中译名也正音为“弥尔”，但台湾知识分子能买到的欧西自由主义新知，仍是商务在1965年加印的“台一版”《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

早年两岸对峙，台湾战备，当局1979年前对出境采取审核制，台湾人不得任意游历海外。知识分子只能藉由书籍了解外界，但外文程度不高，阅读仰赖中译本。此时若出版社稍有雄心，斥资翻译最新名作，常能造成轰动。台湾早年的思想重镇文星杂志社曾出奇制胜，在1965年出版殷海光翻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名著《到奴役之路》，轰动文化圈，洛阳纸贵，被公认为台湾思想界进化里程碑。文星杂志社就在张清吉的旧书摊旁边，张清吉回忆道，他见到文星歇业时的大甩卖，“店里的人挤得人山人海，这番景象也使我见贤思齐”。

文星选书的手法很精妙。哈耶克本人文笔优美，《到奴役之路》的英文原本更以散文方式写成，读来毫无学术著作之艰涩，是写给普罗大众看的书，因此在1944年于英美上市时就是畅销冠军。笔者曾细阅英文原本，深深陶醉

于哈耶克的文采。原著文笔好，中文译笔差一点也能畅销，而且这本书以论辩方式写成，带有热烈的批判感。1960年代台当局的经济建设偏向管制与计划，连新台币现钞换美元都要严管，哈耶克热切提倡的自由经济“看不见的手”，常能引起知识分子批判情结的翩然联想。

然而，殷海光对哈耶克著作的翻译热情，也只到《到奴役之路》为止。至于哈耶克热烈申论法治理念的《自由的宪章》（今译为“自由秩序原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以及光彩灿烂的理论巨作《价格与生产》，翻译上市就是赔钱货，文星的思想先锋们就无意跟进了。这三本书虽然同样在1966到1974年间陆续译出，却是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纯学术著作，即使免费赠送各大学图书馆，也乏人问津。

张清吉完全吸收了《到奴役之路》的成功精髓。一本能征服市场的思想巨作，原作者必须是名震全球的大家，内容必然是给普罗大众读的散文式作品，而且要带点辛辣热烈的批判味。志文出版社的翻译开山之作《罗素回忆集》，就是《到奴役之路》成功经验的翻版。

罗素的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当时还没有中译本，在台湾算是“新书”。罗素风骚欧美哲学界半世纪，被诺贝尔委员会歌颂为“西欧思想与言论自由最勇敢的君子”，又曾于1921年应梁启超与张东荪之邀来华讲学，中国知识分子听熟了他的大名。其回忆录的内容更是畅销保证。出身贵族家庭的罗素任性狂放，又是极端的怀疑论者，一生愤世嫉俗，率性而行。罗素自称回忆录是“个人记忆的画像”，是一部小品式的追忆，因此不谈艰涩学理，却以闲谈语气、生动文词坦率回顾一生的奔放狂行。而且罗素文笔优美而热情，即使翻译不出色，也很难遮掩原文的热烈文采。

这是本阅读毫不费劲的轻松读物，更是足以让知识分子在人文关怀的“装逼”批判之中展现“档次”的云端作品，《罗素回忆集》便火爆大热。志文的“新潮文库”由这本奇书出发，风起云涌，在1967到1990年代间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食粮。2007年，台湾出版业界举办“向资深出版人致敬活动”，评选委员大学都是读“新潮文库”受启蒙的，一致誉美张清吉“开创了台湾新潮的一代”。

然而，“新潮一代”虚有其表。

考试机器的知识梦

日据愚民年代，中学大学数量奇少，升学难如登天。直到台湾光复后广设学校，社会阶层才能靠考试浮动。1950年代，台当局积极增设学校，激起惨烈的升学主义。1958年后，大学联考录取率在30%上下，激起家长望子成龙的热情，从初中、高中（高职五专）到大学（四技二专），三大阶段联考使学生很容易沦为只会背题库的考试机器。到了1960年代，大学里已经是清一色由联考循序打造的考试机器，如作家三毛等拒绝题库教育的奇才逸士，只能沦为社会边缘人。

挤进大学窄门后，学生仍然靠考古题库读书考试，发挥剪刀浆糊的拼贴功力写论文，“新潮一代”知识水平很贫乏。然而，“新潮一代”以论辩批判为风尚，因此人人乐读《罗素回忆集》，模仿罗素的狂傲，浇灌心中批判热火，却无心深入罗素理论。

当时台湾市面上的罗素著作，其实是品种齐全的。商务印书馆在台再版《算理哲学》

(1965)、《哲学中的科学方法》(1966)、《罗素教育论》(1967)，中华书局出版《西方哲学史》(1955)，国民党党营的正中书局出版《哲学大纲》(1954台初版)、《世界之新希望》(1956)、《权力论》(1958)，台湾启明书局出版《相对论入门》……然而，老书局一心灌输知识，却忽略新世代读者已经退化为考试机器，不再有老辈青灯黄卷钻研知识的热情，只愿意由《罗素回忆集》等思想的速食快餐以吸收批判精神，而不愿细读《哲学中的科学方法》里公孙龙般精彩却艰涩的逻辑辩证，认真体会罗素式狂傲中的深度哲思。

张清吉的创业助手，是林衡哲等来自台湾第一学府的校园菁英，对校园品味的拿捏最为精准。启蒙佳作首先要排除没有感情与文采的理科作品，而于文科之中，又要跳过历史与经济学等沉重难懂的艰涩学门。因此，“新潮文库”所翻译的真正学术思想作品，集中在哲学与心理学。

文笔普罗流畅的哲学类经典，是校园清谈的入门书：赫胥黎《再访美丽新世界》、加缪《西西福斯的神话》、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

世界》、尼采《欢悦的智慧》、西蒙·波娃《第二性》，《我思故我在》《泰戈尔论文集》

《怀海德对话录》……对于实在无心钻研哲说的读者，则另有《廿世纪智慧人物的信念》

《与当代智慧人物一夕谈》之“题库”型速成读本。读了这些哲学经典，大约也能以上档次的用语，在校园清谈中高论“爱与生的烦恼”。

在20世纪渐臻成熟的心理学，则是社会科学中的浪漫奇葩。梦想、性欲、潜意识……心理学的话题总是新鲜而富有魅力。临床研究“梦的解析”的心理学家，著作也常带有梦想般热烈奔放的文笔与灵思。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话题涵量无人能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倡谈人性恐惧离群孤独渴望合群相属，从而放弃自我之自由意识，写出社会人情之无奈；焦虑大师霍妮的《焦虑的现代人》，细说焦虑的来源不是性欲未获满足，而是文明世界缺陷使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感觉世界的潜在敌意与孤独无助，最能感动在冷酷升学教鞭下长大的“新潮一代”；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自卑与生活》，深邃解析内心深处的创伤与恐惧，更能使“新潮一代”感同身受。即使作者名气稍小，但光是《生之挣扎》《自我

的挣扎》《心灵的梦魇》等书名，就能保障销量。

选书是“新潮文库”的强项。1960至1970年代台湾经济蒸蒸日上，战争记忆逐渐淡漠，大学生喜欢弹吉他、看美国电影、学道德溃败的反战嬉皮士欢唱“爱与和平”，选书绝不能有民族历史之沉重感，更不能高估读者的求知欲。同时期号称“外文丛书出版王”的桂冠图书公司，刚进市场就出版汤因比《历史研究》（1978）；远景出版社译托夫勒《迈向未来》（1975），都是高估读者的败笔。大学生对“新潮文库”的《真与爱》爱不释手，对桂冠的《西方的没落》敬而远之。

思想不能深入堂奥，只好向文艺小品转进。“新潮文库”五百余部经典，约有3/5是小说、诗文与传记。只是新潮的文学译品也专选带有哲思的风范之作：小说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圣洁的灵魂》、劳伦斯《少女与吉卜赛人》、莫泊桑《女人的一生》、奥威尔《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赫塞《艺术家的命运》、川端康成《美丽与悲哀》、三岛由纪夫《爱的饥渴》、卡夫卡《审判》……传记选译

尼采自传《瞧！这个人》、歌德自传《诗与真实》、赫塞自传《孤独者之歌》、史怀哲自传《我的生活和思想》、《毛姆写作回忆录》、《芥川龙之介的世界》……

“新潮一代”的沉沦

“有人说：一本书如果经过五十年还有人读，或者会诱使读者在中年之后还想找来重读，那么这本书可能就是‘经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出版了卡夫卡的《蜕变》、芥川《罗生门》《地狱变》、海明威《老人与海》、卡缪《异乡人》。”张清吉于2002年专访中回忆道，“曾经在1970到1990年代为台湾青年打开西方思潮一扇窗的‘新潮文库’如果曾在各位面对人生挑战时，是暗夜的篝火、是孤独行旅的荧光，这就是出版人无上的荣宠。”

许多“新潮文库”精选的名著的确有恒长的可读性。杨格（今译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深刻探讨存在感的虚无焦虑，少年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校园经典，中年时则是“听雨客舟中”的沧桑体悟。



张清吉的旧书店邻近台湾大学城中校区，他就近观察尖端学府的读书嗜好，结交青年大学生，才能掌握校园潮流，模仿文星，出奇致胜。

然而，“新潮文库”的思想启蒙只停留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不再有深邃精进。在征服校园后，“新潮文库”随着工商社会的空虚感而出版都市生活的疗愈作品，引导上班族品味《巴黎的忧郁》、感受《禅的世界》、欣赏《卓别林的电影艺术》。对于用脑过度、无法放松的惯性疲劳族，则出版福尔摩斯、爱伦·坡、松元清张、西村京太郎等推理小说。

今日，台湾社会因“新潮一代”而沉沦。由“新潮一代”发动的政治社会运动，成为滥情而虚空的争权魔宴。由“新潮一代”发动的教育

改革，迫使学生由小学一年级开始补习到深夜，成为完全为成绩而生活的考试机器。而由“新潮一代”执教的大学校园，则沦为抄论文骗经费的名利场。

2017年10月，自然出版集团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震撼了“新潮一代”，全台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的世界排名居然惨输给兰州大学。在1950年代，傅斯年以再造北大的精神领导台大，今日台大第一热闻却是校长涉入论文造假。

台当局于1994年加强著作权保护，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因未购买版权，随而退出各大书局售货架，只留在“新潮一代”回忆之中。“新潮一代”常盛誉“新潮文库”的思想启蒙之功，实则“新潮文库”并非思想界的领航者，而是思想界的无情照魔镜。张清吉的精准选书眼光，完美折射出升学主义下台湾知识分子的苍白浅薄。❶

三地书

一次跨越三千年的历史遨游

文/ 孙曙



《少年幸之旅·牧野大战》

陶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

三千年前，一位无名的少年，是白鹿原上白鹿部族收养的一个放羊娃。他不知是何人所生，也不知从何而来，在野地中成长，有类于“狼孩”、“豹娃”，通百兽言，却不晓人语。一个神异的黑衣陌生人花了七天，教会他说话、数数、音乐、绘画等融入人群之中的基本沟通之道。作为某种交换，陌生人带走了牧羊娃的“死亡”，随后隐匿不见。正因为这诡异的一遇，少年幸得以摆脱与禽兽、牲畜为伍的原始

生活，进入到波澜诡谲的文明生活。幸神奇地摧折所有降临自身的险难，始终长生不死，同时，他又不幸被掳掠争夺，卷入到商周鼎革的历史决战之中……

这就是科幻历史小说《少年幸之旅》第一部《牧野大战》的故事起点。这个起点，无论是对于青少年读者，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都颇有吸引力。它包含了重新创世的神话原型，这个神话从塑造一个人开始。

追寻淡去的历史

跟随作者的书写，我们进入了一个颇为奇异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一方面很忠实地书写了历史：商周交替，是中华文明的拐点，青铜文明转向黑铁文明，农业文明战胜商业游牧文明，奠基了三千年文明的格局。小说《牧野大战》很准确地抓住了文明转变的枢机，突出了从周文王姬昌到周公姬旦对周文明的塑形，描绘了“郁郁乎文哉”周文明的灿烂肌理。在商、周、崇（夏之后裔）、有熊部落（楚之先族）、蜀、羌、吴、诸蛮夷等中华文明的始祖们的分合争斗中，厘清了多脉一流的文明基因。

目前，中国小说直面商周之际的写作极度稀少。因为毕竟历史很久远，即便是“寻根”，也没有人有勇气去追寻那么久远时代的根。书中，作者呈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复原历史的能力，小说以中华史为主轴，以人类文明史为背景，综合了政治史、战争史、仪礼史、器物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多方面知识，依赖清华简等最新历史发现，以丰富的历史情景和鲜活的历史人物，展现中华文明的命运与抉择、博大与恢宏。在书中，作者精雕细刻了殷商东征、龙伯铸金、姜里演易、周宴吟诗、孟津会盟、牧野决战、鹿台争鼎、以拉谷之战等场景，将我们颇为陌生的历史知识化为纤毛毕现的艺术形象。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塑造了帝辛（纣王）、苏妲己、姬昌、姬旦、姬发、姜子牙、崇侯虎、伊尹等令人信服的历史人物形象。

漫长的历史旅程由此展开，我们得以回归到那个被淡忘已久的历史时空中，同主人公一起去见证沧海桑田一般的巨大变迁。在昆德拉看来，小说艺术是发现遗忘的存在，而对于一直处于“寻根”热潮的中国人，大概没有更悠久的根，能比商周之际更加值得我们去搜寻、打

量一番了。

一部有人的历史

虚构照亮历史。《牧野大战》不仅是一次大胆的历史书写，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也有较深的挖掘，因而能够写出圆润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丰满，别开生面，与刻板印象中已有的形象十分不同：

商纣王刚愎、沉沦与任性，但也聪明果断，不失为殚精竭虑谋划事业的王者；姬昌弘毅、坚韧与智慧，又老谋深算，城府极深；姬发坦诚、勇猛，性格中藏着优柔寡断。这些立体性格一一如现。作为全书最为着力刻画的人物周公姬旦，是我们貌似知之却又知之甚少的历史人物，却是周朝得以建国的灵魂人物。在书中，他号称掌握着奇异的梦师之术，出入梦境、来去自如；更是腹有韬略，外交内政纵横捭阖，忠于家国，担当果敢，精进善成，临危沉勇，又有诗书之华，但其也有阴沉狠戾、过于自负的一面，对父命封登周公之位的义弟少年幸必欲除之，让人敬畏交加。特别是那出入梦境趣笔，颇有点“盗梦空间”的况味。

周公的对立者或者补充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第一告密者”——崇侯虎。他为了复兴大夏祖业，也是机关算尽，貌似节节败退、山穷水尽，却竟能出人意外地“剧情反转”。这是借用推理小说的手法，一叶障目，神龙出没，伏线千里，十分烧脑。相比之下，作为主线的少年幸在《牧野大战》中，虽还是懵懂混沌，但经历坎坷，也在一次次历史机缘中冶炼了博大的心智。作为他的师父、山戎族的奴隶龙伯，又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于历史“小人物”、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与思索。

正因为人物的成功塑造，这部书回归了虚构的应有之意，充分利用了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类型小说创作的成功模式：既有人工智能、平行时空等新热点，也有夸克战士、星宿斗士、龙族、星球大战、末日浩劫等，整合创新科幻、架空小说的宏大架构，发挥历史、科幻、谍战、战争、推理小说的人物命运瞬息万变的特色。作者多年严肃文学创作的写实功力，及其对科技前沿的持续跟踪和敏锐洞察，能够把历史、人物与虚构背景很贴合地融为一体。

在历史阅读热的今天，一部小说只有成为一部看得见的历史，大概才能克服掉各种通俗讲史的书籍见事不见人的缺陷，脱颖而出，启迪读者，特别是那些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青少年读者们。

想象共同命运的深情

中国人极为重视历史书写，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故而，陈忠实赫赫有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开篇，援引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而作为民族史诗的小说应该怎么写？数量庞大的中国作家几乎费尽心思。

《少年幸之旅》正是这种中国文学传统下的某种探索与创新。作品开篇于十九世纪末，荷兰殖民者攻破南洋婆罗洲（现东南亚加里曼丹岛）上的兰芳共和国。该国是海外华人所创立的一个共和国，已历百年。其缔造者之一石有幸带着兰芳遗孤，怒海孤舟，在荷兰人的追击中得以北还中国。归航中，他给孩子们讲述自己三千年的华夏之旅。通过主人公极度漫长的讲述，作者表达出向人类文明致敬，向中华文明致敬的情愫。

这深情流淌在对文明肇始者的追念中，在周文王、周武王、帝辛、大卫王等身上激荡的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宏大动力，回响在“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古歌中。这首歌从《诗经》时代一直唱到兰芳共和国，与中华文明伴行，薪火相传着追寻自由与美好生活的意志。这深情涌起在不惧危难挑战命运的激昂史诗里，周族几代人艰难困苦屡蹈屡起，终成天下之业，也是对中华的国族认同和人类未来的坚信，是永生的中华文明的归航与反求诸己，是号呼反己忧患天下“究天人之际”的天问。

这种追思命运的情愫，也浮现在作者刻意半隐半现的科幻部分：白鹿部落收留的牧羊少年幸，崇侯灭白鹿部后收其为奴，他在姜里狱中遇到姬昌，姬昌认其为义子。三千年后，他是兰芳共和国的缔造者南洋漂流者石有幸。八千年后，他将是地球文明的拯救者，某种力量又迫使他从未未来折返，与过去的自己相遇。幸是不能对历史进程做任何干预的，但置身于历史中，他又岂能不因之而变？

这其实又是历史叙事的一个隐喻：历史被一次又一次叙述，可每次叙述中，那种量子式

的不确定性，会不会导致历史已然改变？这是一系列极度烧脑的“设定”，作者让我们管窥其斑，需要在九部书的大框架下，才能完成这令人充满期待的“幸之旅”，一次心灵和想象的无限遨游。❶